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2025年·第3期·总期: 175 + S\$5.00

源



南洋画家印尼之旅的真相

- ◆ 柳川漫漫 其叶蓁蓁——蓁蓁专访
- ◆ 新谣的传播与新加坡文化记忆
- ◆ 在时间的缝隙中把守——当代文献艺术家许元豪
- ◆ 用笔守护记忆 以心传承文化——柯木林



优秀文学作品奖2025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5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诗歌。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诗歌（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1200字左右（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

投稿：即日起至2025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杯及奖金S\$2000元。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 投稿方式 —

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并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的中英文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发放稿费和邮寄杂志。

— 稿件录用 —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联络人：欧雅丽 电话：6354 4078 电邮：yali@sfcca.sg



编辑语

文·谭瑞荣

纵观本期的栏目，似乎都跟“历史”息息相关。

从许元豪站在记录本土文化景观的高度，挖掘与艺术家相关的“历史”文献，到柯木林执着于本土历史的书写与整理；从折射新加坡芭蕾舞发展史的吴素琴舞蹈生涯，到易有伍集演奏、指挥、编曲、教学、摄影、录音、唱片制作于一身的传奇故事；从用镜头揭开四位新加坡先驱画家峇厘岛之行的真相，到通过新谣传播来梳理新加坡的文化记忆。这些文章无不彰显着本土“人文历史”的厚重。

当今活生生的人文风貌，亦是明天沉甸甸的历史典故。但未经梳理、记录和宣传，也可能被荒芜的沙漠所掩盖。因此，世界各地都非常重视人文景观的塑造、记录和宣传。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历史，笔者小学时代就有所耳闻。试想，如果相关地区不大力宣传，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会被传颂至今吗？

于是笔者总想在星洲发现绿洲、记录和描述人们如何诗意地栖息。于是笔者努力化成《源》的一滴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义无反顾地随源流淌。

在这里，我衷心地感谢各位特约记者、特约撰稿、专栏作家以及编辑部、编委会同仁多年来的默契合作！感谢宗乡总会多年来的信赖，以及各位理事、各界人士及广大读者的热心支持！

近十三年的总编工作，本期起也将成为“历史”，相信《源》将继续流淌狮城、润泽星洲。愿《源》能继续浇灌这份绿意，从而催生本土文艺复兴，让未来的人们也能对星洲之绿洲心向往之。

2025年·第3期·总期：175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编辑顾问■

吴绍均

■编辑委员会■

主任：严孟达

委员：尹崇明 黄保华 锺天祥
陈嘉琳 叶舒瑜

■总编辑■

谭瑞荣

■代总编辑■

欧雅丽

■英文校对■

何秀菱

■总代理兼发行■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设计、分色、承印■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出版准证■

ISSN 2382-5898
MCI (P) 040/01/2025

■出版■

2025年6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会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目录

- p 4 炊烟岁月 茄子的故事 尤今
- p 7 艺术长廊 在时间的缝隙中把守 赵宏
—— 当代文献艺术家许元豪
- 12 文坛掠影 柳川漫漫 其叶蓁蓁 齐亚蓉
—— 蓁蓁专访
- 16 宗乡文化 用笔守护记忆 以心传承文化——柯木林 章秋燕
- 20 余音缭绕 集各种艺术于一身的音乐奇才——易有伍 郭永秀
- 24 戏如人生 从吴素琴的艺术人生看新加坡芭蕾舞的发展 蔡曙鹏
- p 29 文化传灯 新谣的传播与新加坡文化记忆 周秀杰
- p 32 吾乡吾族 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培育：林汉河医生 陈煜





p.7 艺术长廊



p.12 文坛掠影



p.16 宗乡文化

- p 36 最爱书房** **南洋画家印尼之旅的真相** 张夏韩
——谈新书《峇厘1952：通过刘抗的镜头——四位新加坡先驱画家的峇厘与爪哇之行》
- p 40 坡上人家** **岁月如歌** 郭振羽
——回顾六十年音乐之旅
- p 42 学海拾珠** **民间守护与文化共融：新加坡文物保护观念的演进** 张森林
- p 44** **先贤黄亚福“墓志铭”释读** 庾潍诚
- p 47 旧貌新颜** **光明山下的新民：早期工业与宗教文化的交汇点** 李国樑
- p 52 星洲回眸** **南大早期的工读制与合作社** 符懋谦
- p 54 文化百科** **新加坡儿童剧社** “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编辑组
- p 57 仿佛风** **奶奶** 陈雨婷
- p 58** **不要问** 徐寶璽
- p 59 本土文学** **三江组诗** 葛新
- p 62 总会专递** **与徐芳达部长共话华社未来：传承、融合与创新** 杜诗敏
- p 63** **多元庆三喜 粽香聚民心** 许迎辉
——记2025端午嘉年华



茄子的故事

的好滋味啊，让我的胃囊经历了好似地震一般的撼动。

回国后，我反复尝试，却始终煮不出记忆中那般绚烂的好滋味，我想，也许糅合了异乡旅情的味道，是难以复制的。

这天，女儿来电，声音饱饱地含着喜悦：

“妈妈，今晚来我家吃饭，我要给你一个小惊喜。”

女儿擅长厨艺，餐桌上常常有推陈出新的好菜肴。

这晚，她做了一桌工序繁琐的素菜——荤菜易为、素菜难成；因为鸡鸭鱼肉带有先天的鲜甜，随意调弄，便能煮出一个灿烂的春天；瓜果蔬菜呢，虽然也有另类的甘甜，但是，它们需要借助肉类和海鲜，才能把内蕴的本味激发出来。若是全素，那就只能凭五花八门的酱料来开辟味蕾的新天地了。

女儿指着桌子中央的一道菜，说：“猜猜看，这是什么？”

大大的盘子里，摊放着一个扇形状的东西，金黄色，灿如晨曦。我仔细地看，但却看不出一个端倪。

她笑盈盈地说：

“这不就是你朝思暮想的茄子煎蛋吗？不过，这是我自创的，不是巴基斯坦式的，您尝尝，别有风味哪！”

她将整条茄子连皮带蒂放在炭火上，慢慢地烤至外焦内嫩，把茄皮轻轻剥掉，保留茄子的形状，平铺在锅中。然后，在蛋液中加入些许鱼露，和茄子一起慢火煎熟。

她说：“好的鱼露，用于烹饪，有画龙点睛之妙。”

在泰国、越南和菲律宾这三个国家的鱼露当中，她偏爱越南的。据她分析，菲律宾鱼露咸味



文·尤今

多年前，到巴基斯坦旅行，结识了帕坦族马希尔。帕坦族（Pashtun）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民族，素以好客闻名。有人打趣说：“帕坦人宁可开枪让你吃子弹，也不会让你剥夺他们款待客人的大好机会。”马希尔就体现了典型的帕坦族性格，彼此萍水相逢，他却热情地邀我们回家用膳。

抵达时，马希尔的姐姐扎尔米娜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我自告奋勇地进去帮忙，她教我做茄子煎饼。她将茄子烫熟，剥皮，捣成泥状；再爆香洋葱片，倒入茄子泥，煎一会儿，最后倒入调了当地酱料的蛋液，慢火煎至灿烂的金黄色，摊在圆盘里，宛若一轮完美的夕阳。暖，可别小觑这一道稀松平常的家常菜，一入口，那摄魂夺魄

过重，鲜味不足，像滂沱暴雨，有时会覆盖食物的原味。泰国鱼露在浓郁的鲜味里带有些微的甜味，像是旱季里的喜雨，比较适合烹煮辣味汤，如冬阴功汤，因为鱼露中的甜味可以中和汤里的辛辣，使味道更为圆融。至于越南的鱼露呢，在丰富的层次感当中含着沁心的果香，像霏霏细雨，能不着痕迹地渗入食材中，给味蕾带来惊喜；所以，是她的首选。

女儿从越南鱼露联想到越南人喜欢吃烧烤，灵机一动，便以炭烤茄子结合加了鱼露的蛋液，做成了味道独特的茄子煎蛋。炭火那种充满了野性的味道层层渗透进茄子里，而那温柔如月光的越南鱼露，却又驯服了那股奔放的野性，一刚一柔，刚柔并济，我吃得眉飞色舞。

当年从巴基斯坦回来，我东施效颦，屡试屡败，可能是对方有不为人知的秘密酱料。自行创新，另辟蹊径，反而可以带来难以预料的惊喜。

见我意犹未尽的样子，女儿促狭地说：

“妈妈，您那么喜欢茄子，以后，我给您做一道茄子刺身，如何？”

茄子刺身？我哈哈大笑，然而，笑着笑着，阿祥的脸，突然清晰浮现。

阿祥在怡保经营一家小餐室，他当主厨，烹煮的都是家庭式的菜肴，不讲究虚张声势的餐具与狐假虎威的盘饰，只注重食材的新鲜、烹饪的技巧与火候的精准。他稳扎稳打的经营理念，使客似云来。阿祥为人和气健谈，有空便穿梭于桌间，与食客东聊西扯。

那天，岚宁点了土豆炖牛肉、糖醋里脊、香菇炒油菜、豆角焖面。

哎哟，阿祥厨艺果然了得，菜肴道道普通，却道道美味；尤其是豆角焖面——炒得恰到好处的豆角还保留着娇艳的翠绿色，仿佛刚从树上摘下来；那饱含特制酱料的面条呢，在柔软中带着富于韧性的嚼劲；层次丰富的香味，就不动声色地蕴藏在面条与面条的缝隙中。吸溜吸溜地吃着时，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每一口都吃出了家的温馨，那种欢快满足，钻进了心里，成了永远的惦念。

后来再到怡保，我便央岚宁再带我去。岚宁笑嘻嘻地说：“你终于多了一个回返故乡的理

由了。”

数次往返后，我与阿祥也渐渐熟络。有个湿漉漉的雨天，餐馆冷清，阿祥忙完了厨务，便坐下来与我们闲聊。

我嗜食茄子，翻看菜单，却发现没有一道菜是以茄子为食材的。好奇地问起时，阿祥良久没有说话，然而，我清清楚楚听到了他深邃的沉默里蕴藏着长长的叹息。当他终于开口时，从他嘴里爬出来的那一串串话，有着火辣辣的痛楚；尽管那事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尽管伤痕已经化成了一个疤痕，可是，有人不经意地戳那疤痕，还是有鲜红的血流出来……

那一年，他16岁。父母住在乡下，以养猪和种菜为生。他是家中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父母忙于农务，两代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厚厚的墙，实际上，他父亲那张木无表情的脸，在他眼中，和一堵墙并无两样。然而，这是一堵让人望而生畏的墙。对孩子，他只会发号施令，一不惬意，一记耳光便夹着万钧雷霆刮过来。

阿祥每天在鸡啼时分起身，步行到简陋的校舍。上学、放学，一回到家，便下田帮忙农务，也烹煮猪菜喂饲猪只，录音式的生活单调得如同一杯白开水。

那一天，住在同村的堂哥阿福怂恿他逃课，到热闹的城区玩一天。“乖乖牌”的他，犹豫不决。心里明明长了一双翅膀，偏偏又缺了一粒胆子。阿福见他迟疑，便使用激将法：“偶尔去玩玩，难道你爸还会将你绑起来毒打？”

他终于点头了，向母亲谎称学校有课外活动，傍晚才能回家。次日一早，穿着校服，拿着书包，怀着忐忑、憧憬而又兴奋的心情，来到约定的地点，和阿福会合，奔向一个陌生的快乐世界。

阿福带阿祥到一家热闹的咖啡店，请他吃鸡丝沙河粉、芽菜鸡、沙爹，一向习惯于粗茶淡饭的阿祥，突然尝到这些别有风味的美食，恍若置身天堂。餐后，阿福带他去看电影，家里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的阿祥，坐在戏院里，像个惊呆了的刘姥姥。

从电影院走出来，银幕上的缤纷影像还在他的脑子里不断地晃动着，阿福意兴勃勃地说：

“走，我带你去纹身。”他迷惑地问：“什么是纹身啊？”阿福说：“待会儿你就知道。”这时的阿福，在他的心里，已经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了，他对阿福言听计从。

阿福要在手臂上纹一条小龙，阿祥不知道自己要纹什么，阿福问他：“你的生肖是什么？”阿祥说：“狗。”阿福说：“好，那就纹一只狗吧！”阿祥点头，可他万万想不到，手臂上的这只小狗，竟然会让他变成了一条“丧家之犬”！

傍晚回家后，父亲发现了纹在他手臂上那条栩栩如生的狗，他的脸立刻“呼”的一声卷起了五级飓风，藏在眼睛里的匕首露出了阴森的凶光，阿祥的身体僵成了一坨铁。父亲跨前一步，挥出一拳，狠狠地击中了他的下巴，把他打了个趔趄，暴喝道：“你这不肖子，什么时候参加私会党的，你说！”在父亲的眼中，纹身就是歹徒的印记，村里闹事的小混混，无一例外的都有着纹身。不善撒谎的阿祥，忍着剧痛，歪着下巴，支支吾吾地说出了白天的经历，这一说更是火上添油了，父亲用绳子将他捆起来，拿起一根木柴，不由分说，便朝他身上抽去，边抽边骂：“你是长子，不给弟弟妹妹立个好榜样，却逃课、纹身，我今天就把你打死，免得祸害社会！”母亲瑟缩在一旁，不敢劝阻，父亲怒火正旺，谁拦他，他准和谁玩命！一道道血红的、鼓突的伤痕在他的手上、脚上、背上浮现，那种痛，像浑身长刺的泥鳅，深深地钻到骨髓里，他忍不住嚎叫出声。晚上，父亲把他丢进柴房。疼啊疼，疼痛化成了细针，插满一身。他伏在地上，如狗般呜咽。突然，母亲的身影悄悄出现在柴房里，她双目浮肿，手里拿着药水，为他轻敷，泪水滴在伤口上，激起一阵又一阵尖锐的痛楚。母亲在他耳边低声说道：“你爸在气上头，你去你伯伯家避一避吧！现在就走。”说着，把几张皱皱的钞票塞进他濡湿的手里，住几天，才回来。他坐起身，噙着泪，哑着嗓子，说：“我，我……”妈妈轻轻抚摸他的头发，哽咽着说：“别说了，我知道，你是好孩子。”这一刻，磅礴的眼泪将他的脸冲得千沟万壑。

他没有到伯伯的家去。

在月色之下，他趑趄趑趄地走到了临近的村

子，藏在一间废弃的小茅屋里，睡了一夜。白天，他像个影子般躺在茅屋里养伤。到了晚上，饥肠辘辘，他潜到农田，看见挂在枝桠上肥硕的茄子泛着紫色的亮光，他偷偷地摘了几根，回到茅屋，狼吞虎咽。生摘的茄子外皮粗韧，内层在不讨喜的苦涩当中夹杂着泥腥的青草味，还有微微的刺喉感，难吃已极。阿祥三餐都以茄子果腹，可怕的味道把他的味蕾噬伤了。

阿福是在第三天找到阿祥的，阿祥死活不肯回家。父亲朝外放狠话：“不回家，就死在外面吧！”在那骨节眼上，阿祥是宁可死在外面的。

“后来，伯伯安排我到距离怡保70公里的小城太平去，在一家小餐馆当学徒。大约十年后，我在太平开了家小食店，一直定居在那里，从来不曾回过家。母亲倒是背着父亲，多次悄悄来太平看我。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他的葬礼上。”阿祥顿了顿，接着说：“父亲去世后，我是为了母亲，才回返怡保开了这家小餐室的。”

伯伯在葬礼上对他说：“别恨你父亲。”他觉得伯伯站着说话不腰疼，然而，伯伯接着说道：“你当年在太平开设小食店，向我借钱，实际上，那些钱，都是你父亲多年的积蓄。你母亲曾多次去太平看你，你以为你父亲真的不知道吗？”说到这儿，伯伯的声音渐趋低沉：“你别忘记，他是你的父亲，始终都是。”

阿祥在父亲的灵柩前跪了一整夜。父子俩在隔了几十年后，一个在阳间、一个在阴间，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达成了和解。

“父亲与我的关系，就好像是生摘茄子，一直都是苦涩的。我现在不吃茄子、也不煮茄子，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我要在记忆里把这一段黑暗的往事彻底删除。”

“其实，烹调茄子有多种方法。”我说：“如果烹煮得好，是人间美味啊！”

阿祥点头，心领神会地说：

“你说得对，我应该把茄子放进菜单里；或许，我也应该为我的孩子烹煮几道美味的茄子菜肴。”

我们相视微笑。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在时间的缝隙中把守

当代文献艺术家许元豪



文图 · 赵宏

至少在20世纪初以前，艺术文献的主要价值是在美术史研究领域，德国艺术史学者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曾使用图像档案进行风格学分析。在这一阶段，艺术文献属于辅助工具而非艺术作品本身。艺术文献真正进入艺术范畴大约是在1960至1970年代，美国犹太艺术家、极简主义艺术创始人之一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提出“观念即艺术”^[1]，使草图、手稿、笔记等文献内容不仅是创作过程的附属品，也是最终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艺术的概念也启发了文献成为艺术对象的可能性。对文本和档案艺术性的强调进一步模糊了文献与艺术作品之间的界限。1968年，德国卡塞尔“文献展”首次引入与档案、艺术理论相关的作品，文献正式进入策展体系，此后，艺术

档案、文献、手稿、笔记等成为艺术展览的重要内容。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历史的特殊安排，在新加坡接入西方当代艺术之肇始，即有如神助或与天感应，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文献艺术家许元豪（Koh Nguang How, 1963-），同期还有另一位以“黄人”闻名亚洲行为艺术的李文（Lee Wen, 1957-2019，新加坡文化奖获得者），对艺术文献也极有见识，曾创办过“独立档案馆（Independent Archive）”项目。李文与许元豪是好友，也是许元豪重点记录的新加坡当代艺术团体——艺术家村（The Artists Village）的成员，可惜不幸早逝，该档案项目亦难以为继。因此，许元豪是新加坡当之无愧的、唯一一位有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文献艺术家，持有近百万件与新加坡艺术史，特别是当代艺术史相关的文献作品。



《“南洋1950-1965：新加坡艺术之路”开幕》，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2002，数码照片（许元豪摄）



《韩国光州亚洲文化中心国际交流计划新加坡艺术档案项目》，2015-2016，数码照片（许元豪摄）

高中生背景的艺术文献先驱

许元豪是潮州人，少年时家住在实龙岗北一带惹兰缶窑（Jalan Hwi Yoh）的村庄里。“缶窑”是潮州话译音，意为瓷窑，该地区以陶瓷业闻名，有多家陶瓷厂，如著名的三美光陶艺（Sam Mui Kuang Pottery）。许元豪早年就读于实龙岗花园附近的实能工艺中学（Serangoon Garden Technical School），喜欢金工、木工和美术，毕业后就读南洋初级学院，对美术兴趣浓厚。他舅舅蔡文家（Chua Boon Kee）是本地有名的雕塑家，对他的艺术倾向有一定影响。1985年，许元豪入职国家博物馆，任策展助理，负责该馆画廊事务。彼时艺术策展主任是新加坡第二任总统本杰明·薛尔思（Benjamin Sheares）的女儿思静流（Constance Sheares）^[2]，副主任是郭苏西（Susie Koay，槟城人），前策展主任蔡荣恩（Choy Weng Yang）刚刚荣休。

许元豪长期以来经济拮据，没钱购买相关出版物，自1980年代初开始剪报和收集海报，并接受艺术家和藏书家赠送的材料，有些是家庭、学校和关闭的书店丢弃的。因工作之便，他有条件以摄影方式记录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各类艺术展览活动。在新加坡美术馆和国家美术馆还没有设立之前，国家博物馆画廊是新加坡最高级别的专业美术学术机构。不过，许元豪记录的并不是作品正面照，那是专属作品识别档案类别的，有专人负责；也不同于大多数官方记录，后者主要关注贵宾和政客。相反，许元豪记录了展览和作品的准备过程、参与的观众和展览拆除等情况。他所拍摄的是作品的其他角度和环境照片以及现场参与者，是作品的辅助参考资料，但正因为如此，许元豪在胶片上摄录的信息更全面、丰

富、完整，也更具文化信息和时代性。

许元豪的艺术档案项目（Singapore Art Archive Project，新加坡艺术档案馆计划）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资源库，在信息数字化之前，在胶片相对宝贵的时代，保存了近百万件与新加坡艺术史相关的海报、目录、剪报和照片，是一座文献宝库。他的作品为过去和现在的艺术家提供了重要纽带，确保新加坡不断发展的艺术景观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如果没有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介入，新加坡早期的当代艺术史可能会模糊不清，语焉不详。这些珍贵的资料几乎占满了他狭小的三室HDB住房。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元豪的艺术文献档案逐步被专业机构和公众所认识，已有不少内容被国家美术馆、新加坡美术馆等专业机构选用，也被美术史专业的师生在研究论文中大量引用。他也因此获得研究亚洲艺术的国际机构认可，先后受邀参与多项研究与驻留项目，如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的新加坡美术史研究、韩国光州亚洲文化中心国际交流计划新加坡艺术档案项目，以及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项目。2002年，他赴日举办“南洋1950-1965：新加坡艺术之路”；2014年在南洋理工大学当代艺术中心举办“新加坡艺术档案项目SAAP@CCA展览”；2017年在东京国立新美术馆举办“SUNSHOWER：东南亚1980年代至今的当代艺术”；2018年在新加坡美术馆（SAM）策划“从这开始——新加坡早期当代艺术活动（1976-1996）：许元豪文献收藏展”；以及2019年在独立艺术空间Grey Projects举办“过去与来临的融化”（The Past and Coming Melt），展示他早年关注环境问题的行为表演性质的装置和摄影作品。



保留艺术家村（TAV）的艺术遗产

许元豪不仅关注艺术文献，自身也是名副其实的艺术亲历者和实践者，是新加坡最具盛名和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团体——艺术家村（TAV）的创始成员之一，深度参与并记录了新加坡的实验艺术和当代艺术运动。彼时当代艺术因独具社会挑战性和强烈的政治表达，过于前卫、怪异，通常不为社会公众理解与接受，遭遇不屑一顾，甚至唾弃，许元豪对艺术家村的艺术家的表演和展览的广泛记录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是不可替代的时代日记。

唐大雾（Tang Da Wu, 1943-）大概是这一群体中最响亮的名字，是新加坡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以绘画、雕塑、装置和行为艺术等多领域的创作而闻名。他于1974年在英国伯明翰理工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完成硕士学位^[3]。唐大雾“1988年在三巴旺罗弄甘巴士鸡寮村落搞艺术活动时，指示牌放‘61B, TANG DA WU’，The Artists Village名称1989年才出现，1992年2月12日正式注册为艺术团体”^[4]，旨在鼓励艺术家进行实验性创作。唐大雾的作品常常关注

环境和社会议题，如1989年的《他们偷猎犀牛，锯下它的角，制成这种饮料》和1991年的《虎鞭》。他相信个人和集体在社会变革中的潜力，探讨国家和文化认同等主题。2024年尾，在品艺画廊（Prestige Art Gallery）举办的展览上，许元豪首次以签名作品的形式完整售出他当年拍摄的艺术家村的部分艺术家影像，其中就有唐大雾表演《虎鞭》这件行为艺术时的照片。

艺术家村另一位较为知名的行为艺术家是李文。李文的父亲鲁白野（1923-1961）是著名马华作家、诗人和马来语专家。李文自幼接受英文教育，就读于莱佛士书院，不谙华文，曾一度表示很惭愧不能很好理解父亲的马华文学成就。他的“黄人（Yellow Man）”系列表演是新加坡行为艺术史上的代表作品之一，创作初衷大概就是他重新认识自己华人身份的一种内心探索与反思。“黄”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中并非中性词，比如yellowdog，不是黄狗，而是指卑鄙小人或懦夫；“黄”也往往与刻板的“黄种人”形象相关。李文借用这一视觉符号，将自己身体涂成黄色，以戏谑和批判的方



《唐大雾行为艺术·虎鞭》，1991，珍珠坊旁空地，35mm正片（许元豪摄）



《李文“黄人系列之三”》，电力站，1993，35mm负片（许元豪摄）

式揭示这些刻板印象的荒谬以及西方文化对亚洲人附带偏见的想象和定位，是对华人移民、亚洲身份及全球化与后殖民时代的思考。

当然，也有部分艺术家的行为举止过于大胆出位。1994年1月1日，黄新楚（Josef Ng）在一场名为《藤条兄弟》（Brother Cane）的行为艺术表演时，背对观众，露出臀部并剪掉自己的阴毛，以此抗议当时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打压。这次表演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应，导致新加坡政府对行为艺术实施为期十年的资助限制，直到2003年才解除。2012年，导演罗子涵（Loo Zihan）在“M1新加坡艺穗节”上重新演绎这场表演，再次引发对艺术审查和表达自由的讨论。《藤条兄弟》表演在新加坡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艺术家对社会议题的直接回应，宣示了“艺术是艺术家的私人表达”以及“为了艺术而艺术”等学院派命题在本地艺术圈概念性死亡。

挑战学术权威

凭借手中掌握的详实文献档案，许元豪曾就新加坡著名画家蔡名智（Chua Mia Tee）的国宝级作品《上国语课》与当时的学术权威机构及新加坡美术馆馆长郭建超（Kwok Kian Chow）展开过一场以展览为叙述方式的学术辩论。该“勘误展”^[5]于2004年9月在新加坡P-10项目空间举行，随后继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展出。

展览全名是《勘误展：第71页，第47版。图片说明。将年份：1950改为年份：1959；许元豪于2004年9月报告》，从名称上看就非常当代，更引人关注的是展览内容所涉及到的两位新加坡美术界顶级人物。郭建超是新加坡美术馆的创馆馆长，在美术领域有深厚学术

背景，曾获颁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他毕业于加拿大新斯科舍艺术大学（Nova Scoti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以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美术史研究院。有意思的是，郭建超也曾于1992年至1994年间在许元豪工作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担任高级策展人。在郭建超的著作《新加坡美术百年史——汇流》^[6]中，许元豪发现了一处错误——郭建超把《上国语课》这幅在新加坡国家历史和美术史上都极为重要的作品的创作年代错误地标注为1959年而不是1950年。此年代经查与画作上的标注及画家蔡名智本人在公开场合确认无误。许元豪此展的目的并不是挑战郭建超，而是希望藉此隐喻性地“恢复了新加坡艺术史上的九年”，促使人们重新评估那段艺术史。展览上同时展出269件文物，包括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出版物、照片、绘画和木刻版画，及与该时期有关的部分画作，以佐证许元豪办展的初心。展览也为参观者提供手套、铅笔和工作表，鼓励他们直接接触材料并进行自己的研究，邀请参与者主动探索新加坡艺术史的细微差别。

《勘误展》体现了许元豪的学术严肃性和历史责任感，尤其是迂回涉及蔡名智及其所领导的赤道艺术研究会在新加坡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曾发挥的重要作用，该团体在1970年代后在本地艺术圈群体性淡出，若隐若现。

困境和局限

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将“档案艺术”的概念引入当代艺术范畴，强调作品与文献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艺术史的面貌并推动美术馆和艺术机构关注艺术档案作为展览内容，例如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等，意义非凡。许元豪的成就是在艺术文献领域对新加坡美术史，特别是当代美术史的巨大贡献和国际影响力。在不计浩繁地记录、收集新加坡艺术文献的同时，他也进行拼贴、摄影、装置艺术和表演艺术。除此以外，他对新加坡摇滚乐发展的记录也十分可贵，曾拍摄新加坡第一支雷鬼（Reggae）乐队IGTA在1980年代演出的照片。雷鬼音乐是一种牙买加风格的音乐，起源于1960年代末，融合了斯卡（Ska）、摇滚和美国蓝调等元素。受哈米什·富尔顿

《勘误展》，2004，P-10展厅（许元豪摄）



(Hamish Fulton) 等英国大地艺术家启发, 许元豪也拍摄城市景观, 记录各种令人惊愕的地表变化及城市转型所带来的情感错位。他收集的新加坡早期南来画家许铁生 (Shui Tit Sing, 1914-1997) 的材料亦让新加坡和中国发现了一位被埋在历史故纸堆里、与国际大师赵无极有密切交集的艺术家。

尽管如此, 许元豪似乎仍是卑微的, 甚至寒酸。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自主创作, 在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没有官方机构支持, 所获收入和资金支持寥寥, 处境艰难,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从容推进理想与追求。他是一位文化守护者, 倾毕生精力为后世保留研究和欣赏新加坡的艺术遗产, 所收藏艺术文献档案涉及范围之广, 令人惊叹, 但他的野心并不大, 只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将住家变成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查阅资料的学术研究空间。

注释:

- [1] The idea becomes a machine that makes the art, 索尔·勒维特1967年首次提出, 见MoMA网站“Collection 1950s-1970s, 415 Idea Art”部分。
- [2] 她是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欧洲艺术史学士, 新加坡大学亚洲艺术史硕士。
- [3] 许元豪称唐大雾未如网上传闻获博士学位, 他早年与TAV成员强调, 艺术家不需要当博士。
- [4] 黄向京, 《成立30周年 艺术村办丧礼? 》, 《联合早报》, 2022年1月22日。
- [5] 英文: ERRATA: Page 71, Plate 47. Image caption. Change Year: 1950 to Year: 1959; Reported September 2004 by Koh Nguang How.
- [6] Kwok Kian Chow, Channels and Confluences. A History of Singapore Art, Singapore Art Museum, 1996.

题图说明:

《自拍像》, 韩国光州, 2015, 数码照片, (许元豪摄)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Koh Nguang How, An Artist and Art History Researcher

At leas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worth of art documents laid in the field of art history research, they served as auxiliary tools rather than as pieces of art. The German art historian Heinrich Wölfflin once utilised image archives for stylistic analysis. Around the 1960s to 1970s, art documents became integral to art when Sol LeWitt, an American Jewish artist and co-founder of minimal art, proposed that "The idea becomes a machine that makes the art", incorporating sketches, manuscripts, notes, and other documents into the artwork. Marcel Duchamp's "readymade" artworks also sparked the idea of documents being showcased as artworks. The emphasis on the creativity of texts and archives further obscured the lines between documents and art pieces. In 1968, the "Documenta" in Kassel, Germany, showcased works linked to archives and art theory for the first time, leading to the integration of art documents into the curatorial system of which archives, documents, manuscripts and notes etc were subsequently used as part of the exhibition to highlight the process of artistic creation instead of just the finished art piece, ultimately becoming a significant element of art exhibitions.

Koh Nguang How's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Singapore's art scene, particularly in documentation, archiving, and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His works establish an ess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past and current generations of artists, particularly those pioneer contemporary artists, ensuring that Singapore's evolving artistic scene is preserved over time.

Koh's Singapore Art Archive Project (SAAP) is a unique resource that maintains over a million artifacts related to Singapore's art heritage. His collection of posters, catalogues, newspaper clippings and photographs serves as a priceless resource for researchers, curators, and artists as well. Without his contributions, a significant part of Singapore's early contemporary art history might have been lost.

Meanwhile, a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Artists Village (TAV), Koh was involved in Singapore's experimental and contemporary art movements. His thorough documentation of TAV's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provides an irreplaceable record of one of Singapore's most significant art collectives.

Singapore's art scene has undergone rapid transformations, lacking significant formal institutional backing for historical records in earlier times. Koh's efforts address this void by providing contemporary audiences access to past exhibitions, performances and critical discussions. His archives have been featured in major exhibitions and cited by organisations such as th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Koh's commitment to Singapore's art heritage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with his works showcased in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South Korea and several regions of Europe. This not only elevates Singapore's art landscape internationally but also establishes him as a key figure in Southeast Asian art documentation and record-keeping.

Despite his contributions, Koh's work has mostly been self-initiated, functioning without the backing of official institutions for a large part of his career. The challenge ahead is to ensure that his archives are accurately digitised, preserv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Singapore's wider historical narrative.

Koh Nguang How is a crucial figure in Singapore's art history, serving both as a documentarian and a cultural custodian. His lifelong commitment ensures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can explore and appreciate Singapore's artistic legacy. Nonetheless, increased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could further strengthen and safeguard his effort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柳川漫漫 其叶萋萋 萋萋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父亲的故事

1939年，祖籍福建龙岩的丘絮絮（原名若琛）携妻苏菲（原名玉桂）及年仅两岁的长子柳漫南下新加坡。

1909年出生的丘絮絮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19岁那年，他即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诗集《昨夜》。六年后，他的另一部诗集《骆驼》出版。

1935年，他已有诗歌在马来亚《槟城新报》副刊《无线电台》发表。

南来新加坡的丘絮絮最先受聘于中正中学，后辗转沙撈越及南北马各州府十余载，担任中小学教师或校长等职。

1952年，回到新加坡的丘絮絮受聘于新加坡华侨中学。1952年至1954年间，他曾主编《南洋教育》半月刊。1953年，他还主编了由星华中学教师会出版的《南洋青年》半月刊。该半月刊成为当时中学生最喜欢的读物之一。

南来后的丘絮絮一直没有停止过文学创作，内容皆取材于新马本地。1950年至1960年间，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荣归》《学府风光》《在大时代中》《沉滓的浮起》《大时代中的插曲》《房东太太》《变》《坎咪之死》等。同一时期，他还出版了中篇小说《播种者》及诗集《生之歌》《呼吁》等。

1967年2月16日，被称教育小说家的丘絮絮因罹患肺癌过世。

1980年，李汝琳为他编辑出版了散文集《龙园小品》。2002年，新加坡文艺协会推出“已故作家作品丛书”，《丘絮絮小说选》位列其中。他的这些文学作品对于研究1930年代新马华人社会的风俗民情有着一定的学术及历史价值，也为研究南洋教育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丘絮絮与妻子共育有五子二女，长子柳漫及四子柳川后来也踏入了新华文坛。

成长岁月

1949年7月25日，丘柳川出生于马来亚柔佛州的麻坡，他是父母的第六个孩子，男孩中排

行第四。

柳川有关人生的最早记忆可追溯至他三四岁的时候，那时他们一家已回返新加坡，租住在一栋黑白洋房的其中一间屋子里，他清楚记得屋前有一片绿茵茵的草地。

不久之后，他们搬至父亲就职的华侨中学教师宿舍。那是一栋半独立式平房，除了客厅和厨房，还有两大一小三个房间。

每天早上，父亲带着大哥柳漫去华侨中学，母亲载着二姐柳雪、二哥柳晖及三哥柳欣去自己就职的道南学校，柳川和弟弟柳庄则留在家里由保姆阿婶许怡白女士照顾。

六岁那年，柳川也挤进了妈妈的小轿车里——跟哥哥姐姐们一样，他也成为道南学校的一名小学生。

入读小学的前两三年里，柳川常常因扁桃腺发炎引起的发烧头疼而缺课。小三那年，医生为他切除了扁桃体。病愈后的柳川因缺课太多留级一年。升入高年级后，他的学业成绩很快便稳居全班前三名，英文成绩更是数一数二。

小学毕业后，柳川跟哥哥们一样进入华侨中学。中三分科时，他选择读理科。第一年成绩还不错，中四那年，他因数学不及格而排名靠后。升入高中后，他果断转入文科班，总成绩稳居全班第一。

这一时期的柳川开始接触台湾现代诗人的作品，他最喜爱的是余光中和周梦蝶的诗作。

柳川高一那年的下半年，父亲因罹患肺癌入院接受治疗。父亲手术那天，他正在参加最后一门考试，级任老师潘老师要他答完考卷后赶快去医院探望父亲。

次年的2月16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八，柳川父亲与世长辞。

初涉文坛

父亲的离世是柳川生命中的一大转捩点，他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这一年（1967年），他开始了诗歌创作。父亲去世不久，他的学生寒川写了一首诗对老师表示悼念，题目为《火中的诗》，发表在《星洲日报》“青年文艺”版。看到寒川的这首诗，柳川百感交集，他也提笔为亡父写了两首悼诗，一首是《春节，你的生命止于零度》，另一首是《当你来的时候》。前一首在父亲逝世一周年

后以蓁蓁为笔名，发表于梁明广主编的《南洋商报》“文艺”版。这是他的处女诗作。

柳川给自己取笔名蓁蓁，是为了与父亲的笔名絮絮对应（出自《诗经·周南·桃夭》中的“其叶蓁蓁”）。

接下来，一首接一首诗作似涓涓细流，从蓁蓁的笔下流淌而出，他称之为“冲动的产物”。

次年，他把其中的25首诗作集结成书，是为他的首部诗集《塑像》。

1969年，蓁蓁的大哥柳漫以孟仲季为笔名，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诗集《第一声》，收录了他自1954年至1969年间创作的33首诗作。

初涉文坛的蓁蓁已是新加坡大学（国大的前身）中文系的一名大一新生，大哥孟仲季则于1960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

在为自己出版诗集的过程中，蓁蓁在印刷厂遇到了当时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牧羚奴（陈瑞献），他和大哥因此得以结识了一群热现代诗歌创作的年轻人。每逢星期天，他们便雅集于陈瑞献家，大家谈文论道，畅所欲言。这群同道中人除了蓁蓁兄弟及他们已结识的陈瑞献跟梁明广外，还有南子、文恺、流川、英培安、谢清、吴伟才、沈璧浩、莫邪、夏芷芳（陈瑞献妹妹）、零点零（本名颜学渊）等共计15人。后来，他们中的几个人共同注册了一个出版社——五月出版社，准备整理出版自己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诗文。

1970年，牧羚奴（陈瑞献）、林方、南子、完颜藉（梁明广）、贺兰宁、文恺、流川、谢清、吴伟才、沈璧浩、孟仲季、莫邪、夏芷芳、零点零、蓁蓁等15人的诗歌合集《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由五月出版社出版。

除了诗歌创作，蓁蓁还涉猎文艺评论。1970年，五月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首部论文集《蓁蓁论文集21》。

那一年，他21岁。

大学遇恩师

1968年，蓁蓁入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

除了蓁蓁，他的二哥、三哥也是在籍大学生。母亲一人只能为他们提供学费，生活费得靠他们自己。

蓁蓁收了三四组小学生，课余时间为他们补习华文、英文和数学，每月可赚取一百多块补习费。除了吃穿用度，他还有钱看电影。每周



秦秦部分作品

三下午，他都会去友联书局买《学生周报》。大学毕业后，友联书局的女职员巧音成了他的另一半。

这个时期，他遇到了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的恩师——在新大担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大二、大三这两年，秦秦选修饶教授的韵文选读课程。内容涵盖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博古通今的饶师对古典文学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令他受益匪浅。

秦秦记忆最深的，是饶师讲授的汉赋和宋词。

讲授汉赋时，饶教授选的其中一篇是西晋政治家陆机的文学评论——《文赋》。饶师对《文赋》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与分析，其中论及创作过程的部分，其分析尤为生动。那时的秦秦热表现代诗创作，对文艺评论也有所涉猎，他还读了不少西方文艺批评的书籍与文章。受到饶师的激发，他写了一篇《陆机及赋论创作过程》，尝试用新的观点阐释陆机的《文赋》。作业上交后，饶师给出了指正意见，秦秦稍作修改后再呈交上去。当时的文坛前辈连士升先生正在《南洋商报》主编一版纯学术性的副刊——“学海”，饶师把这篇论文推荐给连先生，使其得以在“学海”版发表，令秦秦兴奋不已。饶师对宋词颇为偏爱，他对宋词的结构及意境的论述往往独辟蹊径。在课堂上，他对常人较少提及的长调（字数较多，篇幅较长的词牌）也颇为重视。受到饶师的鼓励，秦秦写了一篇阐释吴文英的《莺啼序》及周邦彦的《兰陵王》这两首长调的论文。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他1975年出版的第二部论文集——《秦秦论文集》里。

1971年，秦秦获取二等甲级荣誉学位，当年毕业的中文系学生无人获一等荣誉学位，获二等甲级的仅他一人。

服完兵役后，秦秦于1974年开始在新加坡大学修读硕士课程，师承李恩涵与吴之光，四年后获硕士学位。

他的硕士论文题目为《中国抗战文艺与新马华抗战文艺的比较研究》。多年后，这部论著被列入“新加坡文艺协会文论丛书”，于2004年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

以诗奏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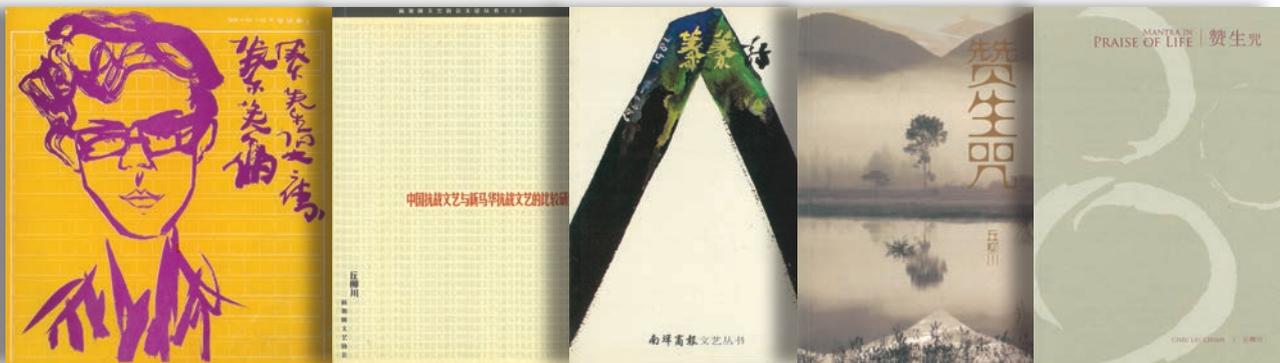
获取硕士学位的秦秦开始进军广告界。他先在一家日本广告社担任高级经理，两年后先后被两家美国广告公司挖角。1984年，他自己开公司做老板，至2015年退休。

自1967年开始诗歌创作，秦秦一直在探索中成长，被陈瑞献称作“有自家面目的诗人”。

1981年，他的第二部诗集《秦秦诗》被列入“南洋商报文艺丛书”，由南洋商报印行出版。该诗集收录了他自1967年至1981年间创作的85首诗作，这部“把陈词滥调化为神妙”（陈瑞献语）的诗集在出版后的第二年（1982年）获“全国书籍理事会诗作奖”。

停笔十年后，秦秦于1991年再次提起了笔。

那是1992年的春节期间，自小受大哥影响而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的秦秦特地休假在家。他什么也不做，每天听意大利作曲家马勒的九首交响曲，以及这位作曲家去世前三年创作的取材于汉斯·贝特格的《中国笛》，也就是取材于唐诗的千古绝唱——《大地之歌》。一星期后，秦秦一气呵成《赞生咒》初稿。这部由《春怀》《夏梦》《秋兴》《冬诀》四部分组成的长诗可以说他在以诗奏乐，还原了马勒第一至第九交响乐以及《大地之歌》的意境。12年后，该长诗发表于《联合早报》文艺副刊。15年后，也就是2007



年，《赞生咒》付梓出版。

《赞生咒》的出版年份，是特意选择的。

这一年是蔡蔡之父丘絮絮过世四十周年纪念，也是其母苏菲过世二十周年纪念，同时也是自小即照顾他的保姆阿姨许怡白女士过世十六周年纪念。他把这部长诗献给自己一生中最为敬爱的这三个人。

后来，时任吉宝企业董事长的林子安先生赞助出版了《赞生咒》中英双语版，英文译本翻译为陶宗旺（本名吴伟立）先生。

柳川漫漫

除了诗歌及文艺评论，中英文兼通的蔡蔡一直有个愿望，那就是把自己读过的英文原著及其作品介绍给本地华文读者。

自2010年起，他陆续以本名丘柳川在《联合早报》副刊“文艺城”发表了二十余篇此类文章。

同一时期，他还以桑部美次为笔名，每两周一次在《联合早报》副刊“说食在的”版写了大概两年介绍美食的专栏——“食得爽心”，计二十余篇。

此外，他的微型小说《失踪》、随笔《音乐随想》分别于2006年及2016年发表于《联合早报》“文艺城”及“缤纷”版。2018年2月6日，国学大师饶宗颐过世。半个月后，蔡蔡纪念恩师的文章《忆饶师》发表于《联合早报》“文艺城”。

蔡蔡的下一部文集正在筹备中。

更令人期待的，是他的下一部诗集。

“柳川漫漫，其叶蔡蔡。”

国学大师熏陶出来的现代诗人，应该不会排斥这一主题吧。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后记

丘絮絮的大名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专访里，孟仲季、蔡蔡兄弟的大名则是从伍木那里听说的。

“通过采访蔡蔡写丘家父子三人”，此等好建议，我怎能不欣然接受呢？

于是走入蔡蔡位于西部的公寓，在楼下的一间活动室里跟他一起追溯、梳理——他的父亲、他的大哥、他自己。

怎样的主题才能把他们父子三人连在一起呢？采访结束后的两三天里，我快速翻阅着蔡蔡赠送的他的诗集和文论集。

第二次诵读他的《赞生咒》时，其中的《夏梦》篇触发了我的灵感。之所以用“诵读”，是因为这一次我真的是一字一句地朗诵着他的长诗，那种强烈的画面感令我一下子回到了从前，回到了我最为熟悉的乡野。“柳川漫漫，其叶蔡蔡。”这八个字从天边飘向我的耳际。诗意盎然，意境悠远，就它了。

蔡蔡说他恃才傲物，读了他的诗，觉得再正常不过。他是真的有才。

感谢伍木！

用笔守护记忆 以心传承文化

柯木林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初次拨电联系柯木林先生采访时，他正身在海外，语气温和地回应说：“等我回国后再联络吧。”原以为他公务繁忙，或许会淡忘这个口头之约，未曾想到，他归国后第一时间便主动致电安排会面。我们相约在麦里芝蓄水池与植物园之间的新加坡日本人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见面。虽离他住所颇远，但因这里清幽静谧、远离尘嚣，早已成为他多年来的心灵栖所。正是在这片安宁之所，他沉心著述，完成了多部重要著作。

柯木林于1948年7月5日出生在海山街（Up-

per Cross Street 克罗士街上段）81号的陈大药房。他是家中长子，排行第二，仅次于同父异母的姐姐。在他之下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家境虽谈不上富裕，却也自给自足，生活无忧。

童年的感动 历史的召唤

上小学一年级时，父母原本打算为他报读英校，但因错过入学报名时间，最终选择了公立大侨学校（Tar Keow Public School）。大侨学校虽校舍简陋，却师资优良，学风严谨，品德与学术并重。尽管物质条件有限，老师们却以满腔热忱和责任感，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这一切使柯木林的求学之路充满了启迪与动力。

“记得在小学三年级时，我参加了一次作文比赛，题目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内容讲述了准备过农历新年的愉快心情。结果这篇文章获得全校公开组第一名，并由当年校长刘俊楷亲自颁发奖状给我。”这次经历不仅成为他日后投身写作的美好起点，也让他意识到，文字不仅能抒发情感，更能打动人心、留下深刻的印记。

自幼，柯木林便对历史人物和英雄传奇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酷爱收听新加坡广播电台以闽南话播讲的《五虎平西》，也爱看《杨家将》的连环画。小学六年级时，他接触了第一本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始涉猎大量名著，其中尤以《水浒传》最为钟爱。他常被书中人物命运与情感牵动，或为悲欢离合潸然泪下，或因情节跌宕而忘却饥饿与睡意。至中学二年级时，他已博览诸多中国古典名著，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西厢记》《西游记》《说岳全传》《粉妆楼》《说唐》《宋太祖征南唐》等。柯木林沉醉在这些文学经典中，如



幼年时照片，中坐者为大姐，右边站立者为柯木林



1964年刘抗老师指导柯木林绘画

饥似渴地汲取着其中的精神养分。这些书极大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也培养了他对文学的热爱。

小学毕业后，柯木林于1961年升入德明政府中学就读中一，并于1966年完成高中二年级。德明政府中学是一所顶尖、有着优秀传统的华文学校，它拥有一流的校园设施和师资。除了美术老师刘抗是著名画家外，校长陈人浩的书法也享有盛誉。

是什么缘由促使柯木林对历史产生兴趣呢？原来，中二那年，历史教师王映雪生动有趣、富有表现力的教学方式激发了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记得有一次，王老师在讲解清朝覆灭时提到，尽管清朝在1911年被推翻，但末代皇帝溥仪仍在北京，并鼓励学生有机会去见一见他。王老师的一番话，点燃了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兴趣，他开始大量购买相关书籍，并萌生了希望一睹末代皇帝风采的念头。

此外，1966年柯木林读高中二年级时，新加坡上映了轰动一时的中国电影《甲午风云》。片中邓世昌在甲午海战中的壮烈牺牲，令他深受感动，自此他开始系统性地收集邓世昌的资料。

“从这些亲身经历中，我意识到要培养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普及历史知识是十分重要的。潜移默化的普及工作，对引起人们学习历史的兴趣，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也正是我日后不辞辛劳，从事新加坡华人史普及工作的出发点。”

从中文梦到历史志 大学里的抉择与历练

起初，柯木林有意在大学攻读中文系，但高二历史课潘先钦老师的一席话，改变了他的学术轨

迹。潘老师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常劝诫学生道：“能选其他科系就选其他科系，别轻易选择中文系。”这番话令柯木林陷入思索。在仔细打听和权衡后，他发现南洋大学设有历史系，便毅然决定改读历史系。

在大学期间，他活跃于校内团体，积极参加历史学会和佛学会的社团活动。1968/1969年他担任南洋大学历史学会刊物《读史劄记》编辑，接着在1969/1970年他被选为佛学会副会长，负责该会刊物《贝叶》第4期及第5期编辑工作。同时，他也和商学院同学王励谦（曾任新加坡达利银行总经理）等共同筹款出版《社会科学研究》（季刊）。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了他在学术编辑与组织策划方面的能力，也为他日后活跃于华人社团、主持大型史册编撰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职场写史 从公务到文化扎根

1971年，柯木林毕业于南洋大学历史系，荣获一等文学荣誉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曾短暂执教于德惠中学约半年，随后进入关税局工作一年。1972年，他转职至建屋发展局，开启了长达16年的公务生涯。在

建屋局任职期间，除专注于本职工作，他亦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加入中峇鲁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并于每周三晚上协助该区国会议员庄日昆接见民众。他在社会基层组织中持续服务约16至17年，随后逐步将精力转向宗乡会馆的事务。同时，他始终笔耕不辍，陆续出版多部著作。



“在我负责管理的区办事处中，河水山区办事处尤为令我印象深刻。我认为这片地区极具历史意义。它是旧住宅区，曾在新加坡历史上多次发生严重火灾，因此此处的居民，多是在灾后重建中迁回的。”

基于这段经历，他开始着手搜集资料，并于1983年联合国档案及口述历史馆、建屋局河水山区办事处，出版了《河水山组屋区的形成：从荒芜到进步》。书中收录了173张珍贵的历史图片，记录了河水山历经1934年、1961年与1968年三次大火后的重建历程，生动呈现了该地区如何从废墟中重塑新家园。此书不仅是第一本聚焦政府组屋区的图文集，更被誉为新加坡首本地方史专著，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

在建屋局工作期间，柯木林亦致力于推广新加坡华族历史与文化，积极投身多项社会职务。早在1985年9月，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尚在筹备期间，他便在首任秘书长蔡锦松的推荐下，于1986年至1995年间出任首任学术主任，连任十年。1995年因海外工作离开宗乡总会，直至2010年再度受托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三十载光阴，柯木林亲历并见证宗乡总会自创会至“而立之年”的发展历程。

前十五年间，学术委员会以推广、普及、整理与保存华族历史文化为核心任务。2010年重返岗位后，柯木林带领团队，围绕新加坡华人历史文化主轴，系统策划并举办多场国际研讨会、专题讲座与文史展览，广泛接待学界与媒体访谈，搭建起学术与公众交流的平台，进一步奠定委员会在学界的重要地位。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的努力深受学界肯定，并与中国厦门大学等学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新加坡华人历史文化的研

究注入新动能。1990年，随着新加坡政府推动组屋管理私营化，柯木林被调任至建屋发展局旗下子公司——

怡安产业公司（EM Services Pte Ltd），出任产业经理，负责市镇理事会的物业管理事务，并兼任市镇会总经理与秘书长。1994年6月，他调离市镇会；自1995年至2010年，他转任怡安（中国）产业公司总裁，长期在中国从事房地产与物业管理工作。

在华15年，是他人生中极具意义的一段时期。其间，他常受邀前往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授课，参与中国房地产领域的高端论坛与会议，亦多次接受当地报刊、杂志等媒体采访。此外，他结合新加坡的物业管理经验，并因应中国的国情与法规制度，编写了《物业管理运作指南》。该书出版后广受欢迎，不仅风行一时，更成为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及高等院校的重要参考书。

以史为志 写尽新加坡华人百年风云

对柯木林而言，历史研究是千秋大业，是他的第二生命，著史生涯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早在1973年，他在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的鼓励与指导下，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利用业余时间寻幽访古，实地勘察新加坡有代表性的华人古迹，每周一篇文章，轮流发表在《星洲日报》副刊《星云》，最后更将这些文章集辑出版《石叻古迹》一书。然而，此书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反观他的另一部著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却获得了新加坡政府社会发展部1988年度学术著作奖。1995年，他又编著了《新华历史人物列传》。这是一部系统载录新加坡华人历史人物生平的典籍，共收录了1819至1990年间的1176位新加坡杰出华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

“一般人认为历史枯燥乏味，但我谈历史时很接地气，总是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绝不死板。历史不是关于死



柯木林与其部分著作



人的故事，而是透过前人的经验，为后人指引方向。历史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特别喜欢研究历史人物。人物传记就是强心剂，告诉你成功人士是如何渡过困难时期的。”

正因如此，柯木林始终坚信，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传播与启发。他认为，唯有将历史深入浅出、贴近生活地呈现，才能唤起大众的兴趣与共鸣。早在1992年，他便萌生了编写一部《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宏愿。此后二十余年，他默默耕耘，广泛搜集新加坡历史的方方面面，并于2012年正式向宗乡总会提出这一设想。最终，这部心血之作于2015年，在新加坡建国50周年与宗乡总会成立30周年之际出版面世。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第一部以中文撰写的新加坡华人通史性著作，也是自1923年宋旺相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问世以来，另一部重要的新加坡华人史学巨构。本书横跨14世纪至今，全面呈现新加坡华人在各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社会角色与重要贡献。李显龙总理亦盛赞此书为“献给华社的一份珍贵礼物”。

全书共18章41节，字数逾80万字，厚达800页，堪称鸿篇巨制。作者团队涵盖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中国香港及澳洲等地共37位在不同学科领域深具造诣的专家学者。而柯木林作为总编辑，却谦称自己不过是这项大型出版计划的“项目经理”。

2019年6月，为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年，《新加坡华人通史》的英文版*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问世。这本著作由柯木林和曾任新加坡国家博物院院长的柯宗元共同担任主编，由26名作者和7名译者合著。

多年来，柯木林致力于推广、丰富与弘扬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深远，备受肯定。2015年1月，他获新加坡文化、社区与青年部、国家艺术理事会及国家文物局联合颁发“SG50奖牌”，以表彰他在推动本地文化活动方面的积极参与和努力。2019年5月，他再度荣膺第三届“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个人奖项，进一步肯定他在华族文化传承与发扬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这些荣誉不仅见证了他对文化使命的坚持，也象征社会对其多年耕耘的最高认可。

不止于记录 与新加坡华人历史的延续与传承

早已退休的柯木林，如今却比在职时更加忙碌，几乎未曾停歇。他经常应对来自各方的咨询、访谈邀约、学者引荐以及资料推荐等事务。2021年8月，他担任宗乡总会制作的《新加坡秘踪》视频系列的历史顾问，继续发挥其专业所长，将历史研究与社会传播紧密结合。近年来，柯木林的兴趣逐渐转向整理新加坡古籍及撰写家族史。在整理古籍方面，他已出版《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2020年11月）与《新加坡风土记校释》（2024年4月）；在家族史方面，则先后出版了《家风传承：陈笃生家族史》（2022年7月）和《义结金兰庆德会》（2023年8月）。此外，去年他受厦门公会委托，正在编辑《闽南文化在新加坡论文集》一书，预计将于2025年底前出版面世。

与此同时，柯木林也积极参与文化遗产的传播与推广。2018年，他担任人文纪录片《共生缘》的学术顾问，这部六集的纪录片系统地梳理了峇峇和娘惹文化。2020年6月6日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和欧美台向全球播出，收视率排名第37。在柯木林穿针引线促成下，今年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具有200年历史的峇峇组织庆德会与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联合展出《守望相助：新加坡庆德会的故事》图片展，向国际社会展示峇峇娘惹文化的独特风貌和深厚底蕴。

柯木林以一贯的坚持和清晰的历史使命感，见证并参与了新加坡华人历史的书写与整理。他的研究与著作不仅为学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资料，也为公众打开了理解本地华人社会发展的窗口。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不应高高在上，而应贴近生活、服务社会。多年如一日的耕耘，使他成为新加坡华人文化与史学领域的重要推动者与桥梁人物。他的工作，不仅丰富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内涵，也为本地史学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正因如此，柯木林不仅是记录历史的人，更是历史的一部分。

随着岁月推移，柯木林的历史足迹已深深镌刻在新加坡华人文化发展史上。他留下的不只是一本本史书，更是一份对本土文化命脉持续追索与深切关怀的精神典范，值得世代铭记。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集各种艺术于一身的音乐奇才易有伍



文·郭永秀
图·受访者提供

喜 欢音乐的朋友一定听说过香港雨果制作公司HUGO Productions (HK) Ltd.。这家公司制作了许多风靡中国、东南亚乃至全球的高品质唱片，被称为HiFi（高度传真）唱片或者发烧碟。几十年来，雨果唱片引领了HiFi唱片或发烧碟的潮流，是中国最知名，也是最早的发烧唱片公司之一，其出色的录音与母带制作水平、严谨而丰富的文字内容与精美的包装，赢得广大乐迷和音乐发烧友的一致赞誉。

雨果制作公司的特色是出版中国民歌民乐、戏曲曲艺、管弦乐作品，以及由中国人演奏或指挥的外国音乐专辑。鲜有人知的是，雨果公司的创办人和制作人是一位新加坡人，他就是音乐家出生的易有伍。易有伍致力于开拓中国民族录音的新领域，发掘和培养中国音乐人才。雨果唱片在他的坚持下，如今已成为全球知名的民族音乐品牌，为无数优秀的华人音乐家提供了平台，从而推动了中国民族音乐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雨果旗下阵容强大，云集了吴兆基（古琴）、陈培勋（作曲）、曹桂芬（古筝）、夏飞云（指挥）、朱哲琴（歌唱）、张维良（埙、箫），以及陈蕾士、李汴、邱雾、戴琦、罗小慈、祁瑶、林乐培等众多民族音乐艺术家。此外，雨果还与华裔小提琴家薛伟和钱舟，华裔大提琴家兰洁等华人艺术家广泛合作。同时，雨果还与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中央民族乐团、华夏室内乐团、上海音乐家协会少女合唱团、青岛少年儿童合唱团等优秀艺术团体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

录音技术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雨果公司在录音设备和录音技术方面，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雨果公司的当家录音师易有伍1977年到香港中乐团任演奏员，后又任香港音统处任二胡老师与乐队指挥。1984年后从事音统处推广组的工作，1986年创建了雨果唱片公司。

易有伍涉猎广泛，活跃于多个领域，包括音



乐演奏、指挥、教学、编曲、音乐行政管理、唱片录音、后期制作（Mastering）、HiFi音响、绘画、书法、摄影等。

1995年我受邀在职总的“心电台”FM100.3与广播员“开心”庄联合主持每周一次的音乐节目，节目内容包括古典、流行、爵士、民歌、华乐、交响乐、古典音乐、新世纪音乐（New Age Music）、原始音乐、地方戏曲、歌剧选曲、现代音乐、校园民歌、世界经典、民族音乐等。这些节目的来源主要就是雨果公司的唱片。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雨果公司的制作，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对易有伍这个人有了深一层的了解。

第一张令我惊艳的雨果激光唱片是《黄孩子》。这张属于新世纪音乐的华文歌曲唱片由一位年轻女歌手朱哲琴演唱。她以其激情、感性、音域宽广、如天籁之声的嗓音，加上深沉低回、撼动人心的低音，开启了歌曲新天地。雨果的制作，特别是在民族音乐的保存、发扬和传播方面，把唱片质量大幅度提升到HiFi的境界，对音乐界及音响界的影响极大。朱哲琴过后曾经录过另一张《阿姐鼓》的唱片，在中国销量超过一百万张，全球销量达300万张。

摄影与HiFi音响方面各有成就

此外，易有伍在摄影方面也颇有造诣，许多雨果唱片封套上的照片都是他亲手拍摄的。他开始摄影的时候，用的是Yashica、中国国产的海鸥牌，后来又逐步过渡到更好的器材如Angenieux等。他曾在新加坡举办过三次摄影展，其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93年他在新加坡Paragon购物中心举办的摄影展轰动了本地摄影界。他对摄影器材更是如数家珍，对各种



1993年，易有伍指挥高雄市立国乐团演奏《月儿高》

不同品牌的器材的优劣和特点了如指掌。近年来他还从事绘画，画中国画、油画、书法等，并举办了多次展览会。在艺术界或文化界，易有伍不啻是一位当代奇人。

我跟易有伍真正近距离接触是在20世纪90年代本地的一次HiFi音响器材展览会上。那是谭泽江主办的一场年度HiFi器材展，特别邀请他过来讲解一些唱片制作花絮，以及HiFi唱片与器材的优缺点。我在展览会上与他见面，感觉有点相逢恨晚。像他这样不管做什么都能做出成绩的人，私底下却是一个平平实实，对人彬彬有礼、行事低调的人。

去年趁着他到新加坡“度假”省亲，前青年华乐团二胡演奏员的老友黄珊，特别安排我与他做了一次专访。多年不见的易有伍，除了头发花白以外，岁月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他看起来仍然精神矍铄、容光焕发，说话不急不徐，一派怡然自得的样子。我想：沉浸于各种艺术之中，深受艺术的熏陶与感染，享受着艺术给予他的滋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就在他居住的组屋楼下，听他娓娓道来这一生奇迹般的机遇和事迹。

他说年轻时加入国民服役，起初感觉这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但是后来才发现：国民服役对年轻的他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懂得如何随遇而安，随机应变；使他思想更加成熟，更有自信，更加能确定自己以后要走的路。

自学演奏、编曲、配器

1955年，易有伍出生在一个清贫家庭，小时候他住在阿里瓦街（Aliwa St）一间老店屋的二楼，楼下是商铺。全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生活。为了贴补家用，他小学时曾卖粽子和春卷等熟食。当时家附近有许多间善堂，善堂里面经常有人在奏乐，耳濡目染之下，易有伍喜欢上了音乐。最先是自学笛子，在崇正小学的时候他参加了合唱团，唱男高音声部。

中学易有伍进入博理中学，当时的同学有李诸福、罗长浩及后来的朱文昌等。中二的时候，他当了华乐队的队长，负责演奏扬琴。他也喜欢摄影，是摄影学会的会长。当时在华乐队里还有蓝营轩、陈美娥、陈维胜、黎仕凤、曾献峰等，可谓人才济济。

高中他就读于东林工艺中学，在那里几乎天天逃课，只为全心投入华乐。当时与他一起沉迷于音乐探索的，还有谭泽江。那个年代华乐刚刚起步，乐谱极为稀缺，他们只能靠黑胶唱片自己记谱，慢慢摸索出编曲和配器的方法。对各种乐器的演奏技巧，也全靠自学：听录音、看录像、读书查资料，再自己反复研究、练习。这种“无师自通”的学习方式带来的后果就是，演奏技巧的学习不够规范，但他出于对华乐的热爱，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不同乐器的演奏技巧，乐此不疲。

高中时期，他已经开始在华中初级学院教华乐，学生包括陈景文、卓丽梅、洪彩兰、Sam Tan等人。那时他还经常带乐队到新加坡广播电台录音，广播员陆月馨经常邀请他们录制华乐节目。除了合奏曲目，他还常演奏独奏曲，如刘文金的《三门峡畅想曲》《豫北叙事曲》等。这些作品难度极高，是当时二胡演奏者的“试金石”。他改编的《山歌与采茶调》也曾由朱文昌演奏并录音，朱文昌后来成为香港中乐团的笛子首席。

1968年至1972年，易有伍参加了新加坡教育部属下的青年华乐团，随团赴菲律宾、香港、瑞士、马来西亚等地演出。带队的是杨票敬，

一位为人豪爽、乐于照顾年轻人的长者。1975年，易有伍加入了人民协会华乐团，继续深耕本地华乐的发展。

毅然离开新加坡到香港发展

跟随青年华乐团去了一趟瑞士以后，易有伍感觉到，假如这一辈子要在音乐上有所成就的话，就必须离开新加坡。因为当时的新加坡正处于建国初期，注重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在文化上很难有所发挥。因此，易有伍在结婚后的第二天，就毅然离开新加坡到香港去寻求发展。

1977年，易有伍跟吴大江离开新加坡到香港，一同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香港中乐团，担任二胡及高胡演奏员，成为中乐团初创时期的核心成员。待了一年半以后，薪资始终没涨。刚好香港音乐统筹处招募二胡教师，易有伍就报名应聘，自此开启了一段新的音乐之旅。他一边在统筹处教学，一边指挥多个乐团，如香港爱乐民乐团、青年中乐团、理工学院民乐团等。

1982年他转向艺术行政管理，管辖青年交响乐团，管乐团和中乐团等。1980年底到1989年期间，他一周要指挥五个乐团，每周平均演出四场，足迹遍及香港各个中小学。他还曾经指挥并带领香港爱乐民乐团到新加坡、台湾、美国等地演出。

有几次海外演出，易有伍录制了音带带回香港，松青唱片公司的老板听了很感兴趣，便主动替他出版了由爱乐民乐团演奏的三盘卡式录音带。后来香港其他唱片公司也开始邀请易有伍录制作品。就在这一时期，他为香港青年交响乐团录制了《芬兰颂》、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廉斯的《英国组曲》等，这可以说是他成立雨果公司的开始。

1986年，易有伍创建“香港雨果制作有限公司”。有些人以为“雨果”是取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家雨果（Victor Marie Hugo）的名字，其实不然，实际上是取自他自己的英文名 Yugo（有伍 Yew Goh）。雨果成立以后，他赶赴成都、上海、北京等音乐学院，录制了许多濒临失传的古琴曲，其中有张子谦、孙裕德、吴兆基等人的演奏；同时还制作了古筝系列和香港有名的新世纪音乐林乐培的创作。1994年，他到莫斯科录制了几张本地作曲家潘耀田的乐曲。其实这些录音并不赚钱，雨果的主要收入来





易有伍的画作



雨果公司制作的古琴唱片

自替别人的唱片录音及后期制作。

几十年来，易有伍和太太许黎姿共同经营雨果公司。雨果最大的贡献，是把许多濒临失传的民族音乐留下了录音，同时把早年录音效果奇差的黑胶唱片重新录制成激光唱片（CD）。这项工作影响了一两代人，对民族音乐的复兴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新加坡人，易有伍多年来积极推动新加坡本地音乐的发展。他曾为本地音乐家潘耀田、罗伟伦等录制了多张唱片，邀请叶聪到香港与香港小交响乐团合作，指挥并录制唱片，借此介绍和宣传新加坡华乐团。他把HiFi录音的概念，运用到他所录制的激光唱片中，开创且带动了HiFi激光唱片的新潮流。我们今天能够听到如此清晰无噪音的激光唱片音乐，不得不感谢易有伍所开创的HiFi音乐世界。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易有伍有着异于常人、非常敏感的听觉，他对所有的音乐，从古典到现代，从西洋到中国，从艺术到流行，他总能洞察每种音乐的优劣。在录音过程中，任何细微的杂音都无法逃过他的“金耳朵”。

制作“天碟”、办画展和摄影展

在HiFi激光唱片领域，易有伍不仅在交响乐、华乐、民间音乐和现代音乐方面做出了成绩，在通俗歌曲方面，易有伍也替张学友、陈淑华、张惠妹、苏芮、蔡琴、邓丽君等许多著名歌星的唱片进行后期修复，也参与了一些电影原声音乐的制作，如电影《功夫》的音乐等。现今他所制作的许多激光唱片，都是HiFi迷经常拿来试音的所谓“天碟”。

退休后的易有伍目前定居广东省佛山顺德，因为那里的天气好，附近又是美食中心。在那里他有自己的工作室、录音室和货仓。他经常往返于顺德、香港和新加坡三地。每年也会前往西藏摄影、修行，趁机锻炼身体，广交朋友。他说趁着现在身体还不错，可以走得动就到处走走，有时也开画展或摄影展，这都是他享受生活的方式。

提到雨果公司的情况，他说近年来已经比较少出唱片了，因为当年一出新唱片，虽然都非常畅销。但中国许多小公司看到有利可图，就疯狂地抄袭录制，仿冒品泛滥。耗尽心血，辛辛苦苦录制的新唱片，无良商家大量的盗版复制，根本无法再做下去。

回顾其一生，易有伍集音乐演奏、编曲、教学、指挥、行政管理、录音、唱片制作、HiFi音响、绘画、书法、摄影等各种艺术于一身，不管在哪个领域里都能做出好成绩，这是因为他的认真，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他对音乐的热情和执着，以及对民族音乐的使命感。而像他这样的人才，当年只有离开新加坡才能在艺术领域发光发热，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令人钦佩的是，易有伍虽然离开新加坡几十年，但从未考虑过放弃新加坡的国籍，他仍然以新加坡人自居。易有伍是新加坡的骄傲，也是音乐界和音响界的骄傲。

题图说明：

2024年10月易有伍摄于西藏阿里冈仁波齐峰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从吴素琴的艺术人生 看新加坡芭蕾舞的发展



文·蔡曙鹏
图·受访者提供

“芭蕾”源自拉丁文的Balloon，原意为跳跃。说起Balletto（意大利语）、ballet（法语、英语）或芭蕾舞，人们脑海里就会出现舞者轻盈的舞步、快速的旋转、飞腾的弹跳、典雅的柔情、足尖的溜动。芭蕾舞最早诞生于15至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西方古典芭蕾剧目如《天鹅湖》《林中仙女》《胡桃夹子》

等在欧亚美洲与拉美，赓续不断，风格多元。亚洲芭蕾舞家，更以本地题材，创作出地域特色鲜明的芭蕾舞剧目，如中国的《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等。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日本、韩国各有本土风采的创作芭蕾舞剧目。

最近，一本从侧面反映了芭蕾舞在新加坡开枝散叶的书出炉——吴素琴和潘明彦合写的《爱

的牵系》(Love Connects: My Life in Dance)。这本书共309页,包含140张黑白和彩色照片,记录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新加坡芭蕾舞艺术家吴素琴在海内外舞台上的精彩瞬间,以及她在新加坡芭蕾舞学院和新加坡舞蹈剧场主持工作时的珍贵镜头。吴素琴1971年接管姐姐吴素妮创办的新加坡芭蕾舞学院,为数代新加坡舞者提供了专业指导。她是出色的新加坡芭蕾舞演员,也是芭蕾舞教育家,更是新加坡首个专业舞蹈团创办人。在《爱的牵系》这本书中,已成为专业舞蹈员或其他领域的学生,都异口同声表达了他们对心目中的好老师的敬爱与一位芭蕾文化传承者的感激。

巴西班让的艺术之家

大海、大树,陪伴吴家十个兄弟姐妹的童年。在这个父慈母爱相得益彰的讲华语、英语、福建话的家庭,双亲的言传身教,让孩子们内心充满安全感和自信。琴声舞影为家里增添生活的乐趣。这里也是新加坡戏剧的摇篮,素琴的大哥诸福,戏剧资深前辈王秋田(1905-1990)、刘仁心(1924-2002)、潘明智(1929-2003)、郑民威(1926-2000)等,就聚集在巴西班让的吴家大院,电光火石一般擦出了火花,成立一个华语剧团的梦,在此起飞。最终,艺术剧场在1955年4月16日成功注册。

吴素琴和大海有着深厚的情缘,看大海,潮起潮落。听大海歌唱,伏在海边的长椅上看书,和弟弟诸珊在海边欢腾起舞。十四岁的她在南洋女中念中二的时候,来自法国的电影导演Serge Bourguignon,到芭蕾舞学校物色他的电影《海之星》的演员,一下子便挑选了素琴扮演神话里的大海女神。他说,“我的故事需要一位有诗般的外貌、又有巨大魅力的演员。这个角色,实在适合她。”这部在红灯码头、新加坡河和大世界拍的电影,只拍了9天,整部戏没有台



吴素琴(中)和潘明彦(左)在《爱的牵系》发布会上和唐振辉部长(右)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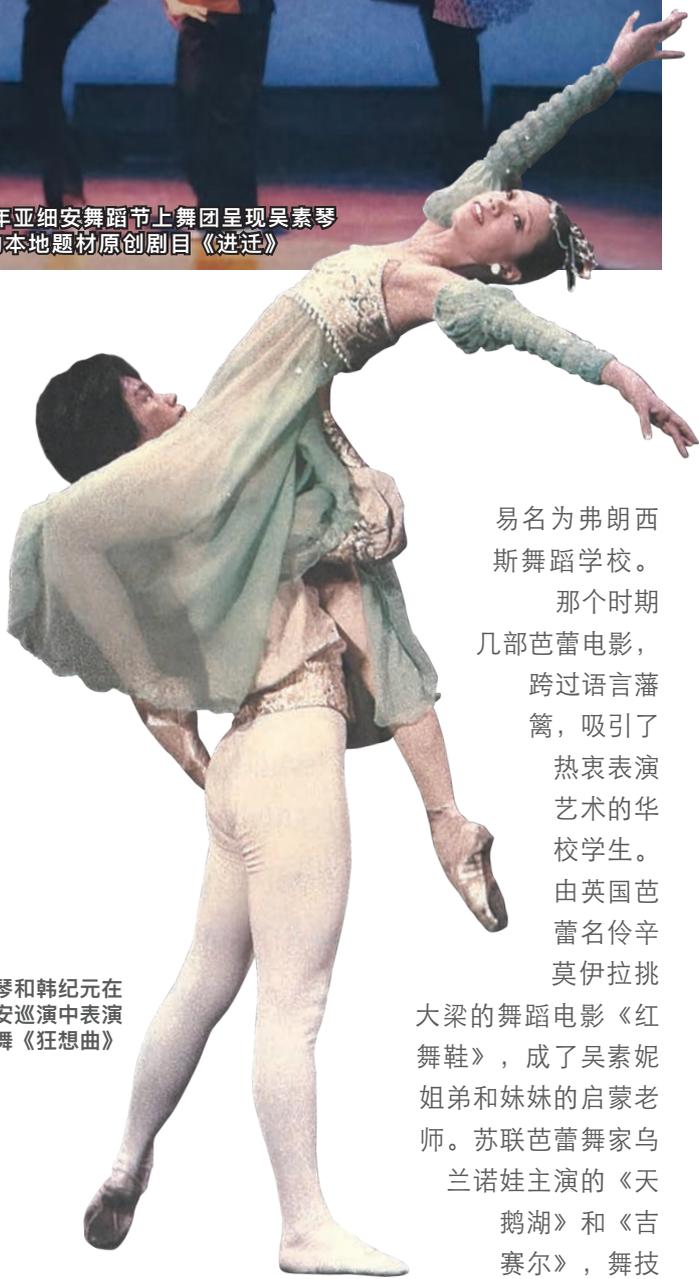
词,表演全靠眼神、体态传达情感。小小年纪的她,要让扮演的角色令人相信,情感得来自内心的感受,需要做不少表情。到2018年,吴素琴才第一次看到这部1958年拍的短片。翌年,她在芭蕾舞学院的创作舞剧《明黛》里,被编导选为舞剧的女主角,当时她只有十五岁。

兄姐的启迪与引导

1930年代,一批来自英国的老师,如Angela de Martinez, Vyner Comez, Signe Green, Hilda Wright等人在新加坡开班教授芭蕾舞。这个外来的舞种,因为有严格且系统的训练方法、技术规范 and 完整的芭蕾舞动作体系,很快在英语社群找到知音。他们在当时的圣安德烈教课,首都戏院演出。战前,本地人叶莫德琳(Maudrene Yap)也有不少学生。1954年她移民欧洲前,把学校交给了弗朗西斯(Frances Poh)和来自苏格兰的辛弗洛里(Florrie Sinclair),舞蹈学校



1985年亚细安舞蹈节上舞团呈现吴素琴创作的本地题材原创剧目《进迁》



吴素琴和韩纪元在亚细安巡演中表演双人舞《狂想曲》

易名为弗朗西斯舞蹈学校。

那个时期几部芭蕾电影，跨过语言藩篱，吸引了热衷表演艺术的华校学生。

由英国芭蕾名伶辛莫伊拉挑大梁的舞蹈电影《红舞鞋》，成了吴素妮姐弟和妹妹的启蒙老师。苏联芭蕾舞者乌兰诺娃主演的《天鹅湖》和《吉赛尔》，舞技精湛，让华语

源流学校的青少年对这个新鲜的舞种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为寻求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走向独立的运动时期，华校青年满腔热血，学马来语、马来

舞、印度舞、芭蕾舞，期望通过跨文化艺术的学习，充实知识涵养，为建设“马来亚文化”贡献力量。其中两位脱颖而出的芭蕾青少年，就是吴素琴的姐姐吴素妮和她的五哥吴诸捷。

为了让自己的舞艺更为精进，1952年吴素妮和念完初三的吴诸捷，飞往英国，以奖学金得主身份进入伦敦的萨德勒·威尔斯（Sadler Wells）芭蕾舞学校（后改名为皇家芭蕾舞学校）。他们学成归来后，和来自上海的挚友石赐美，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共演出了三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海峡时报》是这样报道的：

“素妮、诸捷和赐美体现了沙德勒威尔斯舞蹈学校的辉煌。他们的纪律、自信和个性，成就了闪闪发亮的高质量”。接着他们到马来亚、泰国和香港巡演，是最早把芭蕾舞带到邻国的新加坡舞者。载誉归来后，吴诸捷想继续深造，一心要向正在北京教舞的苏联著名芭蕾舞者古斯夫（Pyotr Andreyevich Gusev）学艺。他毅然飞往中国，开始了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几年后，他成为中央芭蕾舞团德艺双馨的顶尖舞蹈家。

吴素妮则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只身坐火车到槟城、吉隆坡教舞，因为有了际遇而传舞。她在日后带领一群学习芭蕾舞的华校生北上巡回演出。这些舞蹈员包括吴文国、李锡君、邱瑞发、颜明理、叶慧贤、梁巧珍、吴素琴和吴诸珊。当时，素琴只有11岁。

新加坡芭蕾舞学院

在新加坡摆脱英国殖民地统治，成为自治邦前夕，吴素妮和石赐美合办的马来亚芭蕾舞学院，与马迪尼斯（Vernon Martinu）办的弗朗西斯舞蹈学校合并为新加坡芭蕾舞学院，吴素妮和弗朗西斯担任创校校长。弗朗西斯舞蹈学校的英文源流的学生，和马来亚芭蕾舞学院的华文源流的学生，在这里产生美好的文化碰撞。他们一起参加1958年新加坡芭蕾舞学院成立后的第一部作品——弗农编导、吴素琴主演的《明黛》。素琴自幼弹得一手好钢琴，对音乐的旋律、速度、节奏和情绪有敏锐的感知力。就像拍《海之星》一样，她的舞蹈充分展现了角色内心的思索和感情。尽管获得导演的高度赞赏，年幼的素琴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少年时代得来的各种艺

术经验对她人生的深远影响。

原创舞剧《明黛》1958年公演后获得观众热烈支持。同年8月14日至20日，新加坡芭蕾舞学院舞团吴素妮校长、弗农夫妇带领50个学生在福康宁山上的文化馆连演七场，所有收入作为优秀舞蹈员出国深造，以及有潜力的学生在学院持续学习的奖学金。芭蕾舞学院给学生提供系统专业的训练奖学金，帮助有志于芭蕾舞的学生从系统化基础训练到专业化训练。学院还定期组织演出，推出原创剧目如取材自马来民间传说的《复仇之魂》（1967）和《码头交响乐》（1967），成为芭蕾舞学院的优良传统。

澳洲芭蕾舞学校的第一位亚洲学生

1961年穿梭在欧亚的澳洲芭蕾舞名家佩吉·范普拉格女爵（翌年成为澳洲芭蕾舞团的创团团长）路过新加坡，受邀访问新加坡芭蕾舞学院，和吴素妮、弗农夫妇一起为资深舞蹈员排练古典芭蕾舞剧《吉赛尔》的双人舞。吴素琴在排练场上表现出众，佩吉女爵不假思索推荐她进入正在筹建的澳洲芭蕾舞学校。1964年，吴素琴成为进入该校的20个学生中唯一一名新加坡学生。那里名师荟萃，吴素琴博采众长，日迈月征，目标明确，有着强烈的责任感。1966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

好像是上天的安排，吴素琴在南洋小学的同学张东孝当时也在澳洲念书。偶遇，重逢，爱情的蓓蕾初绽。1969年底，两人在澳洲缔结连理，开始书写一个幸福家庭的故事。然而，不久后突然接到父亲离世的噩耗，这对她是巨大的打击。

就在吴素琴初为人母的时候，她的姐夫钢琴家李金星受邀到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姐姐随姐夫移居温哥华，正好她的家公要张东孝回新加坡加入家族的事业。她回到新加坡，从姐姐手上接过管理新加坡芭蕾舞学院的重任，从1971年到2016年卸任，前后共45年。

书写新加坡芭蕾舞学院的新篇章

六十多年来，芭蕾舞学院培养了大量优秀的芭蕾舞演员、舞蹈编导和舞蹈教师，为本地芭蕾舞界和教育界输送了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回

看她当校长期间，带领学生创作、演出，代表新加坡参加亚细安文化交流，其中包括她编导与演出的《狂想曲》（1977），《再说再见》（1978）；1977与作曲家甘奇勇合作的《寺音诗》（1978）和《五情》（1982）；与作曲家Bernard Tan合作的《境迁》（1985）。此外，她也多次带领学生出演古典芭蕾舞剧目，如欧洲1800至1850年间浪漫主义艺术运动时期的《帕吉达》（*Paquita*）（1978），著名的芭蕾舞古典剧目《四人舞》（*Pas de Quatre*）（1983）等。在管理、教学、为学生排练之余，还能在台上一次又一次靓丽登场，我想：这是源自吴素琴对芭蕾有着刻骨般的强烈情感，才有如此能量，在芭蕾的花圃中，绽放出一朵又一朵令人惊艳的奇葩。

吴素琴领导下的学院，一路来组织各类舞蹈表演大师班、工作坊，鼓励学生参加国际芭蕾比赛，为年轻舞者搭建展示才华的平台。吴素琴也曾担任国际芭蕾比赛的评委，提升了新加坡在国际舞蹈界的知名度。1970年代，青年剧社华族舞蹈团为了提高表演能力，安排了主要演员华丽、华亮、郭淑女、林锐标、陈桂月、吴淑虎等到芭



蕾舞学院学习。吴素琴严格的系统训练，让他们迅速进步，该舞蹈团之后完成了《黄鹤的故事》和《巴督山的传说》等四部舞剧的创作。

新加坡舞蹈剧场

成立于1970年的国家舞蹈团，以创作和演出华、巫、印三大民族的舞蹈为主。1983年笔者被王鼎昌部长领导的文化部委任为舞蹈咨询委员会主席时，负责组织1984年艺术节的舞蹈节目。当时芭蕾舞已在新加坡发展了约半个世纪，已经在舞蹈文化群落中生根。笔者认为需要将其纳入国家舞蹈团。因此，那年的艺术节包括了以华人节庆为题材、本地舞蹈家编导的华族舞蹈晚会，由印尼客卿舞蹈家编导的马来舞之夜，由帕玛博士编导、华巫印舞蹈员合演的《瓦利的婚礼》，还有由吴素琴和邓添福领导的国家舞蹈团芭蕾舞组呈献的《芭蕾舞之夜》。

这个附属于国家舞蹈团的芭蕾舞组，在吴素琴和邓添福合力引导下，水到渠成地组建了专业舞蹈团。1988年，新加坡第一个专业舞蹈团——新加坡舞蹈剧场诞生了。其中有三位来自国家舞蹈团的成员和一位来自马来西亚、三位来自

菲律宾的舞蹈员。在吴素琴和邓添福的苦心经营下，逐渐发展成为拥有22名专业舞者的闻名世界的舞团。

吴家四兄弟姐妹都是世界芭蕾舞坛的佼佼者。他们的声望搭就了新加坡舞蹈剧场和欧美与中国的友谊虹桥。舞蹈剧场排演了许多古典芭蕾和现代芭蕾的重要作品，其中包括吴诸珊等多部代表作，还有乔治·巴兰钦、纳乔·杜阿托、伊日·基利安、安德列·普戈夫斯基等国际知名编舞家的名作。不论是《茶花女》《红鞋》《安娜·卡列尼娜》《灰姑娘》《安魂曲》《吉赛尔》，或是融合了东西方舞蹈元素的《彩虹河》，以及在滨海艺术中心开幕礼上首演的《追忆月亮》，每一次演出，团员的精彩呈现和团队的完美协作，为舞蹈剧场赢得了口碑和佳评。

舞蹈剧场还通过各种教育和外展项目提高公众对舞蹈的认知。除了面向学校的艺术教育项目外，它还与滨海艺术中心合作推出舞蹈鉴赏系列，让中小学生得益。剧场在福康宁公园的户外舞蹈活动——“星空下的芭蕾”（Ballet Under The Stars），也是一个广受欢迎，提高民众对舞蹈认知的平台。舞蹈剧场鼓励团员原创作品，在舞季里呈献他们的节目，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舞团的剧目也更显多样化。

1995年，邓添福病逝后，吴素琴独挑大梁，带领新加坡舞蹈剧场走上国际舞台，在墨尔本（1999）、莫斯科（2003）、法国（2001）、墨西哥（2002）、英国（2005），中国（2007）等地呈献舞蹈演出，圆满完成一次又一次文化外交的光荣任务。

胸怀大海的吴素琴，退休后暂停了忙碌的快节奏生活，她从容写下《爱的牵系》。对比每一个人生阶段的艺术追求、瞬间的高压挑战，回看家人和朋友的聚散，单线、平行线、交叉或填满欢乐的圆圈。因为爱，珍惜爱，她把人生爱的同心圆写下来。她的故事，也是新加坡芭蕾舞光辉的一页。

题图说明：吴素琴为新加坡舞蹈剧场上课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吴素琴和丈夫张东孝在他们创办的私人博物馆合影

新谣的传播 与新加坡文化记忆



文图·周秀杰

新谣是1980年代新加坡华族年轻人所创作的华语歌曲，反映了当时华族年轻人在身份认同上的迷茫与探索。新谣萌芽之初，广播、电视等是新谣的重要推手，近年来新谣作为一个重要母题，通过新加坡文学作品、电视剧、电影等艺术形式跨媒体传播。新谣的诞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是1960年至1975年出生的一部分新加坡华校生的集体记忆。1990年代之后在新谣式微之时，它却渐渐成为华族文化的重要符号，也被新加坡政府逐步认可。近年来，李显龙等领导人在国庆群众大会多次提及新谣，联结了政府与华族民众之间的情谊。

新谣的文化意义与大众传播

新谣从一开始便充满了自下而上的文化创作精神，虽然受台湾民歌风格影响，但它融入了新加坡本土的多元文化背景。其音乐风格简单、旋律流畅、歌词贴近生活，突出了新加坡华族年轻人对自身文化认同和社会变革的表达。以华语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南洋大学于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后，华文中学学子产生了焦灼、无奈与彷徨的情绪，需要情感抒发，促成了新谣的诞生。新谣的主题不仅限于怀旧和青春，也涵盖了社会关怀与个人情感，与主流的爱国歌曲不同，新谣更关注个体情感的抒发和社会现象的反思。

新谣的成功传播离不开广播、电视等大众媒

新谣诞生的报道（图源：联合早报）



介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广播和电视节目为新谣提供了广泛的平台，特别是在《歌韵新声》等节目中，新谣歌曲频繁播放，使其迅速走入公众视野。新谣的受众逐渐扩展，从校园深入到整个社会。在这些媒介的帮助下，新谣不仅成为了那一代年轻华校生的表达方式，更在新加坡的文化建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新谣的文化价值不仅通过音乐本身体现，还通过影视作品得到了再创造与传播。在新加坡华人电影中，新谣作为华族文化符号，成为了重要的叙事母题，《轨道》《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我们的故事》等影视作品，将新谣的歌曲和时代背景紧密结合，通过影像叙事传递新谣的精神。新谣的审美特征在影视作品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再创作，它们成功地将新谣的文化情感传递给了更广泛的观众。

新谣的发展，源自新加坡这个移民社会的特殊背景。作为移民的后代，新加坡华人所经历的文化交织、历史割裂，使得他们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面临复杂的文化身份问题。新谣正是这种文化多样性与自我认同追求的产物。在这种多元文化的语境下，新谣通过融合马来、印度、华族等文化元素，在音乐语言上找到了属于新加坡的独特声音。尽管新谣的编曲较为单一，歌词有辞藻堆砌、意境欠缺等问题，但它在上世纪80年代以一种轻松而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将复杂的文化背景转化为公众能够接受的艺术表达。

新谣的文化地位与话语构建

新谣是新加坡一代人的集体记忆。1984年《明天21》专辑的发布，那一年，许多新谣歌手年约20岁，充满朝气与梦想。新谣已然深刻影响了这段时期的年轻人，尤其是出生于1975年前的人们，他们的青春与新谣紧密相连。而对于当今新加坡50岁以下的民众而言，这段历史已经无法让他们感同身受。

新谣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它还在更长时间为新加坡的音乐产业提供生长的土壤，一批知名的新加坡音乐人孕育了优秀的新加坡歌手。新加坡新谣代表人物许环良、黄元成、吴剑峰、许南盛、张家强创建的海蝶音乐制作公司在华语音乐界举足轻重，旗下的陈洁仪、林俊杰、阿杜、金莎等歌手在华语乐坛



《明天21》专辑

为大众所熟知。而新谣代表人物之一，以《邂逅》一曲频频登陆电台音乐龙虎榜的巫启贤至今活跃在银幕上，这些新谣代表人物的作品不仅延续了新谣的旋律与情感，也逐步将新加坡文化推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然而，当今新加坡青少年对新谣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随着新加坡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并迅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1980年代后期出生的许多年轻人已无法完全理解当时新谣带来的文化影响，他们的成长环境与父母辈大相径庭。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价值观的多元化，这一代人更倾向于追求个人梦想与国际化的视野，而非关注本土的文化认同和历史反思。于是，近年来新加坡面临的一个尴尬的现象是，部分年轻人到欧美发达国家留学，毕业后就不回国效力了。因此，如何寻找属于新加坡独特的文化记忆，建立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显得尤其重要。

在这一过程中，新谣代表人物所创作的歌曲，逐渐成为了一种带有强烈怀旧色彩的文化符号，它不仅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情感记忆，也无形中成为了新加坡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正如梁文福创作的《天冷就回来》歌词所唱：“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喔，妈妈眼里有明



白，还有一丝无奈……”新谣的情感与思考通过戏剧、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传递给了更广泛的观众群体，使得新谣的精神得以超越时代与空间的局限，进入到更深层的文化话语体系中。新谣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中的一股文化力量，它以一种轻松、随性的姿态，映射出了新加坡人对文化、对国家、对未来的想象与探索。

自1985年至1990年，新谣节每年举办一次，直至2003年，新谣得以复办。部分新谣参与者认为新谣存在于90年代之前，现在保留的是新谣的精神。2014年7月6日，由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导演邓宝翠等人策划的新谣分享会在百盛楼中央广场书城举办，邀请了梁文福、许南盛、巫启贤、颜黎明、潘盈、黎沸挥、刘瑞政等人倾情演唱，盛况空前，再次证明了新谣持久的影响力。

如今，新谣依然在新加坡的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官方逐渐认识到新谣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重要活动将其作为核心内容，帮助华族年轻一代更好地理解 and 认同自己的文化脉络。例如，2014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时，引用了梁文福《细水长

流》中的第一句歌词“年少时候，谁没有梦”，他还提到了吴佳明演唱的《小人物的心声》是他最喜爱的歌曲，“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贡献”。由此可见，新谣作为新加坡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和联络华族情感的桥梁，被普遍认可和采用。这些细节充分表明，新谣不仅仅是音乐历史的一部分，更是新加坡文化与华族情感的纽带。

新谣的历程充分说明了一个文化现象如何通过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继续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虽然如今原始形态的新谣已经消失，但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仍在今天继续影响着新加坡的音乐人和年轻一代。

自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新加坡便踏上了经济建设的飞速轨道。回望往昔，聆听那些曾滋养了一代青年心灵的美妙旋律，或许，这些悠扬的音符依然能触动今天新加坡年轻人的心弦，让他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与力量。

（作者为厦门理工学院影视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学者）

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培育

林汉河医生



文图·陈煜

1946年1月4日林汉河医生(1894-1983)获颁爵士勋衔,成为继宋旺相律师(1871-1941)之后第二位获此荣衔的马来亚华人。两位基督徒的年纪相差一代,都是出生于新加坡的英籍民,就读于莱佛士书院,后前往英国深造,返回新加坡后成为专业人士与社会改革者,作为华族精英参政议政,被视为效忠英国的海峡华人。

长期以来新马华社鲜少论及林汉河的社会贡献。1920年至1941年间由林博爱主持编撰出版的《南洋华人集传》多达五册,收录南洋各地三千多位华族名流,却没有记载林汉河。1950年本地出版的《新嘉坡华侨名人传》,以中英双语

介绍本地华族先贤,包括林文庆医生与宋旺相爵士等,亦没有关于林汉河的信息。目前所知最早关于林汉河及其兄长萃龙医生经历的短文,是由宋旺相撰写发表于1923年出版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此文被翻译收录于1995年出版的《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笔者在研究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时,注意到林萃龙与汉河兄弟是该机构创办时位列第四的捐款人,在2023年出版的《林氏大宗祠九龙堂·祖德宗功》的中英双语书中,以一个章节介绍这个祖籍厦门禾山前头社的家族,围绕兄弟二人在九龙堂供奉的五尊神主牌位,追溯他们父亲林清沙的南来生平,两兄弟的求学经历、社会成就与家庭状况。本文进一步以林汉河早期的求学与工作经历为切入点,展示英国殖民时期马来亚海峡华族专业人士的成长以及社会观念的形成。

海峡华人的本土教育

林汉河的父亲清沙出生于厦门禾山前头社,少年时南来星洲经商,事业相当成功,本地媒体称其为“地主”。他与周幼娘所生的长子萃龙与次子汉河,以学业优异而闻名,新闻报道称他们是“新加坡加东林清沙的儿子”。天资聪慧的两兄弟年纪相差3岁,都接受英文教育成为医生,分别在槟城与新加坡开设思明药房,活跃于海峡华人社团,进而参与英国海峡殖民地的政务。

林家两兄弟的成长得益于华族家庭对于教育的重视,亦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本地教育体系逐渐完善,富裕的华商家庭能够支持子弟远赴海外深造。宋旺相在其著作中简要介绍了林汉河的求学经历,当时两人关系密切,这些信息极有可能是林汉河所提供的,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节对林汉河在新加坡的学习经历做进一步分析,呈现当时海峡华人的本土教育。



林汉河在爱丁堡拍摄的毕业照
(图源:宋旺相,《新加坡百年华人史》)



1906年位于百胜路的莱佛士书院（图源：Roots）



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图源：网络）

林汉河于1912年6月底前往英国伦敦，在此之前他已在新加坡医学校完成两年学业，推测是1910年毕业于莱佛士书院。林汉河曾提及在该书院读了五年书，进而推测其在校时间是1905年至1910年。在进入莱佛士书院前，他曾在崇正华校（1903年创办）与圣安德烈教会学校（1863年创办）就学。在返回新加坡后，林汉河创办并担任圣安德烈书院校友会的会长，在1921年12月底举办的一周年庆祝晚会上，他致辞说：“这里是我智力启蒙之地，如今是新加坡最好的学校之一。”

对于林汉河早期教育影响至深的是由莱佛士于1823年创办的莱佛士书院，最初的名称是新加坡书院，现在的名称最早见于1866年的年报。1860年代，该书院提供的课程包括阅读、写作、拼写、听写、作文、语法、历史、圣史、地理、代数、天文学、年代学、自然科学、哲学、三角学和地球仪的使用等。1870年代，莱佛士书院在百胜路建成相当规模的校园，1879年女校正规化。1886年莱佛士书院开始提供大学前教育，这对于新加坡是划时代的壮举。一年前英国海峡殖民地设立高等教育教学金（1890年更名为女皇奖学金），该书院学生博得头筹，林文庆与宋旺相成为最早获得此项奖学金前往英国留学的华族学生。

莱佛士书院于1903年转为公立学校，因能提供高中教育，得以招募新加坡各所英校最好的中学毕业生，林汉河是其中之一。除了教授学生知识，莱佛士书院早在1886年成立辩论社，随后是板球俱乐部等各类文体学生组织，所提倡的辩论与体育精神对于成长中的林汉河有着深远影响。因为优质的生源与教育，该书院除了女皇奖学金得主，也有富家子弟出国深造，他们的成就刊登在书院简报，亦出现在马来亚各报刊，这对

于在校学生是莫大的激励。英国留学返回新加坡后，林汉河加入1923年8月23日注册成立的莱佛士校友会并担任委员，创会主席是宋旺相。

留学英国的祖家情节

莱佛士书院毕业后，林汉河与兄长萃龙一样进入新加坡医学校学医。1911年12月与1912年5月刊登的该校考试成绩显示，一年级学生林汉河先后通过了物理与骨科考试。然而，18岁的他于1912年6月25日乘船前往伦敦，抵达后聘请私人补习备考，次年进入爱丁堡大学继续习医，这显示当时马来亚与英国在教育资格认证上并未完全接轨。

林汉河前往英国继续学医的原因不明，可以确定的是其家庭足以支持高昂的留学费用，且对于爱丁堡大学的医学教育有所了解。事实上，他的莱佛士书院先辈——马来亚第一位获得女皇奖学金的海峡华人林文庆，1887年至1892年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并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当林汉河进入爱丁堡大学时，林文庆的长子可胜也在那里学医，1914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各科职业考试。也是在这一年林汉河获得初级实践解剖学二等荣誉称号。

1918年10月，林汉河通过爱丁堡大学医学学士与外科学士学位（M.B.Ch.B.）的最终考试，于10月12日在苏格兰登记注册医学执业资格，他所登记的地址为新加坡桥北路662号。不难推测林汉河在为返回新加坡做准备，很快地找了几份短期工作以累积经验与资历。首先他得到爱丁堡大学两位高级讲师的推荐信，包括Robert A. Fleming医生（日期为1918年10月14日）与David Wallace医生（日期为1918年10月21日）。两位老师都称他是勤勉尽职的学生，对于工作充满热诚，充分掌握了临床医学知识。



新加坡医学院最初的校址 (图源: ROOTS)



新加坡医学院1911年增建的陈德源楼 (图源: ROOTS)

带着他们的推荐信,林汉河随后前往苏格兰圣安德鲁工作了大约两个月,担任J. Hunter Paton 医生的助手。Paton 医生是圣莱昂纳兹与圣凯瑟琳女校的医疗官,在日期为1918年12月16日的推荐信中,他称林汉河是高效、忠诚与能干的助手,对他的工作表现相当满意:“他的专业技能娴熟,诊断迅速准确,有着丰富的治疗知识,病人往往为他文静绅士的举止与机敏所吸引。任职期间他住在我家,家里所有成员都很喜欢他。”

结束了短暂的校医助手工作后,林汉河带着 Paton 医生的推荐信前往英格兰巴恩斯塔普尔,进入北德文郡医院担任住院医师。在这家医院工作了六个月后,林汉河赢得了两位主管医疗官的赞赏与推荐。在日期为1919年5月7日的推荐信中,Herbert C. Jonas 医生写道:“他表现出非常高的工作效率,在麻醉工作和各种普通内外科病例的监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是位非常令人愉快与忠诚的同事,我满怀信心地祝愿他未来一切顺利。”在日期为1919年5月30日的推荐信中,Walter Cooper 医生写道:“他的医术令医务人员和病人非常满意。他博览群书,拥有精湛的实践技能,是名出色的麻醉师。他是位有教养的绅士,与他共事非常愉快。”

结束了在北德文郡医院为期半年的工作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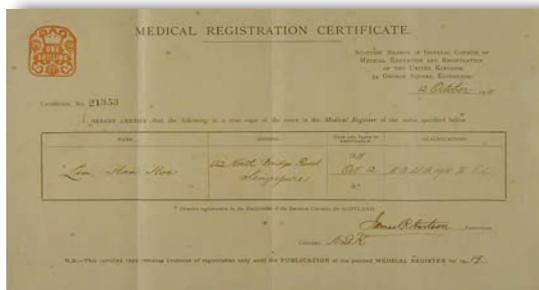
林汉河等待新的工作机会以返回新加坡。很快他接到来自海洋轮船有限公司与合众轮船有限公司利物浦办事处医务监督的来信,这份日期为1919年6月18日的信函,通知他获聘担任该公司的随船医生。这份工作结束了林汉河在英国的7年青春岁月,而他一生对于祖家有着深厚的情感。

专业精英的社会贡献

大约在1919年末1920年初林汉河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凭借着英国执业医师证书与五封英国医生的推荐信,家境富裕的林汉河很快在海山街8号开设思明药房。事实上,他的兄长林萃龙医生在新加坡医学校毕业后,于1914年前往檳城任职于地区医院,很快辞职开设了思明药房。这两家药房有着相同的中文名称与不同的英文名称。作为专业人士归来的林汉河,立刻受到本地新朋故友的欢迎。1920年7月17日,留学前就参加的社团海峡华人文学协会,为他和另外两位学成归国的医生举行接风仪式。

林汉河喜爱文学、音乐与体育,热衷于歌唱、朗诵、辩论与演讲。在爱丁堡留学期间,他专门到Heriot Watt学院师从演讲学专家James Cook Newlands,于1915年获得演讲技巧与公共演说艺术一等奖章。1920年10月22日,业余绘画协会、华人基督徒协会、欧亚裔文学协会和海峡华人文学协会联合举办,由林文庆医生担任主席,林汉河在基督教青年协会礼堂进行了题为“文学的解读”,介绍当时本地鲜为人知的演讲学方法,吸引了众多观众。

能言善辩的林汉河关注社会问题,很快在各海峡华人、基督教、文学与体育团体担任要职。例如,1920年12月他已担任海峡英籍华人公会荣誉秘书。林汉河的崛起也是海峡华人社群所期盼的,需要合适的人选代表华族在殖民地政府中



林汉河的英国医学注册证书 (图源: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英格兰巴恩斯塔普尔的
北德文郡医院 (图源: 网络)

The Nurturing of A Straits Chinese Intellectual: Dr Lim Han Hoe

Dr Lim Han Hoe (1894-1983) was honoured with a knighthood on January 4, 1946, becoming the second Malayan Chinese to be awarded the title after Sir Song Ong Siang (1871-1941), a lawyer.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to illustrate the nurturing of a Straits Chinese intellectual in Malaya and how his views on nation and community were shaped during that time.

Lim Han Hoe's father, Cheng Sah, was born in Chengthau Village, Subeng County (now known as Xiamen) and arrived in Singapore at a young age. His first son, Chwee Leong and second son, Han Hoe, who were born to Chew Eu Neo, were notable for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 two brilliant brothers, three years apart in age, were educated in English and became well-known physicians in Penang and Singapore, respectively.

Lim Han Hoe studied at the Raffles Institution (RI) for five years, likely from 1905 to 1910. Following his graduation from RI, he joine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Medical School (renamed King Edward VII College of Medicine in 1921) to pursue a medical education. He embarked on a long journey to London on June 25, 1912 to further his medical studies in the UK. In October 1918, he obtained the degrees of Bachelor of Medicine (M. B.) and Bachelor of Surgery (Ch. B.) from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and was granted his Medical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in Scotland on October 12, 1918.

About a year after his graduation, Lim Han Hoe completed three short-term medical positions to gain work experience. Initially, with the testimonials from his two university lecturers (namely Drs Robert A. Fleming and David Wallace), he went to St. Andrews in Scotland for approximately two months to work as an assistant to Dr J. Hunter Paton, a Medical Officer at St. Leonards and St. Catherine's Girls' School. Secondly, he travelled south to Barnstaple in England, where he became a House Surgeon (later a Resident Medical Officer) at North Devon Infirmary. His six-month affiliation with this hospital earned him the testimonials of the two Hon. Medical Officers (namely Drs Herbert C. Jonas and Walter Cooper). Subsequently, he received a letter (dated June 18, 1919) from the Medical Superintendent in the Liverpool office of The Ocean Steam Ship Company Limited and The China Mutu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Limited, which offered him a role as a Ship's Surgeon.

Dr Lim Han Hoe returned to Singapore and established the Subeng Pharmacy at 8 Upper Cross Street, likely at the end of 1919 or the beginning of 1920. Being an enthusiastic singer, reciter, debater and speaker, he attracted the public attention and quickly took on important roles in several Straits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ry and sports organizations. He rose to speak for the Straits Chinese community or more broadly, the Malayan Chinese. From 1926 onwards, he was appoint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o various positions, awarded the Justice of Peace in 1931 and subsequently the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C.B.E., Civil Division) in 1941.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Lim Han Hoe was imprisoned for tuning into the Allied radio station. During the turbulent postwar era, he stood up again as a Chinese political figure in Mala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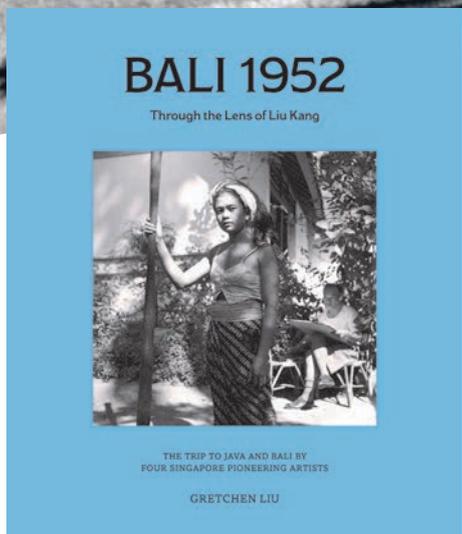
发言。自1926年起林汉河被委以各种职务，包括市政局委员、教育局局员、评议会委员、立法会议非官守议员、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华人参事局员、咨询委员会非官守议员等。值得一提的是，林汉河的留学经验与医学知识，使得他能够在健康、卫生、教育、市政等方面提供专业的建议，对于新加坡的近代发展贡献良多。林汉河于1931年获封太平局绅，1941年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民事）。

日本人占据新加坡前，林汉河将妻子与子女送往澳洲避难，独自面对危险的时局，日本人以收听盟军电台为由将其拘捕监禁。李急麟建筑师在口述历史中曾提到，林汉河与其父关系密切，光复获释后第一时间赤脚来到他家，此景令他终生难忘。1946年1月4日，林汉河获颁爵士勋衔，众所期盼他重回政坛。然而，他以身体健康恶化为由前往澳洲疗养。返回新加坡后面对反殖民浪潮，林汉河担负起责任再度参政，其间促成1949年马来亚大学的成立。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

南洋画家印尼之旅的真相

谈新书《峇厘1952：通过刘抗的镜头——四位新加坡先驱画家的峇厘与爪哇之行》



文图 · 张夏卉

自 1930年代起，从中国南来新加坡知识分子中的作家群体开始重视“南洋文艺”，不愿意“沦为中国文化的支流”，转而关注居住在热带的生活。

例如艺评家玛戈（许钟祜）于1933至1936年间，曾经在报上发表过一系列有关马来亚、新

加坡美术的文章，后来出版成一本题为《南洋之美》的文集，内容很明确肯定本土人文风物的美学价值。

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林学大于1938年创校时认为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人文条件，有利于创造和发扬富有南洋特色的美术，并沟通东西文化。

身为南洋美专创校校长，林学大的美术教育理念将美术活动设定于东南亚观点的语境中，造就出一批作品独具特色的南洋美术家。

从这个历史背景的视角，我们更能体会葛月赞（Gretchen Liu）新近以英文出版的《峇厘1952：通过刘抗的镜头——四位新加坡先驱画家的峇厘与爪哇之行》（*Bali 1952: The Bali and Java Journey of Four Singaporean Artists through the Lens of Liu Kang*）在美术发展上的意义和重要性。为配合新书出版，国家图书馆也特别策划了相关展览《尘封的故事：四画家1952年峇厘寻艺之行》，展览开放至今年8月2日。

葛月赞曾任职于《海峡时报》，出版过多部有关新加坡传统文化书籍。她这本新出炉的大部头著作，详尽记录了四位中国出生的新加坡画家刘抗（1911-2004）、陈文希（1906-1991）、钟泗滨（1917-1983）与陈宗瑞（1910-1985）当年具里程碑意义的印尼之旅，必定成为众人津津乐道的出版物。

葛女士为已故先驱画家刘抗的媳妇。2016年，她在刘抗Jalan Sedap家中清理遗物时，偶然发现一个鞋盒，盒盖上写着“相片峇厘”四个大字，盒内整齐排列着以中英文标注的信封，信封内装有6cmx6cm的底片。四年后疫情期间，她进一步整理这些旧物，仔细一看，惊讶地发现底片竟多达一千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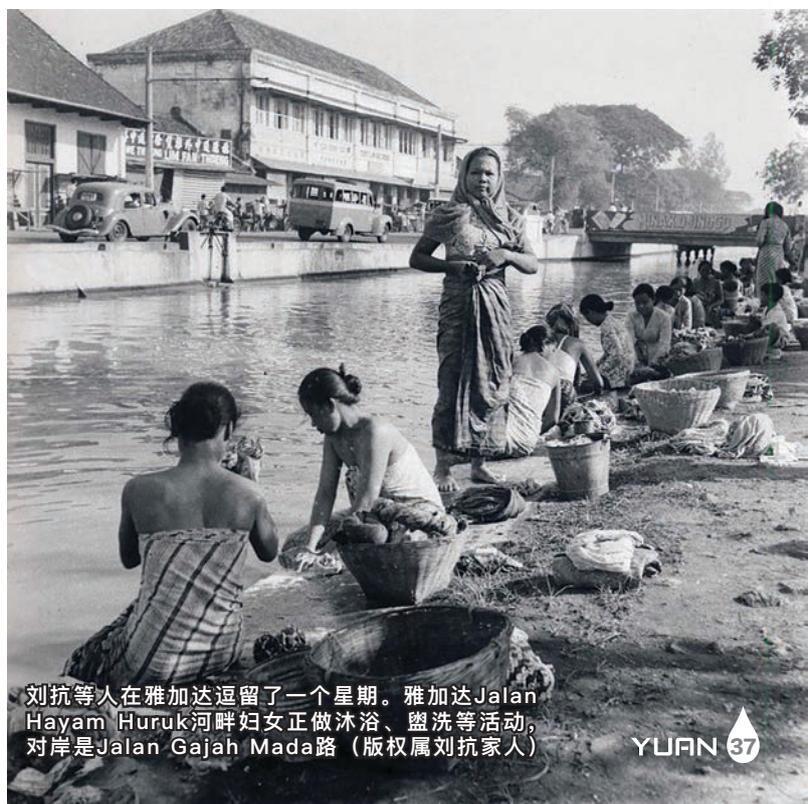
她从这批已尘封将近70年的底片当中精选了数百张冲洗出来，成为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也构成相关展览的图片内容。这些照片经过细致编纂，再配合画家们的素描、画作、藏书、书信、日记等原始资料，汇聚成一部前所未有、详尽而鲜活的历史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葛女士还努力从其他画家的家属那里获得相关资料，得以比较与参照。

这部新书叙述了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四位南洋画家为了找寻新的灵感，从新加坡远赴印度尼西亚，游历了爪哇岛上的雅加达、万隆、茂物、马朗、日惹、梭罗与泗水以及有世外桃源美称的峇厘岛。故事叙述也澄清了长久以来的一个误解，人们含糊地称他们的旅程为“峇厘之旅”，给人印象似乎他们只去了一个地方，实则远不至于此。

全书将近300页，内容分量厚重、图文并茂。这本画册不仅展示了刘抗以艺术家的独特审美眼光捕捉的摄影作品，更融合了葛月赞女士生动的文笔、严谨的考据与精细的注释，并适当地加入画家相关的素描与画作，构成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完美组合，是美术馆专业人士与一般艺术爱好者的必备参考书。

从书中我们获知，四位画家的行程始于1952年6月8日加冷机场。搭乘飞机前往雅加达。在雅加达逗留一周后，于6月15日乘车前往万隆，并在那里住了四天。照原定计划是先环游爪哇，再从泗水飞往峇厘岛，停留两个星期。然而由于当时日期接近开斋节，爪哇地区活动受限，他们只好临时调整行程，将原订的爪哇之旅延后，改为先行前往峇厘岛——这一待，就是整整一个月。

他们一行人从万隆乘火车，走了13个小时的



刘抗等人在雅加达逗留了一个星期。雅加达Jalan Hayam Huruk河畔妇女正做沐浴、盥洗等活动，对岸是Jalan Gajah Mada路（版权属刘抗家人）

路程直达泗水，抵达后发现飞往峇厘的机票已售罄，并且也无船可乘，只剩下乘汽车的选择。可是由于佳节在即，车票价格飞涨，远超合理的限度。幸好，他们结识了由陈文希的亲戚介绍的泗水商人李泽恭。多亏这位爱好艺术、古道热肠的李先生慷慨相助，邀请他们在附近Tretes的山庄别墅度假，然后派自己的车子和司机送他们前往班由万宜（Banyuwangi）。

他们从位于爪哇岛东端的班由万宜乘小船，横渡三公里宽且时有汹涌波涛的峇厘海峡，经历了两个半小时胆战心惊的航程，抵达峇厘岛西岸的吉利马奴克（Gilimanuk）。

对那些习惯从新加坡乘直飞航班三个小时之内就抵达峇厘的人来说，当时这四人团队选择那多番转折的奔波旅途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就是这样的行程才能让他们游览更多的地方，获得更丰富的体验。

从这本书里的照片与叙述看来，他们对这一次的爪哇峇厘之行肯定觉得非常值得，并且可说是收获满满的，尤其是看他们翌年那场备受瞩目的展览，确是成绩斐然。

新书的出版为这一美术史上重要的篇章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与新观点，它同时也让我们联想到与刘抗同游的以及旅途中所遇见的艺术家们，

是否也曾留下值得参考的材料，为这段难忘的旅程增添一样精彩的叙述。

1952年6月25日，刘抗从班由万宜乘船前往峇厘的前夕，他远眺彼岸，感触良深：十多年来梦想的世外桃源如今就在眼前。他在日记中如此记录下心情，可见他对峇厘是多么殷切的期盼与向往。

就在这之前的十多年期间，刘抗与亦师亦友的艺术大师刘海粟（1896-1994）之间时有书信来往。刘海粟曾是刘抗在上海时的老师，后来两人在法国巴黎深造时成为知交，情谊持续终身。刘海粟于1940年曾在爪哇各大城市包括峇厘岛访问，并举行抗日筹赈展览。同年年底来到新加坡，并带来了在印尼完成的作品，翌年在新马继续筹赈活动。

以他们俩传奇性的友谊关系，刘海粟来新时刚完成在印度尼西亚数月的艺术之旅，亲历异彩丰富的美学体验，必有深刻的感受，对向往峇厘岛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刘抗来说不可能不激发一定的灵感与触动。但是，在他们之间的信札里或者这本新书所引述的资料里，似乎都不见任何提及刘海粟曾对刘抗述说爪哇峇厘活动的记录。

葛女士因几张在峇厘拍摄的照片当中出现了中国留法画家周碧初（1903-1995）而感困惑，尤其令她费解的是刘抗与陈宗瑞两人的文字当中都未曾提及这位从1949年起旅居印尼的中国油画先驱画家。她甚至认为刘抗等人认识居于峇厘的比利时画家Le Mayeur与荷兰画家Rudolf Bonnet，很可能是通过周碧初介绍的。周氏于1959年回返中国之前在雅加达举行一项个展，之后也曾来新加坡展出。

其实，正当写书评之际，一位中国友人传来两则刚寻获的剪报，正好化解了葛女士的谜团。《星洲日报》1953年5月14日报道了中华美术研究会联合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在植物园设茶会，欢迎张荔英与周碧初访新的消息。会上刘抗发言表示热情欢迎两位远道而来的画家，并希望他们“长期居留在新加坡加入我们的阵线工作，以增强我们的力量”。另外，陈宗瑞印尼归来翌年在《星洲日报》（8.5.1953）发表了一篇短文以记周碧初在新的画展，文中回忆在峇厘偶



摄于雅加达博物馆，左起：刘抗、陈宗瑞、钟泗滨、罗铭、陈文希与雅加达友人杨永奎（版权属刘抗家人）

遇周碧初时喜出望外的心情，更何况陈于20年前离开上海时期盼会见周碧初并欣赏他的作品，但却缘悭一面；如此相见犹如他乡遇故知，感到格外兴奋。从陈宗瑞此文看来，四位新加坡画家会见两位欧籍画家，未必如葛女士所猜测是由周碧初引荐。

此外，中国画家罗铭（1912-1998）是刘抗在上海时的同学，自1940年代起就在东南亚各地写生。他与刘抗等人在雅加达偶然相遇，马上决定跟随大伙儿同游。后来罗铭回到中国，画坛对他他在东南亚的写生活动与创作阶段，尤其关注。1989年罗铭来新加坡举行个展时，媒体报道并没点出他当年曾参与“峇厘之旅”，与四位先驱画家曾把臂同游的往事。《联合早报》的报道却聚焦于罗铭与美术评论家玛戈庄在展览会上重逢的消息。

如今，就因为罗铭频频出现在这本新书的照片与文字中，我们才发现他原来是与这四位南洋画家一起同游的第五位成员，占有相当大的意义与重要地位。这本新书提供了一则我们大家以前所不知道的信息：峇厘之旅的画家不仅有四位，而是有五位。

从书中照片看出，罗铭跟其他人一样——除陈文希以外——也携带了相机，以他全程的参与，理应也拍摄了不少照片，做过一些记录，对于1952年印尼之行料必有值得参考的资料可以提供。令人不解的是，他虽然曾对东南亚有浓厚的兴趣，也曾在区域活动过相当长久的时间，但根据可查考的记录，在他下半生的岁月里，似乎从未在所发表的文字中追忆过自己曾参与那场富有时代意义的旅程。

这本书所引发诸如此类耐人寻味的问题，值得美术史研究者深入探讨，或许早年像刘海粟、周碧初、罗铭这样的中国美术家在东南亚的经验，正可为我们研究南洋美术提供有趣的对比与参照，也可能带来新的启示与发现。

迄今为止，对于南洋美术史上1952年这段印尼之旅的相关记录，这本书可算是最为周详齐全，也拥有最珍贵、最可靠的原始资料，其中大部分的原文是用中文书写的。倘若有人愿意将全书翻译成中文出版，对仅阅读中文的研究者及读者来说，肯定是一大喜讯。



新加坡画家访荷兰画家Rudolf Bonnet私宅，左起：陈文希、刘抗、钟泗滨、罗铭、周碧初、陈宗瑞、Bonnet、峇厘商人薛煜淇



五人团队抵达峇厘后第一个早晨，摄于Singaraja, Buleleng皇宫
左起：陈文希、罗铭、钟泗滨、刘抗、陈宗瑞（版权属刘抗家人）

题图说明：

新加坡四位先驱画家：左起刘抗、陈宗瑞、钟泗滨、陈文希1952年6月8日印尼之旅启程前摄于加冷机场
（版权属刘抗家人）

（作者曾任《海峡时报》双语版主编、好藏之兼吴冠中美术馆馆长）

岁月如歌 回顾六十年音乐之旅



文图·郭振羽

去年（2024）我和老伴罗伊菲度过了84岁生日，共度结婚60周年（钻石婚），算是双庆。回顾我们60年的共同生活，两人都喜爱古典音乐，但是完全非专业；没有学过钢琴、小提琴；靠着台湾当时电台古典音乐欣赏，家里一个破唱机和几张33转翻版唱片。还有就是大学里的“音乐欣赏会”，可说是随意、随意、随缘。

说是随意，伊菲多年来，出版了三部短篇小说集、九部散文集、还有一部剧本。第一部散文集是《岁月如歌》（1993），早已点出这几十年的如歌岁月。她的生活中本就离不开音乐，无怪她的几本散文集题目都和音乐有关：《穹苍外的歌声》（2003），《聆听·回望》（2018），《行云踏歌三十载》（2023），《踏歌人间斜阳好》（2024），还有《歌中情》中英双语剧本（2024）。

回想起来，这都是后话。

早在1958年大学一年级圣诞节前的弥赛亚大合唱，在台北国际学社，两人同席，算是不是约会的约会，是和韩德尔的约会，也算是第一次体会到大合唱的震撼。

1964年我们在夏威夷大学读硕士，在开学前夕结婚。在婚礼中，请一位不专业的同学唱《我必珍惜你》（Because）伴我们步进教堂，开始60年的婚姻道。

1965年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度过一个难忘的冬天：第一次看到雪，经历纽约大停电、公共交通大罢工。最难忘是到百老汇纽约旧大都会歌剧院看1967年拆迁前最后一季的演出。拿了学生票高坐五楼，俯瞰剧场像火柴盒，看了平生第一场歌剧，只是看了哪出歌剧已经不记得了。



2024年《再现·歌中情》歌剧演出

1974年有幸在明尼苏达州双子城（Twin Cities）欣赏到83岁高龄的鲁宾斯坦演奏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体会到真正“大师”的现场演奏，至为震撼。

1973年来到新加坡之后，由于出国公务开会多，有更多的旅游经历。除了借机游山玩水，畅游名胜古迹之外，追寻音乐的故事和音乐家的足迹也常常是我们的旅游指南。

1981年借着参访西德各大学机会，顺便带了稚龄儿女首游北欧。到了挪威奥斯陆，特别坐高原火车到西边的海港伯根（Bergen）（当年青藏铁路未建，是世界海拔最高铁路），沿线欣赏峡湾山光水色。远游伯根，只为参访音乐家格雷格（E. Greig）的故乡故居。他的培尔金特组曲（易卜生诗剧），特别是那首《索尔维格之歌》，是我们从大学时代就喜爱的。还记得我大一暑假第一次到伊菲罗东家里做客，送了一张唱片就是格雷格的培尔金特组曲。当时我们两人还有一番对爱情的圆满和残缺（一个负心的浪子和一个痴情女的故事）的讨论。

1998年到苏格兰开会。会后到了爱丁堡，参加当地的旅行团一游罗莽湖。听导游说，每年都有大批来自亚洲的游客，上了船都同唱《罗

莽湖畔》。原来这不只是早年港台中学音乐课本的教材，日本韩国中学生也都学过这首苏格兰民歌。

几年来前后到过多个欧洲城市。到了赫尔辛基自然要去参访西贝柳斯（J. Sibelius, 1865-1957）纪念公园和有名的塑像。他的《芬兰颂》为19世纪沙俄暴力统治的芬兰呈现民族抗暴的声音，激励反俄精神，终被查禁。现在被公认为芬兰第二国歌，也是19世纪民族音乐的先行者。

到布拉格也三访查尔斯桥，参观了桥下《我的祖国》作曲家斯梅塔那（B. Smetana, 1824-1884）纪念馆。他的《我的祖国》组曲中的“*The Moldau*（莫尔岛河）”就在桥下潺潺流过，让我们联想到中国抗战期间唱遍大江南北的《黄河大合唱》和《我的祖国》，都是激励人心的爱国之作。

到查尔斯桥，也不能免俗到桥上抚摸那位殉教主教圣约翰铜像发亮的脚跟。据说这会保佑我们再游查尔斯桥。（很幸运地，我们后来也有幸三访布拉格。）

到了华沙当然要去参拜市郊外的萧邦纪念公园（出生地和纪念馆），听听他的故事。

两度乘邮轮荡漾莱茵河，每次到了海德堡那个河段，都记得走上甲板，听那段“罗雷莱之歌”，遥看岸边石崖，想像那妖女歌声勾魂，让多少水手葬身河底。

到了莫扎特故乡萨尔茨堡和音乐之都维也纳当然正不在话下。那年是莫扎特250岁冥诞，满街都在卖莫扎特纪念品，严重消费莫扎特。

在维也纳临时买了黄牛票到金色大厅看歌剧《茶花女》，没想到所谓包厢是坐到顶楼后座第三排，大半天要站着看才看得到舞台。又参加维也纳森林一日游，期望重温《翠堤春晓》马车



布拉格查尔斯桥下Smetana博物馆雕像



2018年，在肖邦故居影像前留影

滴答穿过维也纳森林的浪漫情怀，结果既没有森林，也没有马车，大失所望。

上面谈了这许多，分享我有幸和伊菲多年音乐之旅的故事。更精彩的应该是她这几十年来创办合唱团、音乐团体以及她和她的伙伴这么多年来共同努力的音乐之旅。我见证了这位业余的爱乐者开始学习声乐，从一个不肯出声不能出声的爱乐者，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之下终于克服障碍，抓到窍门，竟然可以“乘着歌声的翅膀”，2000年登上维多利亚音乐厅独唱。这其中老师的心血，伊菲的努力，我可以做见证。

至于她30多年来参与推动合唱团和音乐活动的热诚和付出，对伊菲而言不是负责，更不是牺牲，而是极大的充实和满足。我很惭愧不是合唱团团员，上不了台，只能当个挂名的顾问，帮忙打杂开车接送，以及提皮包拿礼服，不过常常可以来白吃白喝，免费看演出。合唱团出国演出我也借机会跟团，到过台北、上海、杭州、旧金山，见证合唱团演出。最精彩的是2006年远赴布拉格参加国际合唱比赛，荣获银牌奖。2010年飞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十四世纪的阿美尼亚老教堂演出。

这60年的音乐之旅还要继续下去。伊菲早就定调了：岁月原就是如歌的。

（作者为本地资深学者）

民间守护与文化共融 新加坡文物保护观念的演进



文·张森林

目前，从一些网络文章中，我们可以获取到关于新加坡大批文物在2007年中北移的记载。事缘1980年代初期，鉴于新加坡城市化步伐越来越快，牛车水的改造，新加坡河驳业货运大转型等，一些早期华人社区的人文景观逐渐消失。出于保护文化遗产的使命感，从商的新华诗人陈来华（马田）开始兼做收藏工作，起初是以抢救马华文学作品为主，后来扩大到侨史遗存的物件与文献上。

一般理解，文物是指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与科学研究价值的物件。在陈来华的藏品中，有早年华人离乡检疫证、船票、护照、侨民证、戏班牌匾、谋生工具、太平洋战争海报等。这些藏品，绝大部分是环绕着华人生态环境而衍生出来的平凡物件，然而，正是这些毫不起眼、散轶民间的物件，恰恰见证了正在消逝中的历史。

2005年，在友人协助下，陈来华创办石叻坡民俗博物馆。2007年，他出于对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创建理念的认同，毅然把多年搜购的千多件侨史藏品、实物，捐赠给当时筹建中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让世人认识华侨先辈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开拓垦荒、勤俭耐劳、奋斗创业的历史，更准确地了解他们对侨居地的贡献以及与祖籍国的情感联系。

陈来华当初应没预料到，在他把重达14,000

公斤的珍贵文物捐赠到中国北京数年后，新加坡民间开始形塑“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概念。他所捐赠的那些文物，不仅对中国方面研究华人移民历史文化有着莫大的帮助，对于新加坡方面厘清与考据华族文化源头的溯源工程，也是强有力的历史见证。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陈来华当年轻凭一己之力，不惜砸锅卖铁搜购文物，一度被身边朋友视为“不解”之举；而创建于2018年的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则让我看到了一股抢救与保存国人文物的民间力量正在逐渐壮大中。

值得一提的是，陈来华当时的藏品不仅是华人使用过的器具，还有很多其他族裔的历史文物。这些藏品展示早期移民的生存发展与可贵的人文精神，协助人们了解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及跨种族和睦相处的特质。

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的宗旨是“立足广惠肇文化，兼容并蓄，承前启后，发扬文化”。2021年7月开始担任该馆副主任的庾潍诚博士，深谙“筑有凤凰巢，就能引来凤凰栖”的硬道理。他不仅按照馆方的既定方针继续收集广惠肇文物，更从国家社会的角度考量，不放过一件可资研究的先人文物，一本可供参考的文学创作。在这种海纳百川的认知基础上，该馆的跨族群藏品数量直线上升。

2023年2月12日，《新明日报》为庾潍诚开

辟“墓葬笔记”专栏。他在题为《广惠肇碧山亭藏百年墓葬文物》的首篇文章中透露，担任文物馆副主任后，他偶然间听闻国家文物局向他们探寻是否有兴趣前往武吉布朗坟场，看一看那些无人认领的文物。在“开挖后的土葬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大前提下，他和文物馆主任关汝经前后用了一年时间，把原先要扔到大海的大批文物抢救回来，安置于文物馆内。

当年的碧山亭主要是广东人和客家人的埋葬地，而武吉布朗坟场是福建人的墓园。要在一个籍贯壁垒分明的保守场所接纳另一籍贯的墓葬品，无疑需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与观念辩证。文物馆最终排除观念上的障碍，答应接纳来自武吉布朗坟场无人认领的文物；这些被成功抢救的文物，包括1402件墓葬品，以及46件墓碑和瓷砖等物件。

此外，庾淮诚深信，文物馆的收藏空间够大，跨族群的藏品会让该馆加分增值，当兄弟族同胞前来参观时，更能感受到一种亲切感。如果马来族和印度族同胞愿意把他们的文物捐赠出来，文物馆自然乐意收藏。抱持这种有容乃大的收藏理念，文物馆已初步收藏印度族同胞一些百年前的文物，以及马来族同胞的乐器和弓箭。

我认为文物馆此举已远远超越了抢救与保存文物的层面，它的深层次意涵在于打破传统的籍贯与族群藩篱，消弭族群排他性，对于建构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新加坡社会，起着正面的示范作用。

我从庾淮诚的身上，可以想象陈来华昔日穿街走巷到处搜购文物的身影和满腔热忱。然而，从文物考证和收藏到文献书写，这是我从庾淮诚身上看到的新加坡文物收藏领域的一大跨越，也是庾淮诚和陈来华之间最大的不同点。

庾淮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完成了博士课程，学的是历史专业。他不只热衷于收藏文物，且擅于文章写作。除了写墓葬笔记之外，因与文物收藏结缘，他也曾在报章上发表多篇历史考据文章，例如《战前广帮领袖吴胜鹏稳定碧山亭管理》《旧碧山亭学校郭明校长轶事》等。

此外，由于处理碧山亭地库内广福学校的一批珍贵文物，庾淮诚在2023年11月中旬马来西

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吉隆坡世界华文教育论坛，宣读题为《新加坡广福学校（1916-1982）〈学籍总册〉等一批珍贵档案发现始末及其意义》的论文。在此文中，庾淮诚认为，广福学校虽在1983年停办，但这批一手档案被重新发现仍有其重要意义。从华社的历史以及教育的发展来看，广福学校是广肇人士创办和自力更生的平民学校，它虽消失了，但广肇人士的办学精神不灭。今天，或许年轻一辈的籍贯意识稍弱，但我们仍可把广肇人士的办学精神视为华社自强不息与族群互助的体现。

经由文物与文献考证而撰写相关论文，相辅相成，这是庾淮诚与一般文物收藏热衷者的不同之处。曾发表《“百年墓碑”隐藏的富商颜东成家族史》一文的他相信，一些文物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他希望在抢救与保存文物的同时，也能以书写的方式，借由这些信息拼凑出华人的南来路；这一点，与陈煜博士在《槟城探墓 偶见徐悲鸿题书墓志铭》一文中发出的喟叹如出一辙——“烈日下举目四望，漫山遍野的墓葬中，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家族往事与文化遗珍？”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庾淮诚发现人为的损坏是文物流失的原因之一。例如，每当有长者往生时，其后人总是喜欢把往生者在世时的旧文件，如旧护照、旧驾驶执照等，焚烧给往生者，“希望”后者在九泉之下能用得上。殊不知，这些旧物件正是研究华族文化的重要依据。如果大家能建立起正确的保护文物观念，不轻易丢弃先人的物件，而是将之捐赠给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对于提升该馆馆藏的参照价值，促进华族文化的整体研究，极有帮助。例如，黄义强在整理其双亲的遗物时，除了在一个古老的木箱里藏着一件保存良好的新娘龙凤褂外，还发现了一张1952年的结婚证书。根据证书所载，婚礼是在新加坡三水会馆内举行的。结婚证书的用词典雅古朴，辞藻华丽。黄义强毅然把这张彰显华族文化遗产的结婚证书捐给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作为华族先辈婚礼传统历史的永恒见证。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新加坡社科大学客座讲师）

先贤黄亚福“墓志铭”释读



文图·庾潍诚

粵 籍先贤黄亚福（清道光十七年1837-1918），字彦廷，号甫田。原名黄福基，在南洋通称黄福、黄亚福。他是早期新马两地的大闻人，也是柔佛州开埠功臣、著名港主和实业家。黄亚福原是一名木匠，18岁时因避战乱，从家乡中国广东台山南渡新马一带。后逐渐发展成为橡胶种植园主、建筑商，并成为柔佛州政府的主要建筑承包商。

据传，黄亚福与苏丹阿布峇卡、皇后花蒂玛（黄亚娇）关系非常要好，新山许多历史建筑均由其承建，包括柔佛大皇宫、新山监狱、新山沿岸长堤等。以黄亚福命名的“亚福街”是新山市中心最繁忙的街道之一。他还曾因承包柔佛苏丹王宫工程而获颁柔佛王室效忠勋章。

作为早期南洋华人先贤，黄亚福白手起家、勤劳奋斗，终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实业家。他积累大量财富后，乐善好施，大力回馈社会。1854年，黄亚福移居新加坡，先后参与创办广益银行、养正学校、广惠肇留医院等机构。

黄亚福于1918年（高龄81）在新加坡寓宅逝世，土葬于广惠肇碧山亭新五亭。1980年左右，广惠肇籍的碧山亭坟场清山，转建为住宅用途的碧山市镇，黄亚福的坟墓也随之被清挖。这位先贤的灵骨，据我多番查找后，知道现今仍安奉在碧山亭（大牌24）。原先其墓前的一对守墓“洋石狮”（上面标注：意大利佛罗伦萨制作人为Raoul Bigazzi, Sculptor and Art Dealer, Florence），则在清山后由黄氏后人捐赠并移置碧山亭观音大庙的入门处。

近来，我查阅资料时偶然看到一篇黄亚福的“墓志铭”的拓片照片，收录于《新加坡墓碑铭集录》网页版。“墓志铭”是悼念亡者的文字篇章，内容叙述亡者姓名、籍贯、生平事略，以及对亡者一生的总体评价。它不仅记录亡者的生平事迹，供后人悼念，同时也激励、启发后人效法亡者的崇高品德。如今有机会目睹黄亚福的“墓志铭”，肯定对这位先贤的生平事迹有一手、最直接的认识，实为珍贵史料。

据本地吴安全先生（Raymond Goh）提供我的资料显示：黄亚福的“墓志铭”原镌刻在一块大石碑上，石碑安放在一只石乌龟（正确名称应叫“赑屃”）上面。石碑位于黄亚福和他的妻子赵氏的坟墓后面，向东。遗憾的是，记录黄亚福“墓志铭”的这块大石碑在清山过程中，也丢失不知所踪。如今，我们只能根据拓片照片，寻读“墓志铭”之文。



先贤黄亚福
(1837-1918, 图源：互联网)



黄亚福墓志铭拓片照片
(图源：《新加坡墓碑铭集录》网页)

经查，这篇“墓志铭”的作者陈洵（1871-1942），字述叔，别号海绡，广东新会县潮连乡人（今广东江门市潮连芝山）。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生，1942年卒于广州，终年73岁。陈氏是民国著名词人，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后逃避战火，旅居澳门避难。《长亭怨慢·谭子端家燕巢复毁再赋》是其代表作。另外，“墓志铭”的题书者梁鸾玲（?-1947），南海西樵人，字芝生。与康有为同学于朱九江先生之门，光绪年间秀才，曾掌花县县政。工书法，变化魏隶书而自成一體。

我根据拓片照片，释读了先贤黄亚福坟墓这篇“墓志铭”，并按己意分段和做了标点（难辨识的字以□表示）。以下，是“墓志铭”原文：

清授资政大夫黄君墓表

新会陈洵 撰文、南海梁鸾玲书丹

君讳福基，字彦廷，号甫田。广东新宁县人也。曾祖宏让，少孤，厉（励）志勤苦造家。祖鹏尊，父懋朝，竝（并）行义有闻。

君承先德，殖财煊隆。凡生平善举若万□□义田、乡学、新宁广海善堂、星洲广肇惠方便医院，固已言其仁心，诵其德，□□爰自弱龄遭乱流播，及席丰大，素履弗渝。

常语人曰：吾年十八遭寇扰，失恒产，在家无以养。乃辞二亲，随贾人客南洋，中更四年，稍致甘旨，遽奔母丧，父之旋背。今门巨立，而亲不待矣！恒以数年，□□里，每辞祠墓，辄顾视恻恻。闻者惕息传之。

又常语人曰：吾亲所往，吾族吾乡，皆吾亲所爱敬者也。吾遭乱幸存，存而幸自立，与吾同遭乱而流亡、转死与失业无栖似者，甚可念也。故恒约己勤物，其施与恒先亲后疏，先乡后国，挥斤万金而不徒豪举助国，养民而不取声势。无声色之好，服玩之娱，糟糠白头，始终庄敬其立身，为有本尔。

岁壬子，君自南洋归，时君之子景棠辟所居园，与吾辈为诗，社月恒数会，会则君必来视，杖履超然，朴素如儒者。顾景棠曰：此足消遣与安乐法也，则其襟度可知矣！

故能处乐不淫，延庆于后，春秋八十有二，戊午年八月八日病终星洲寓宅，遗命留葬所，卒以其年九月十六日，葬星洲碧山亭之第三亭。原君尝入赘，授二品，三代皆赠如君。官夫人，同县赵氏，生子：景棠、兆焜、兆镇、兆珪。

景棠有文誉，拔贡畿今河南知县，改官江西道，负先君三年卒。

兆焜，候选员外郎；

兆镇、兆珪均英国大学法科毕业生。

侧室彭氏生子兆源，英国大学矿科毕业，生女四。长美琼，适张；次美好，适关；次美苏，适□；次美宽，适白。

承重孙：秉照；孙：秉湘、秉盛、秉章、秉华、秉权、秉铨。

君葬后二年，兆焜等以君之德，宜有表睹，俾余为辞。余曰：富者分其有余以与人，使鰥寡孤独有所养，以补国家政教之穷。虽曰好行其德，要以得势益彰。盖所不足者，非财也，或者以之于声名争气势则德将不终。惟君天性孝慈，志行纯笃，蔼然孳然，以及于人，施之有道，行之有序。盖不仅分财之美者，另衍旁派，条达曲畅。《传》曰：“本立而道生”，是余之所欲铭者也。铭曰：

迁述货殖，原大则饶，脱俗浇凉，负势争高。粤有君子，可风来裸。所宝非财，乃曰仁义；树风不息，仁孝之情；为善必果，恩昭令名，睿音永矣，民同悲悼！戕戕封邱，海天冥窈！

以下是释文转读：

清授资政大夫黄亚福君的墓志铭

新会陈洵 撰写、南海梁鸾玲题书

君讳福基，字彦廷，号甫田。广东新宁县人。曾祖宏让，幼年父母双亡，一心自我鞭策，勤苦持家。祖父名鹏尊，父亲名懋朝，这两代人都以做好事而闻名。

（亚福）君继承祖先德泽护佑，发了大财。

黄君平生致力行善，就像……（为赡养族人）购置田产、办乡学、在新宁创办海善学堂、在星洲（新加坡）创办广肇惠方便医院，等等，已说明黄君深具仁心，而众人歌颂他的善德善行。……（黄君）年幼即遭遇战乱影响，后来生活优裕，依然节俭而不改其志。

黄君经常告诉别人说：我十八岁即遭遇战乱，家财尽失，待在家乡根本无法维持生计。于是辞别双亲，跟随商人移居南洋，间中历经四年拼搏，略有积蓄，却没想到母亲溘然仙逝，父亲不久后也过世了。如今，我家庭财富雄厚，而双亲已不在人世了！此后，（我）每隔几年就要回返家乡，每次拜别父母的坟墓祠堂，都会动情回望，感叹不已。听到（黄君）这样说，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黄君还经常告诉别人说：我双亲所交往的，都是我的族人、我的同乡乡里，他们都是我双



位于碧山亭（第三亭）的黄亚福坟墓全景（图源：《新加坡墓碑集录》网页）

亲尊敬爱护的人。我遭遇战乱乱世而幸运生存下来，又幸运自立成家立业，这跟我那些同样遭遇战乱而流离失所、死亡、没有工作以栖身生活的相比，这些人真让人同情思念。正因如此我经常约束自己，而勤勉于做事。因此我捐助救济他人，必定优先帮助亲人，然后再帮助陌生人；同样，我优先捐助家乡，然后再帮助国家。我捐助万两黄金也不白白一味只想帮助国家（而忽略乡里亲人）。我帮助乡里和亲人，并不是为了取得良好名声或声威。我没有声色之好，更没有不良娱乐嗜好，和夫人白头偕老，从始至终都约束自身，只因为我做人有原则罢了。

壬子年（公元1912），黄君从南洋归来。当时黄君儿子景棠开辟了住所的地方，跟我们这些同辈朋友相互作诗为乐，每个月经常都会有好几次见面。每次见面，则黄君必定过来看一看。黄君老者形象超凡脱俗，一身装扮朴素。黄君看着景棠，说：（作诗为乐）足够你平日消遣，让生活安乐无忧啊。于此可见黄君的心胸大量！

由于黄君胸量大，因此能生活快乐而不放纵，生活也因此高寿，活到八十二岁。戊午年（公元1918）八月八日，黄君在星洲的住宅过世。他临终交代要安葬在居住地，最后在该年九月十六日，土葬于星洲碧山亭的第三亭^[注]。考查黄君曾纳钱财得官爵，因此获授二品官爵，三代人也都追赠如同黄君的爵位。黄君的官夫人，是同县赵女，育有四子：景棠、兆焜、兆镇、兆珪。

长子景棠，深具文学才华，声誉美好，“拔贡”后任河南的县长，后来改任江西道长官，只可惜先黄君三年而过世。

次子兆焜，是候选的员外郎；

三子兆镇、四子兆珪，则是英国大学法科毕业生。

黄君的另一个夫人（侧室）彭氏，生子兆源，毕业自英国大学矿科。兆源生女四：长女美

琼，嫁给姓张的；次女美好，嫁给姓关的；三女美苏，嫁给……；四女美宽，嫁给姓白的。

黄君的嫡长孙（承重孙）：秉照；其他孙儿：秉湘、秉盛、秉章、秉华、秉权、秉铨。

黄君土葬之后两年，兆焜等感念先父黄君德行高超，应当撰写墓志以让别人瞻睹，于是催促我写些文辞来纪念黄君。我认为：有钱人把他们的财富分享给别人，让那些丧失或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人得到生活安顿，以辅佐国家政治教育的不足。虽说这些都是很好的善德善行，但恐怕也要有诸多资源才得以办到。可能有所欠缺的，不是钱财，而在于，是不是有人为善乐施只不过是取得了声望和名气。如果真的是出于这种目的，则善德善行也并非是真的。然而，黄君天性是真的孝顺慈祥，心志和德行也是纯洁和实在的，他所做的都是出于一片真心，以能真正帮助他人，施舍有道，所做的又井然有序。然而黄君不只是分享他的财富而已，他所做善德善行都能出入有度。《论语》（学而篇）说：君子做事有原则底线，那么不管治国、做人也就会灵活变通。（因为黄君做到这点）这就是要给黄君撰写“墓志铭”的原因所在。铭文如下：

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作《货殖列传》，提到：善于经营，积累财富，脱离庸俗，不与人争高低。有君子在，风范长存。其珍爱者并非财物，而是仁义之心；他传承的美德，永不停息，仁者之情始终存在。善行必有回报，恩泽昭昭，名声远扬。后人哀悼，丰功伟绩如巍巍高丘，铭刻于天地之间！

注：正确的应该是碧山亭新五亭的肇字山，碑文写第三亭，实误。

（作者为哲学博士、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副主任）

光明山下的新民

早期工业与宗教文化的交汇点



文图 · 李国樑

上世纪70年代初，建屋发展局开始规划宏茂桥新镇时，宏茂桥仍是个地广人稀的乡村，遍布农场与橡胶种植园。新民（Sin Ming）位于已消失的碧山亭坟场旁，被规划为宏茂桥的一部分。1972年，新民率先发展成为“宏茂桥工业区”。接着新民路上的五座组屋相继竣工，约1200个单位主要安置宏茂桥德义村、静山村等甘榜居民，以及在新民工业区工作的员工。多年以后，新民一带再次兴建新公共住宅，900多个预购组屋单位预计于两年内完工。

顺福（Shunfu）与新民相邻，拥有约相等单位的组屋区已有40年历史。顺福区的两条主要公路——顺福路和玛丽蒙路（Marymount Road），分别源自碧山亭坟场的顺福村以及开发宏茂桥时期新建的道路。

新民工业区与汽车维修业

1972年开始发展的“宏茂桥工业区”，后来更名为新民工业区，并成为本地首个汽车工业

区。最早的一批单层工厂主要分配给市区内受影响的汽车维修业者，随后聚集超过400家汽车维修厂。此外维康车辆检测中心（VICOM）和车辆注册局总部也在此落户。

尽管现今汽车因拥车证制度而价格高昂，但私家车市场依然活跃，难以想象汽车维修业曾一度陷入低潮。1975年政府提高汽车额外注册费和路税，同时推出限制区执照计划，进入市区的车辆必须额外缴费。这导致许多车主延迟维修保养，至于喷漆之类的美容服务可免则免，修车业生意滑落四成。

到了70年代末，汽车维修业逐渐复苏。随着碧山新镇的落成，新居民反而对新民的喷漆业感到担忧，害怕空气中的粉尘影响健康。

四十载光阴流转，新民工业区也在不断变迁，例如许多修车厂已由后辈接手，一些业者搬迁至邻近的新民工业大楼（Sin Ming AutoCity）继续经营。新一代的垂直修车厂采用四面通风设计，安全与环保管理设施完善，将成为修车厂未来的发展模式。





新民工业区：本地首个汽车工业区



妙华山自度庵发挥照顾老幼女子的功能，旁边蓝色屋顶为新民的“殡葬街”



光明山普觉禅寺：新加坡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圣神堂出自比利时的司格特传教修会

光明山普觉禅寺

光明山是新民地势的最高点，普觉禅寺（简称光明山）于百年前创建，如今已发展为新加坡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占地面积超过10个足球场。

提到光明山，不少信徒参与过卫塞节的“三步一拜”仪式，这是纪念佛祖诞生、成道与涅槃的重要活动。卫塞节前夕，上万名信徒分批从大雄宝殿出发，每走三步便五体投地叩拜，直至节日清晨。此仪式不仅象征佛祖成佛之路的艰辛，也考验信徒在修行路上的信心与毅力。

光明山的首任方丈转道法师创立普觉禅寺，旨在弘扬佛法，并为远道而来的僧众提供栖身之所。二战时期，光明山周边曾用做防空壕和避难所。战后宏船法师接任方丈，并协助企业家李俊承创办新加坡佛教总会。新加坡独立翌年，普觉禅寺首次举办国际性水陆道场律仪法会，所筹善款全数用于设立慈善诊所基金，三年后首间佛教施诊所正式成立，如今分布在全岛7个地区。光明山内有座宏船法师舍利塔和纪念馆，借以缅怀他的一生。

妙华山自度庵

光明山普觉禅寺旁的妙华山自度庵，是本地规模最大的女众道场。二战前，达贤和达仁两位师太在樟宜路七条半石创立陶养园，1957年扩建

时更名为妙华山自度庵，寓意先自度，后度人。20年后因原址被征用而迁至新民。

过去一些家长会将“不听话”的孩子送入庵堂管教，让她们适应集体生活；也有因家境贫困而寄宿在内的孩童。现年近七旬的罗女士属于后者，她回忆道，庵堂安排“面包车”接送她们这群寄宿孩子前往菩提学校上课；年龄稍长时，每逢初一十五和特别节日，她们都会协助庵堂招待善众和准备斋菜。

自度庵也收留退休的妈姐（自梳女）和其他单身妇女，为她们提供安养之所。妈姐多数来自广东顺德，主要从事帮佣工作。新民的自度庵设有两层楼宿舍，延续本地斋堂的养老功能。

宝光佛堂

顺福路巴刹旁的宝光佛堂与台湾慈济有着深厚的渊源。慈济草创时期，志工们的制服是黄色的，而非如今的“蓝天白云”。当时面对人力、物力及场地的挑战，宝光佛堂住持慧琪长老尼提供场地，让慈济在此举办会议、茶会及相关慈善与儿童教育活动，宝光佛堂因此成为早期慈济的“家”。

慧琪长老尼与慈济创办人证严上人同属一脉，30多年前慈济新加坡分会成立时，由慧琪长老尼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资深志工们表示，“没有慧琪师伯，就没有今天新加坡慈济的道路”。



新民地形图
(根据2025年谷歌地图绘制)

1. 光明山普觉禅寺
Kong Meng San Phor Kark See Monastery
2. 妙华山自度庵
Tse Tho Aum Temple
3. 诺雅初级学院
Eunoia Junior College
4. 新民工业大楼
Sin Ming AutoCity
5. 新民通道“殡葬街”
Sin Ming Drive funeral parlours
6. 爱同学校
Ai Tong School
7. 80年代的光明山通道组屋
Bright Hill Drive flats built in the 1980s
8. 维康车辆检测中心 VICOM
9. 70年代落成新民路组屋
Sin Ming Road flats built in the 1970s
10. 70年代初落成的“宏茂桥工业区”
The industrial estate built in the 1970s
11. 圣神堂
Church of the Holy Spirit
12. 印度煎饼店
The Roti Prata House
13. 宝光佛堂
Pao Kwan Foh Tang
14. 80年代落成的顺福组屋区
Shunfu Road flats built in the 1980s

圣神堂

本地的天主教堂以法国传教士创建的居多，汤申路上段的圣神堂（Church of the Holy Spirit）则出自19世纪中叶在比利时成立的司格特传教修会（CICM，亦称Scheut Missions）。

CICM是个国际性天主教传教修会，成立后致力于向中国、菲律宾、美洲、非洲等地区传福音。二战前，CICM在海峡殖民地法令下注册，直到新加坡自治初期，才在原址的小洋房内展开活动。宏伟的教堂是在本世纪初重新建立起来的。

殡仪馆一条龙服务

80年代殡葬业在新民路兴起，以前在惹兰柏民宾（Jalan Pemimpin）和谦福路（Kheam Hock Road）经营殡葬业务的业者迁至此地，使到新民通道第37至39座形成一条“殡葬街”。附近的光明山和自度庵设有火化场及骨灰安置所，间接支持光明山下的殡葬与追思的相关行业。

新民通道出现殡葬业之际，政府计划在一些组屋区附近设立综合性殡仪馆，但因民众强烈反对而暂时搁置。21世纪初，当局重提往事，计划在新民增设火化场。部分居民担忧房价受影响，交通拥堵加剧，甚至认为殡葬设施会带来霉运。尽管当局承诺新民不会变成殡葬中心，该计划仍未落实。

或许大家已淡忘，新民的邻近地带曾是十万

墓碑的碧山亭坟场，碧山镇与顺福路组屋亦建在坟场旧址。新加坡独立时人口200万，65岁以上者仅5万，殡葬设施需求并不高。现今常住人口已翻了三倍，预计过多五年，每四名新加坡人口当中就有一人超过65岁，殡葬设施的需求势必增加。面对即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生死共存的可能性。

福建会馆创办爱同学校

爱同学校落户新民30余年，发展历程颇为曲折。爱同学校创建时正值民国元年，校名取自“博爱大同”，寄寓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理想。学校最初设于文达街的美以美宣道会楼上，之后迁至直落亚逸街、福建会馆和宏茂桥3道。巧合的是，宏茂桥校舍与美以美教



福建会馆主办的爱同学校经历过艰难的教育转型期，从一度无人问津的华文源流学校，脱胎换骨为特选小学

会为邻，多年以后重续前缘。

宏茂桥的新校舍兴建期间，新加坡正值教育转型期，一度只有两名学生报读。当时在爱同上课的学生并非主动选择这间学校，而是因为附近英校学额已满而被分配至此。时任校长丁明正带领团队走过艰难岁月，将它从一度无人问津的华文源流学校，脱胎换骨为特选小学。

诺雅初级学院

妙华山自度庵斜对面，一栋绿意盎然的现代化建筑映入眼帘，那便是诺雅初级学院（Eunoia Junior College）。这是新加坡第20所初级学院，由公教中学、圣尼格拉女校和新加坡女子学校联合成立。公教中学和圣尼格拉女校由法国天主教会创建，新加坡女子学校则由林文庆、宋旺相及邱菽园共同创办，旨在为土生华人女子提供教育机会。

传统华校的命名往往体现中华文化价值观，而诺雅的名称则源自希腊古文明。“Eunoia”意为“美好思考”（beautiful thinking），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强调通过美德来实现幸福与繁荣。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友谊、正义和实践智慧，认为这些是道德生活的关键，因此真正的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真善美的心灵。

诺雅的中文名寓意“君子大雅，有诺必行”，与其希腊文含义相呼应，寄望学子才学优异、品德高尚、正直守信。我们也期待实现“让每一所学校都是好学校”的愿景，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全面的发展。

印度煎饼特色店

圣神堂旁的一列店屋中，有一家名为The Roti Prata House的印度煎饼店，以十多种不同口味的

印度煎饼（Roti Prata）闻名，在本地实属少见。该店于锦茂（Ghim Moh）组屋区开业，80年代搬至贝雅士蓄水池一带，90年代迁至现址，如今由第二代经营。

早期的印度煎饼外酥内软，仅以菜油煎制，主要食材为面粉、糖、盐和鸡蛋。为了提升竞争力，店家推出香脆版本来吸引年轻顾客，金钱煎饼（coin prata）与海啸煎饼（tsunami prata）成为近年的热门口味。

印度煎饼是本地印度回教徒的传统美食，所用的面粉从印度进口，制成面团后以印度酥油在铁板上煎烤而成。传统的吃法搭配“达尔查”（dalcha），一种以扁豆为主，添加羊肉或鸡肉咖喱的浓汁，并使用混合香料（garam masala）提升风味。如今的达尔查还会添加马铃薯和红萝卜，让口感更加丰富。

约百年前，本地报章已出现印度煎饼广告。当时红灯码头对面的真者里（Change Alley）商场十分繁华，云集着上下船的船员旅客。餐厅售卖的煎饼每片一角钱，咖喱配料另计，例如白鸽5角，鸡肉3角，牛肉一角半，扁豆一角。如今印度煎饼这道国民餐饮已跻身世界级美食之列。

顺福与麻油齐名

昔日的顺福路曾是一条“麻油街”，随着顺福组屋的建设，沿街的麻油厂集体迁至宏茂桥第三工业区。胡益源（Oh Aik Guan）是在顺福起家的老字号，第一代业者将麻油装入啤酒瓶，骑着脚车沿街叫卖，随着滚动的车轮打响品牌，放眼海外市场。

笔者成长的年代，麻油不仅是厨房必备之物，也深植于华人传统习俗。妇女在坐月子期间用麻油滋补身体；婴儿洗澡前，家人会在孩子的肚脐上涂抹麻油以祛风。如今麻油的应用已超越



诺雅（Eunoia）初级学院的名称源自希腊古文明，意为“美好思考”



汤申路上段地铁站出口道路两旁的旧店屋，黄色招牌的The Roti Prata House以十多种不同回味的印度煎饼为卖点

烹饪范畴，广泛用于肥皂、药品及化妆品等日常用品中。

新民从筚路蓝缕走向现代城市风貌，始终焕发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光明山下，一代又一代人编织成温暖而抒情的岁月变革的故事，那绝非“芝麻绿豆”般的琐碎片段，而是时代长河中动情的篇章。

参考文献：

- [1] 《南洋商报》
- [2] 《新明日报》
- [3] 陈家喜，“从邻避到邻里——新加坡殡葬设施的前世今生”，《联合早报》2024年6月5日。
- [4] 《新加坡南洋胡氏总会60周年纪念特刊1946-2006》，新加坡南洋胡氏总会出版。
- [5] 杜南发，“吉光片羽”，《联合早报》2018年3月12日。
- [6] 谢慧秋，星期二特写，厂区探游：新民20/12/2023，<https://www.8world.com/stories/tuesday-report/vibrancy-at-ie-sin-ming-2323171>，accessed 20 February 2025.
- [7] Eunoia Junior College，<https://www.eunoiajc.moe.edu.sg/>，accessed 1 March 2025.
- [8] Malaya Tribune, 27 June 1930. Oh Aik Guan Food Industry，<https://www.puresesameoil.com/>，accessed 20 February 2025.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协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昔日的顺福路曾是一条“麻油街”，随着顺福组屋的建设，沿街麻油厂已消失

Sin Ming: Where Industry, Culture and Heritage Meet

In the early 1970s, Sin Ming was designated as part of Ang Mo Kio New Town. It was initially developed as the "Ang Mo Kio Industrial Estate" and was subsequently renamed "Sin Ming Industrial Estate". The area primarily housed single-storey factories for automobile repair businesses affected by urban redevelopment. Over time, it evolved into Singapore's first automotive maintenance and repairs hub, with more than 400 workshops operating during its peak.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rea Licensing Scheme in 1975, along with higher car registration fees and road taxes, resulted in a temporary downturn as vehicle owners chose to postpone or opt for less frequent maintenance. Services such as spray painting and car grooming were often forgone. Many of these workshops managed to survive the setback and have now since been passed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Some companies have relocated to the more contemporary Sin Ming AutoCity, a new-generation facility featuring vertical automotive workshops with enhanced ventilation and upgraded infrastructure, setting a benchmark for the industry's future.

As Sin Ming Industrial Estate developed, five blocks of HDB flats were built along Sin Ming Road to house workers from the industrial estate and residents resettled from Teck Ghee and Cheng San estates. Over the years, Sin Ming has also welcomed esteeme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i Tong School, established at Boon Tat Street over a century ago, relocated to Sin Ming and continued to promote its ideals of "equality and freedom" inspired by Confucian ideology. Eunoia Junior College has recently become part of the neighbourhood, its name inspired by the ancient Greek civilisation's emphasis on "beautiful thinking" (Eunoia).

Sin Ming's highest point is Bright Hill, home to the century-old Kong Meng San Phor Kark See Monastery, Singapore's largest Buddhist monastery. After World War II, Venerable Sek Hong Choon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founding the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A year after Singapore gained independence, the monastery held its inaugural international "Water and Land" Puja. Funds raised from the service were contributed to a charity clinic fund. Today, the Singapore Buddhist Free Clinic has expanded its reach to various housing estates, maintaining its mission of providing low cost healthcare services to those in need.

Adjacent to Kong Meng San is Tse Tho Aum Temple, a Buddhist nunnery with a rich history. Originally located on Changi Road before World War II, it relocated to Sin Ming in the late 1970s. The temple once served as a refuge for "mischievous" daughters sent for discipline, children from impoverished families and retired self-comb women seeking shelter. This tradition of housing the needy continues today with a two-story dormitory offering accommodation and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the 1980s, funeral companies previously operating along Jalan Pemimpin and Kheam Hock Road relocated to Blocks 37 to 39 on Sin Ming Drive. The funeral and bereavement industries benefitted indirectly from its proximity to Kong Meng San Monastery and Tse Tho Aum Temple.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he authorities proposed adding a crematorium in Sin Ming, raising concerns among residents over perceived "bad luck". Few, however, may recall that Sin Ming's neighbouring Bishan Town and Shunfu Road estates were built on the former Peck San Theng cemetery grounds. As Singapore's population has tripled since its independence and continues to age rapidly, the demand for funeral services is expected to rise. Perhaps it is essential to reevaluate how life and death can coexist within our urban landscape.

Shunfu Road, once known as "Sesame Street," contributed to Singapore's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The heritage brand Oh Aik Guan, a household name in sesame oil production, was founded in Shunfu. The first-generation owner started by filling sesame oil into beer bottles and went door-to-door on a bicycle to sell them—a testament to the resilience and ingenuity of small businesses in the area.

From its humble origins to an urban landscape, Sin Ming continues to be rich in history, enterprise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Beneath the Bright Hill, the stories of generations in the past intertwine to create a warm and lyrical tale of time and transformation.

南大早期的 工读制与合作社



文图·符懋濂

半工半读 成绩突出

在1950年代，贫穷落后是马来亚（新马）社会的基本特征，所以高中毕业生升学率极低，恐怕还不到15%。大学生犹如凤毛麟角，令人羡慕不已，自然不在话下。

早期的南大学子，家境贫穷者为数不少。每月学费60元，加上住宿与伙食等，每月总开销大约需要120元。这是一般家庭负担不起的，即便是所谓“中等阶层”的家庭收入，每月不过两三百元。因此，南大在成立之初，半工半读即勤工俭学便成了许多学子的选项。工读生可分为两类：一类在校外当家庭补习教师，或其他兼职工作，以赚取部分学费为目的；另一类是在校为南大服务，成为令人羡慕的工读生。他们不需再到校外兼职，东奔西走，耗时又劳累。

南大当局洞悉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以早在1956年便创立工读制，用来协助优秀的贫寒学子。它明文规定：各院系学生凡家境贫寒者，学业成绩优良（考试成绩总平均分数至少70%以上），就可以申请成为工读生。工读生利用课余时间在校方工作，每月以60小时为限，每小时酬劳1元，每月可以获得60元，刚好用来缴交学费。此举大受学生欢迎，职位始终供不应求，申请人数远超所需名额。就我的记忆，最初仅有十几位工读生，分散在大学各个行政部门。这是社会人士无从知晓的南大生奋斗史实。

根据《大学论坛》的记载，到了两年后的1958年，工读生人数增加至34位，大致分布如下：教务处（后改称注册处）6位、秘书处8位、

图书馆5位、电器部1位、文学院3位、理学院1位、商学院4位、南洋研究室1位、成教班（先修班）5位。日后随着南大学生人数增加，工读生人数即略有增加，“而堆积在秘书处的申请书还有一大叠”，可见僧多粥少，竞争“上岗”非常剧烈。（见1958年3月30日《大学论坛》报道《本校工读制度实况》）按照校方择优录取原则，唯有家境贫寒、品学兼优者才有机会被录用。工读生一般上只准最多当三年，第四学年因为有毕业考试，一般都得“下岗”以免影响考试成绩。我在就读南大之前，是南大注册处职员，也仅当工读生两年半，就提前把机会让给更需要的同学了。

平心而论，工读制是南大历史的特殊产物，我觉得它比起早期北大的旁听生制似乎更好些。这是因为：一、工读生属于在籍学生，他们必须照常上课，完成作业，参加考试，最终获得学位；二、他们必须加倍努力学习，确保成绩一直优异，否则半途将失去这难得机会；三、有些工读生甚至名列前茅，毕业后先当助教，后晋级为讲师。可见南大工读制贡献不小，在培养学术人才方面，曾经起着值得称道的历史作用！北京大学早期的旁听制也曾闻名遐迩，因为有些名人当过旁听生，其中包括毛泽东、沈从文等人。旁听生不参加入学试，没有学籍也没有大学考试，只要获得校方批准、教授同意，就可以旁听某些自己钟意的课程，丝毫没有压力，显然轻松多了。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众所周知，合作社是合作运动（Co-operative Movement）的产物，它可分为三种，即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与信贷合作社。在那个年代，合作社还是很新鲜的，不论哪种合作社，一般人都闻所未闻。然而，早在南大创立



开学了，新生到教务处注册，总有工读生协助



早期合作社贩卖部就设在永祺大餐厅后面

不久的1957年，“南洋大学有限责任消费合作社”竟然在南大学生会推动下诞生了。它初创的规模很小，贩卖部开始出售的仅是一些日常消费品，如生活用品牙膏、牙刷、肥皂、卫生纸、清洁剂；文具用品墨水、钢笔、稿纸、蜡纸、活页纸、笔记本子、试验报告纸；无需烹饪的食品如饼干、罐头等等。顾客除了学生，就是教职员，人数众多，销路都很好，但仍然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后来所贩卖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也日益增多，就我所知，连信封、信笺、报纸、杂志、图书、邮票、车票都在合作社里出现，同样深受青睐。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所售卖图书中，除了一些学生必备的参考书，还有一些大书店都罕见的文史哲新书。因数量有限，而大家又求知若渴，往往一两天就被抢购一空。我这个书虫对此最感兴趣，经常出现在“抢书”行列。至于巴士车票，从奎因街（Queen Street）往返云南园，是由绿色巴士（Green Bus）提供交通服务。该公司为了支持华文教育事业，减轻南大学生的经济负担，专供南大学生巴士优待票，值得点赞。

消费合作社采用半商业化的股份制，入股成员上有院长、教授，下有学生、职工，最早仅有千余股份，每一股份5元。该社共有11名理事，即主席、秘书、财政各1名，委员8名，都是由社员选出的义务工作者。

另有两名受薪职员，处理日常业务。合作社原始资本仅有5000多元，属于小本经营，学生会不断呼吁大家入股，以扩大资本。后来还面对一家校园内杂货店的竞争，理事们必须努力工作，任劳任怨，业务才能蒸蒸日上！（见1958年3月30日《大学论坛》文章《南大消费合作社访问记》）到了1963年，合作社全年营业额已经达到30万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

目，相当于今日的3000万元以上。同年，合作社“新家”落成，由庄竹林副校长剪彩，合作社更上一层楼，后来改名为“南洋大学多元化合作社百货商店”。

合作社是南大学生会属下的自治组织，据《大学论坛》透露，1958年12月，学生会曾选派蔡崇语^[1]到印度出席“东南亚大学合作与自助技术研讨会”，算是南大生首次出国取经吧。此后，合作社的生意越来越好，营业额不断增加，曾出现开学那周“一天卖千元”的营业记录。南大合作社的口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含有舍己为群成分，充分体现了南大人独特的团结、互助、合作精神。它的创立与成功经营，或许也与注册处主任谢哲声教授有关。因为他作为国际著名的合作经济专家学者，曾在联合国任职，能给予合作社正确指导。据说马大（即后来的新大）学生也办过消费合作社，但很快就失败、收档了，这显然与他们缺乏奉献精神，经营不当密切相关。

必须指出，在1950年代，裕廊区还是个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大农村。最早时，云南园内仅有一家小到不能再小的杂货店（摊），而南大师生绝大多数是住校的，消费合作社自然应运而生。作为先驱者的南大合作社，为学生提供了有效而方便的经商实习平台，使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于他们日后创业或从商，应该有所帮助吧？此外，对于1973年成立的新加坡职工总会平价合作社（NTUC Fair-Price），似乎也应有启迪作用或历史意义。

注释：

[1] 当年蔡崇语是会计学系三年级学生，后曾任我国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

（作者为复旦大学博士、资深教育工作者）

新加坡儿童剧社

文·“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编辑组

虽然仅存在了15年，儿童剧社对本地华语戏剧、舞台演艺等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也栽培了一代的文化幼苗。

儿童剧社是活跃于1960、70年代的少儿文艺团体。该剧社从广播剧出身，之后成为舞台演艺的佼佼者，也从事出版业务，可谓全方位展现社员的才华。

创立于1965年6月12日的儿童剧社，最初隶属于新加坡广播电台华文部。1964年底，电台因缺乏华语儿童演员，决定开办训练班。电台广播符和琳（1940-1990）负责招生，同是广播员的程茂德（1936-2007）后来接手担任导师。^[1]程茂德是本地广播剧和青少年戏剧的推手之一，对华语戏剧、舞台演艺等领域有着深远影响。^[2]

训练班的初衷是培养广播剧演员，但程茂德希望学员能朝多面发展与学习，因此也为他们制定走上舞台的目标。首届训练班开课当天便是“儿童剧社”成立之日。

儿童剧社的遴选标准严格，应征者必须有优良的学业成绩，以及歌唱舞蹈的潜能。首两届训练班共吸引多达2000人报名，最终仅选出约60人。剧社学员都是在校的中、小学生，通常在周末活动，进行排戏、录音、华语语音训练，以及哑剧表演等。

发展与活动

程茂德将不少世界名著、寓言和民间故事改

编成广播剧，由学员演出。儿童剧社在1965年8月8日播出的第一个广播剧，是前苏联时期的作品《没子弹的猎枪》。除了儿童广播剧，剧社也在同年12月4日播出第一个访谈广播节目《艺苑新声》，让听众认识这些小演员。每周播出的两档节目都受到欢迎，让剧社逐渐收获一批忠实听众，包括对岸的马来西亚。约于同个时期成立，且以儿童为对象的团体，尚包括丽的呼声儿童话剧组（1966年成立，后改称少年儿童话剧组）。

儿童剧社成立一年半后，于1966年12月首次登台演出，在维多利亚剧院公演“儿童话剧之夜”，五晚的门票全数售罄。由于观众反应热烈，演出里的三个独幕剧《借雨伞》《宿舍风波》《儿童节前后》后来被录制成电视节目，让错过现场演出的观众有机会观赏。剧社最经典的演出要属多幕剧《表》，于1968年4月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七场。这个舞台剧也曾被录制成电视节目。儿童剧社之后曾与电视台合作，拍了《恩情深深》以及两个单元剧《失落的琴声》与《轨》。

1968年至1969年，剧社陆续成立多个小组，包括文艺组、口琴组、男声小组、女声小组、童声小组、舞蹈组、钢琴组、手风琴组、摄



骆驼文艺出版社出品，儿童剧社与青年剧社演出《春常在》黑胶唱片，1975年（左）及儿童剧社演出《儿童文艺之夜》黑胶唱片，1973年（图源：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

影组、美术组。过后条件成熟了，又成立铜乐队和民乐队。^[3] 儿童剧社在1969年推出《儿童文艺之夜》，演出儿童歌舞剧《兔妈妈种萝卜》和《森林里的宴会》，诗歌朗诵《公鸡和太阳》等，受到热烈欢迎，六场演出门票在开演前就售罄。^[4]

儿童剧社也投入出版工作，1969年1月出版了第一期《骆驼》文艺周刊。“骆驼”之名源于《民报》在1968年开辟的副刊版面，当时程茂德受邀担任主编，发表社员的诗歌、散文、剧评、武评和剧本。骆驼文艺出版社后于1970年3月正式成立，也出版了《戏剧天地》和《年青人》杂志。出版社最多曾有近40名全职社员，但只维持几年便在1976年2月解散了。

同样在1970年，电台停播儿童广播剧及《艺苑新声》，程茂德离职电台，几乎全体社员也跟着他一起离开。儿童剧社自此成为独立的团体，开始往专业之路迈进。剧社离开电台后，几经搬迁，寻找合适的活动地点，最后落户于程茂德岳父在加东阿德路的一排旧矮屋，是剧社活动大本营。随着社员年龄的增长，青年剧社于1971年3月3日正式成立。

全盛时期，儿童剧社与青年剧社拥有500名社员，演出经常满座，场次纪录最多达31场；

一轮演出下来，观众人数最多曾累计超过3万人次。儿童剧社从成立到解散的15年间，前后制作了13部舞台表演，并且培养了一代优秀的华语演艺人才。

剧社活动的中止

儿童剧社在如日中天之时，程茂德却于1976年宣布暂停剧社活动。这一年，有不少戏剧工作者因涉及政治活动而被逮捕。程茂德在2005年受访时坦言，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局势，他不愿意看到剧社活动失控而导致类似事件发生，因此认为剧社应暂停活动，重新思考未来的方向。^[5]

以儿童剧社名义举行的最后一次演出，是在1980年的“小小世界儿童文艺晚会”。儿童剧社之后就正式走入历史，但它的影响力已经深入本地华文文教界，好些前社员至今仍秉持剧社的精神，积极培养未来一代的剧艺接班人。例如，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自1987年起开课的少儿演艺训练班，是由方百成、黄树平、黄秀玲、施曼华等前剧社社员一起创立的。蔡曙鹏则于1995年创立了戏曲学院。

在新加坡建国初年，百业待兴，文化建设有待开展，儿童剧社应运而生，所栽培的数百名文化幼苗，如华亮（1953-1995）、吴雪妮、

蔡曙鹏、林少芬、方百成、王连三、邬伟强、何子石、翟志玉、黄秀玲、林仁余、杨帆、陈兆锦等，后来都成为剧场、广播、电视、文化及教育界的活跃成员；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儿童剧社和丽的呼声儿童话剧组等团体，发挥了奠基和播种的积极作用。

注释：

- [1] 谢燕燕，〈团体已解散还办‘50周年庆’，昔日社员情牵儿童剧社35载〉，《联合早报》，2015年6月15日。
- [2] 周文龙、林妙娜，〈华语戏剧界前辈程茂德肝癌逝世〉，《联合早报》，2007年2月1日。
- [3] 刘立，〈一个文化团体一世情——儿童剧社55周年〉，《联合早报》，2020年7月9日。
- [4] 蔡曙鹏，〈唱尽人间喜与忧——新加坡的表演艺术〉，页470。
- [5] 黄嘉一，〈儿童剧社从广播走上舞台——听程茂德老师说书〉，《源》杂志（2005年5月），页25。

本文转载自“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欲阅读更多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精彩内容，请扫描以下二维码，浏览“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



The Singapore Children's Playhouse

The Singapore Children's Playhouse was an active children's theatre group in the 1960s and 1970s. It had its roots in radio drama and later became a leader in stage performance, while also engaging in publishing activities to showcase the talents of its members. Established on 12 June 1965, it was initially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the Singapore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t the end of 1964, due to a shortage of Mandarin-speaking child actors, the radio station decided to conduct training classes.

Thia Mong Teck (1936–2007), who was also a broadcaster, wa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local radio dramas and youth theatre, an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Mandarin drama, stage performance,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The first training session commenced on the same day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ldren's Playhouse, with Thia whom later took over as the mentor.

The Children's Playhouse's first radio drama, broadcasted on 8 August 1965, was *The Hunting Rifle Without Bullets*, a piece of work from the former Soviet period. Besides children's radio dramas, the playhouse also aired its first interview programme, *Yiyuan xinsheng* (Art Garden New Voices), on 4 December of the same year. Around the same period, other arts groups targeting children were also established, including the Rediffusion's Children's Drama Group,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66 and later renamed the Youth Children's Drama Group.

A year and a half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The Children's Playhouse made its stage debut in December 1966, staging *Children's Playhouse Night at the Victoria Theatre*. The most iconic performance of the playhouse was the multi-act play *The Watch*, which was staged seven times at the Victoria Theatre in April 1968 and adapted into a television programme.

From 1968 to 1969, the playhouse established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including those focused on literary arts, fine arts, choruses for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s well as dance, piano, accordion, harmonica and photography. As it developed, brass band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orchestras were formed as well. The Children's Playhouse ventured into publishing as well, releasing the first issue of *Camel Art Literary Weekly* in January 1969.

In 1970, the radio station ceased broadcasting children's radio dramas and *Yiyuan xinsheng*. Thia resigned from the radio station and almost all the members of the playhouse left with him. Following their departure, The Children's Playhouse became an independent organisation and began to professionalise. As its members grew older, The Youth Playhouse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on 3 March 1971. At its peak, The Singapore Children's Playhouse and The Youth Playhouse had 500 members. Their performances were often sold out with a record of up to 31 shows per run. The highest number of audience they ever witnessed exceeded 30,000.

Thia announced the suspension of the playhouse's activities in 1976, despite it being at the peak of its popularity. The final performance by Children's Playhouse was held at the Little World Children's Arts Evening in 1980. Thereafter, Children's Playhouse officially became history. However, its influence had deeply penetrated the local Chinese cultural and education community. Even today, many former members still uphold the spirit of the playhouse and actively nurture future generations of successors in the theatrical arts.

奶奶

文·陈雨婷

小女孩坐在返乡的车上，无比稚嫩的脸上带着一丝忧郁，仿佛在思考着一个大人才会担忧的事情。窗外，青山如黛，春意盎然，却唤不回她的心神。回乡之路，让她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奶奶，这次回去见到她会是怎样的景象呢？

到了村子，仪式正式开始，宴席上人声鼎沸，大人们不时发出感慨：“哎呀，妈妈这个岁数，寿终正寝，也算是有福了。”

“你看，多热闹，儿孙满堂。村里的邻居们都可羡慕了。妈妈应该是开心的，我们也应该开心。”

小女孩默默地站在一旁，心中充满了困惑。她不太理解大人们在做什么，为什么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哭，感觉整个场面有些古怪。于是，她悄悄地溜出了宴席，跑回了老屋子。打开门，屋内弥漫着熟悉的中药味。

屋内一片阴暗，窗户还如当初那样被封起来，只一线微光透入。这个地方曾是她长大的地方，也是奶奶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小女孩好奇地在房间里四处寻找，翻看着老物件，有一些是她见过的，她还有些印象，比如奶奶常用的药碗。奶奶很讨厌吃药，可是爷爷说她不吃身体就不会变好，老赖在床上。她理解奶奶，药实在太难喝了，她生病时要喝药也挺难受呢。

小女孩又找到一个旧旧的玩偶，是只小猪，有些磨损，这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奶奶说过，她小时候也有一只，很像的，后来找不到了。每当夜晚来临，奶奶就会把小猪放在她的床头，哄她入睡。她抱着小猪入睡时，总是感觉特别安心和温暖。

她继续寻找着过去的痕迹，每一件物品都装满了回忆和故事。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本相册，灰尘覆盖着它的表面。小心翼翼地打开，

有一张照片，写着：“与亲爱的囡囡合影留念”。照片上的女孩微笑着，眼中充满了天真和快乐，与她年纪相当，连样貌也有几分相像。她也叫囡囡吗？她不禁想象着拍这张照片的景象，看她这么开心，父母肯定很疼爱她吧。

她继续翻看着老照片。其中一张特别引起了她的注意：是一张新婚夫妇的照片，新娘子却没有笑意。新娘子的眼睛和眉毛让小女孩想起了奶奶，特别是闷闷不乐的样子，简直和奶奶一模一样。爸爸说过，新娘都是新郎花了大价钱娶回来的，所以结婚当日要披上红头盖。除了那一张以外，其他的照片都没再看到新娘的脸。

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里的新娘拿着一只金猪。想起小时候，妈妈常常带着她去村口的菜市场，看着叔叔阿姨们称肉。她从来没见过他们秤这种金色的小猪。大人们说金猪最值钱的，只有结婚的时候才会送给新娘，希望新娘像金猪一样，讨个吉利。可她总觉得怪怪的，人怎么会是金猪呢？

翻看相册，小女孩的目光落在一封信上。封信的地址和名字都看不清楚，到底要送去哪里呢？这些奇怪的物件，让她心中泛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不安。

就在这时，爸爸的声音突然响起：“囡囡，你去了哪？你妈发现你不在都吓死了，怕你被拐了，赶紧给我出去！”小女孩被打断了思绪，匆匆地把手中的信封收进口袋，然后慌忙地跟随爸爸出去。

赶到仪式现场时，小女孩还没回过神，信封不知不觉间从口袋中滑落，落入了燃烧纸钱的火盆里。小女孩站在爸爸的身边，小心翼翼地问道：“爸爸，奶奶就这样被埋在土里了？”爸爸说：“奶奶会一直在这里陪着囡囡的。”

不要问

文·徐寶璠

“奶奶会不会去别的地方？”

爸爸笑着摇摇头说：“哈哈，傻孩子，奶奶的家就在这里呀。奶奶就埋在这里，永远都不会离开。奶奶会一直保佑我们全家，保佑囡囡的。”

听着爸爸的话，小女孩心中的疑问并未完全消散，但她没有再问下去，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她看到，火盆里烧了一半的信里写着：我想回家。

“啊呀这孩子哭什么！”

“真不吉利。”

林高评语：

用小女孩的眼睛看大人做的事，似懂非懂。小女孩是怀念奶奶的，奶奶很疼爱她。她想起的、看到的，那些细节都很真实具体。“照片”是一件抹不去的记录。“信”透露了一些信息。她隐隐约约看见奶奶的不快乐，她隐隐约约感觉到大人的世界有超乎她想象的虚假。“苦药”隐喻某种难以咽下的“不情愿”。叙述的过程带出了颇耐寻味的小说空间。

四周黑黢黢的，人们的脸庞轮廓模糊不清。

座位靠背太高了，七岁的我看不到荧幕上到底在演什么。我觉得没意思，便低下头开始抠弄大拇指上的一点点死皮。母亲啪地一声拍了我一下，严肃地示意我不要玩，我只好装装样子，正襟危坐。

黑暗中我真的没什么事干。眼前凝固的黑突然流动了一下，原来是前排的大哥哥站了起来，要离开大厅。他打开我先前没有注意到的门，一瞬间扎眼的白光刺入了黑暗，却又很快地消失不见。我眨眨眼，问母亲那哥哥去了哪里，母亲皱了皱眉，随便敷衍我，叫我不问，她低声抱怨着那人起身时挡了她的视线。我在鸦雀无声的黑暗中压低了嗓子问身旁的姐姐我们到底在这干什么。姐姐靠过来也压低了嗓音：

“我也不知道啊，你问那个干什么。大家都说，我们要做的只是看到这场电影谢幕而已。”

我似懂非懂，左瞧瞧右看看，好像没什么意思，大家的脸孔都是忽明忽暗，朦胧不清的。

我吸了口气，鼻腔间弥漫着影院许久不清扫的灰尘味，和一股人们身上的味道，在母亲的责备下挺直了腰板，不再去思考我在这干什么。

撑在座位上的手，指尖碰到了之前坐在这里的人遗留下来的爆米花残渣。黑黢黢的影院里，电影依旧在上映。

林高评语：

题目有弦外之音。黑暗中一个七岁小孩感到疑惑，就用她七岁的感觉来叙说。黑暗中电影院里放映的是莫名其妙的“大人世界”。身旁的“姐姐”显然也没看懂。而大人却把他们带入这“黑暗中”，她感到沉闷，不解。“黑暗”隐喻大人对小孩世界的忽视和不理解，带有某种荒诞性。

三江组诗

作者·葛新

三江之源

赣水烟波吴越霜，三江脉动共一觞。
 南洋地僻路途杳，沪港劈浪赤道罡。^[1]
 异域辗转肝肠断，故人相逢泪眼汪。
 漂泊在外需互助，抱团合组小三江。^[2]
 山西陕西西口走，山东河北关东闯。
 两湖两广入四川，闽粤赣浙下南洋。^[3]
 北方南来人渐众，三江五湖共兴邦。
 长江黄河黑龙江，战后汇成大三江。^[4]

三江先贤

恰逢运舛多磨难，背井离乡苦中尝。
 全凭一技走天下，披荆斩棘志无双。^[5]
 廿八青春浣星月，傅氏皂角洗南洋。
 华民司署担顾问，英国太子赠权杖。^[6]
 浦东陆氏名进发，初至打工德人坊。
 鸿记木器两年后，从此星马皆识郎。^[7]
 三江子弟多英杰，一代更比一代强。
 百行百业皆涉猎，纵横星洲尽栋梁。

三江公墓

生离死别凭天命，落地生根化泥香。
 先贤协作建公墓，春秋祭祖孝思长。
 历任总理竭心力，筹款扶持土木昌。
 六英亩地椰风劲，静山亭上蕉雨扬。^[8]
 四明子弟立异帮，重义集财汇家乡。
 三江土地照同人，壮志立名耀蛮方。^[9]
 七零年代倡火化，骨灰安厝慰先亡。^[10]
 八零坟迁留旧忆，征地归公叹沧桑。^[11]

三江公所

闽粤桂琼多会馆，会所林立窗连窗。^[12]
 乡土亲缘千里近，三江儿女聚南方。
 相逢相识无异地，互帮互助有同乡。
 潘曹同道扶社稷，傅陆黄公共议商。^[13]
 乡情传承延绵久，才俊接续水流长。
 置业惹兰安拔士，安身立命会馆房。
 丙午立约首创会，戊申获批开宗场。^[14]
 首届总理傅竺贤，继任总理陈来昌。

三江会馆

一九二七再扩大，更名会馆振三江。
 公团九鼎融一体，会员百衣自八方。^[15]
 甬瓯赣沪为基干，两湖华北亦同乡。^[16]
 西式女服同业会，星洲干洗誉坊场。
 会馆购地卡佩芝，商议共进聚一堂。^[17]
 从此会馆行正轨，关怀会员顾梓桑。
 名列中华总商会，七大帮中三江帮。^[18]
 创新谋远拓商道，共促发展继辉煌。

三江公学

三江先贤陈来昌，倡办公学意味长。
 未免海关强按印，学会签名自主张。^[19]
 三江总理杨惺华，卡佩芝路购校房。
 日寇入侵星马陷，校舍资料一炬葬。^[20]
 战后复学多勤勉，乡贤慷慨献资粮。
 捐舍捐车兼桌椅，更施助学奖金赏。
 太平局绅李文龙，当年公学俊才翔。
 奋斗终成大律师，扶掖后进义深彰。^[21]

三江安乐园

国泰民安世运昌，家和邻好社区强。
医疗进步增福寿，民生改善享健康。
长者福祉应关切，细心照护理应彰。
三江会馆承大任，回馈乡梓义不忘。
墓园单辟小庭院，环境优美适静养。
聘延绘师绘蓝图，申请准证细思量。
历时五年终告竣，老人喜住乐晚章。^[22]
建成三江安乐园，功劳当属水铭漳。^[23]

三江诊疗所

三江会长水铭漳，设立诊所济病伤。^[24]
守望相助扬善举，同心协力济同乡。
会员群策齐襄助，邵氏慷慨解金囊。
挂号仅收区区费，西药仪器尽无偿。
救济贫寒多善念，会馆西医启首章。
施诊普惠诸族裔，悬壶济世昼夜忙。
医道仁心昭赤子，乡情守护万家康。
善举如光辉四照，仁风正气满星邦。

三江公祠

慎终追远厚流光，怀古敬今世泽长。
时代变迁山水改，三江公墓成绝响。^[25]
先人安息寻新址，德普路旁建庙堂。
旧地难支新费用，众贤齐力共襄襄。^[26]
公祠结构双阙立，前设神坛后置坊。
二楼专奉英灵位，春祭秋祀酹沧浪。^[27]
爵士南来百年前，新马戏院蒸蒸日上。
叱咤香港鸿图展，归来依旧在三江。^[28]

三江大厦

三江会长水铭漳，卓识高瞻远虑长。
九零年代先机见，世事变迁路未央。
慎守旧址繁华地，免遭征用作它方。
发展计划刚起步，屋漏偏逢雨沛滂。
金融风暴骤然至，还贷抛售倍心伤。
筹资建馆十一载，三千万钱终成章。
高楼峥嵘穿云立，巍峨挺拔映星芒。
风雨渡尽基业固，会馆从此利无殃。^[29]

三江行业

三江工匠砌楼堂，三江建商筑工厂。
红灯码头迎远客，西班牙让放电光。^[30]
木雕工艺传千载，家俬制作巧琳琅。
温州榫卯称绝技，上海木器惟艺强。^[31]
华裳典雅名媛爱，西服裁绣贵胄装。
陆氏才桂金剪落，上海裁缝声名扬。^[32]
画界翘楚悲鸿属，文坛领袖达夫当。^[33]
早期作家百五十，三江籍贯三分强。^[34]
邵氏兄弟勤耕耘，启发民智精神飨。
电影戏院成帝国，遍布新马和香港。^[35]
琴行佳人秀儒雅，书局名士读文章。^[36]
上海书局兴书业，商务印书传八方。^[37]
琉璃含光镜工坊，巧手拭目眼明亮。^[38]
电器皮件干洗业，百货才俊竞芬芳。^[39]

三江未来

三江毓秀人杰地，风调雨顺鱼米乡。
改革激流澎湃涌，追梦赤子展翅膀。
投身保险金融业，活跃贸易商业场。
医生律师同献力，信息技术领群芳。
作家教授书传世，摄影画册呈梦想。^[40]
梨园越剧常排练，舞台精彩累获奖。^[41]
李公秉藁承志远，继往开来豪情扬。^[42]
广纳四海新侨友，共谱三江美华章。
三江文卷篇篇厚，先贤事迹句句长。
书铭史册昭华韵，薪火相传耀东方。

注释：

- [1] 赣：江西；吴：江南；越：浙江。共一觞：三地共饮一江水。表现三地在地理、人文上的连结。杳（yǎo）：本义是昏暗，引申为极远。罡：北斗星柄。航海术语中代指狂暴的风浪。赤道罡：移民船队穿越赤道附近的狂风巨浪。
- [2] 小三江：三江会馆初创时，意在照顾来自江西省、江苏省（曾经一度为包含江苏南部和安徽南部的江南省）、浙江，以及上海（原本属于江苏省）的宗亲亲友。
- [3] “走西口”是指明、清至民国初年，由长城内汉地的山西、陕西北部、河北及邻近地区的居民因经商或谋生而向长城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活动。
- “闯关东”，又称为跑关东，是东亚近代史上（清代至民国年间）华北地区人口向关东迁徙的运动。
- “入四川”是指发生在元朝末年到明代洪武年间和清代顺治到乾隆年间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广省（今湖北与湖南全境、广东北部等）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拓垦的移民潮。

- “下南洋”指的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东南、华南沿海民众为了讨生活或因战乱年代不堪困苦等等原因，大规模迁徙到东南亚的海洋移民现象。
- [4] 大三江：1945年的三江会馆章程清楚写明：长江、黄河、黑龙江。意在涵盖除了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以外的华北大部分地区。五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洪泽湖、巢湖。代表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
- [5] 舛(chuǎn)：错乱、颠倒、不幸。
- [6] 傅竺贤：三江公所创始人之一。浙江宁波人。1881年南来新加坡，时年二十八岁，创设傅记洗衣店于东陵路。1906年，倡组三江公所，即今日三江会馆前身。并担任第一届总理。但凡三江同乡有何事情，华民政务司署总请其作顾问，曾获英国爱德华太子赐赠权杖，亦获清廷封赐。1947年在故乡去世。“皂角”呼应洗衣业，双关清洁与谋生。
- [7] 陆进发：三江公所创始人之一。江苏浦东人。1901年南来新加坡。初服务于德国人开设的某大公司，二年后自营创设鸿记木器公司。继傅竺贤之后任三江公所第二届总理，曾任华民政务司署顾问。
- [8] 1898年，三江先贤购置三江公墓，开启了三江会馆历史。公墓位于惹兰里茅(Jalan_Rimau)，并建福德祠，中央供奉土地菩萨，两旁放置先人灵位(神主牌)，还建有静山亭。
- [9] 静山亭上有对联一副如下：四明子弟立异帮义重身勇财归祖家，三江土地照同人志壮心坚名扬蛮方。
- [10] 1971年，政府提倡火化，三江会馆响应，筹建骨灰塔。
- [11] 1982年，坟山地段被政府征用，三江公墓画上句号。
- [12] 闽粤桂琼：即福建省、广东省(潮汕地区)、广西省、海南岛。这些地区南来人员较多，几乎每个区、县都设有会馆。
- [13] 潘曹：三江先贤潘云卿和曹裕昌；傅陆黄：三江先贤傅竺贤、陆进发、黄智慧。
- [14] 丙午年(1906年)，先贤潘云卿、曹裕昌等联合傅竺贤、陆进发、黄智慧等发起组织三江公所，购置惹兰安拔土房屋一栋，作为会所。戊申年(1908年)，正式获准注册。宗珣：用来指崇高、辉煌的宗族事业或与宗族相关的重要成就。
- [15] 1927年三江会所改名三江会馆。有九大社团组成：宁波同乡会、南洋温州会馆、江西同乡会、上海公会、南洋湖北天门会馆、两湖会馆、南洋华北同乡会、上海西式女服同业会、星洲华侨干洗公会。人员包含了两湖和华北，可谓是大三江的初型。
- [16] 甬瓯赣沪：甬，宁波简称。瓯，温州简称。赣，江西简称。沪，上海简称。
- [17] 先贤陈来昌担任总理时期，联合俞宝森、胡鹤卿等诸位先贤购置卡佩芝路二号房屋一栋，作为会所。梓桑：同乡。
- [18] 新加坡方言团体：新加坡有福建(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福州、兴华、福清和上海等几大方言团体。三江帮即上海方言团体。
- [19] 陈来昌：宁波同乡会创始人之一。浙江宁波人。1903年南来新加坡。初至马六甲经营木器业，数年后移居新加坡，创设万兴木器公司，继创万兴国货公司于谐街。与傅竺贤、俞宝森等扩充三江坟山，又创立三江会馆，兴办三江公学。
- [20] 三江公学设立于1937年以前。因日本入侵，未免同乡资料落入日人之手而付之一炬。
- [21] 李文龙：执业律师五十余年。1998年，获政府委任太平绅士(JP)。2012年获颁公共服务星章(BBM)表扬。
- [22] 三江安乐院：1979年在三江公墓建成。1980年启用。
- [23] 水铭漳：江会馆任职最久的会长。浙江宁波人。生于新加坡。早年当过学徒，曾先后从事染料业、建筑业、房地产开发。继承家族事业，出任新加坡聚建筑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 [24] 三江会馆慈善诊所：1974年创办。首创社团西医诊所。象征性收费，面向华、巫、印各民族。
- [25] 同[11]
- [26] 三江公墓被政府征用后，得到的赔偿远远不购支付新购入的德普路新的公祠所需费用。襄襄：提供帮助或支持。
- [27] 三江公祠：继三江公墓地段被政府征用后，重新投标租用德普路地段重新建造专为存放骨灰和祭祀祖先的建筑。双阙：前后分开的复式结构。酌(lèi)：以洒洒地作祭奠。
- [28] 自1926年起，邵氏兄弟开创了亚洲影业神话。戏院遍布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邵逸夫于1957年移居香港，并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他在1977年被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册封为爵士。
- [29] 三江大厦：为避免会馆在里峇峇里路的会馆旧址被政府征用，将其发展成三江大厦。1989至1999年，历经长达十一年的努力，在水铭漳先生的领导下，二十层楼的三江大厦平地拔起，成为三江人的骄傲，也是三江会馆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通过出租其中的单元，为会馆提供稳定的收入。未央：无止境，未结束。无殃：不受灾祸侵扰。
- [30] 建筑业：Sino Britsh建造了巴西班让发电厂。上海友联建造了红灯码头。
- [31] 木器业：以温州人在芽笼开设的“上海木器店”为代表。温州会馆旗下的诸多老板。先贤陆进发等从事的行业。
- [32] 服装业：上海裁缝闻名遐迩。有“金剪刀”之称的海裁缝陆才桂。
- [33]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画家、美术教育家。曾至少三次赴南洋活动。郁达夫，杭州富阳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也是抗战期间流亡南洋的代表性文人。
- [34] 据统计，早期南来的一百五十多位作家中，三江籍贯的占五十多位，约三分之一强。
- [35] 同[27]
- [36] 新加坡琴行历史可追溯到十里洋场的上海。1874年，有英国商人在上海设立中国首家钢琴制造厂，谋得利乐器商行(Moutrie and Company)。当时很多宁波人到上海打拼谋职，有些进入琴行打工。后来南来新加坡。本地开设琴行最早的是三江先贤王相贤。
- [37] 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生活书店等。
- [38] 眼镜业也是三江人的行业。1937年，上海大明眼镜公司南来设店。
- [39] 电器、皮件、干洗、百货也多是三江人经营的行业。
- [40] 三江会馆有多位作家曾出版过书籍。2015年，三江会馆出版了《爱与梦想·新加坡》摄影画册。
- [41] 新加坡三江梨园社隶属于三江会馆，成立于2016年，致力于传承和发扬越剧表演艺术。
- [42] 李秉贇：现任会长，2002年12月从前任会长水铭漳先生手中接任本会会长至今。

(2025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与徐芳达部长共话华社未来 传承、融合与创新



文·杜诗敏
图·编辑部

主 管华社事务的国家发展部长徐芳达于6月13日到访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与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及15名理事、会馆领袖共进午餐。这是徐部长以华社联络组主席的身份首次到访宗乡总会，也为政府与华社深化合作开启了新篇章。

徐芳达部长与蔡其生会长分别致辞。徐部长在致辞中向前任华社联络组主席唐振辉部长表达谢意，并感谢各华社团体、文化团体、宗教团体及华文媒体历年对弘扬华族文化的鼎力支持。蔡会长则在致辞中分享总会的近期的活动计划，如今年10月的宗乡总会40周年庆典暨筹款晚宴，并强调总会一向致力于传承华族文化、凝聚社群向心力，望部长和华社联络组的成员能够全力支持总会。

交流会中，徐部长与宗乡总会就政府与华社组织如何继续密切合作进行讨论，主要围绕三项

课题：一、支持本地宗乡会馆建立新一代的领导班子，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为传承做好准备；二、协助宗乡团体提升自身实力，制定能吸引华族社群，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计划；三、宗乡会馆与其他华社组织，如宗教团体和文化团体，在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加强国人与新移民融合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徐部长强调了吸引年轻新加坡人加入华社团体及协助社团培养新一代领导班子的重要性。他表示：“比较好的做法是，我们趁现在比较资深的理事们还在的时候，就应该引进更多年轻人，让年轻人有时间向长辈学习，当需要他们接手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更有经验。”

华社联络组也将与宗乡总会合作，进一步加强华社的内部团结，促进本地华社与其他族群和谐共处，并且进一步协助新移民融入我国多元化的社会。对此，徐部长鼓励新移民参与不同的活动，而本地人也应向新移民抱有开放和欢迎的态度，以助他们融入新加坡。不仅如此，华社联络组还将与宗乡总会共同协助华社团体与时俱进，尤其是在提升数码化和现代化管理方面，以更好地为华社成员服务。

题图说明：

徐芳达部长与宗乡总会理事及会馆领袖以品粥形式进行交流，前排左起：宗乡总会理事李秉護、副秘书长潘家海、秘书长吴绍均、副会长钟声坚、徐芳达部长、蔡其生会长、副会长曾建权、财政梁善源、副秘书长卜清钟、福州会馆主席叶明杰；后排左起：宗乡总会理事李瑞庆、萧立娟、杨应群、黄保华、陈展鹏、吴信财、庞琳

（作者为本刊特约学生记者）



徐芳达部长（中）与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左二）、副会长钟声坚（右二）、副会长曾建权（左一）、秘书长吴绍均（右一）合影

多元庆三喜 粽香聚民心

记2025端午嘉年华



文·许迎辉
图·编辑部

2025年5月25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所内人声鼎沸，粽香四溢，一年一度的“端午嘉年华”盛大登场。超过一千名来自不同背景的民众扶老携幼，穿梭于各个活动区域。孩子们的笑闹声、竞赛区的加油声、舞台上悠扬的音乐声，交织成一幅充满活力的节庆图景。作为庆祝新加坡建国60周年、新加坡宗乡总会成立40周年，以及欢庆端午节三喜临门的重要活动，本届嘉年华以凝聚多元社区、弘扬中华文化以及庆贺双周年为主轴，活动内容精彩纷呈，彰显全民共庆的精神。

碧山一大巴窰集选区议员蔡引舟先生受邀担任主宾，与民众共度佳节。蔡先生在致辞中表示：“端午嘉年华已连续举办15年，成功吸引了不同背景的居民共同参与。值此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希望今天的活动让大家从一个全新视角了解端午节，与家人、朋友共度一段欢乐且难忘的时光。”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蔡其生先生随后致辞，他恳切地表达了活动的主旨：“我们希望这些（精心安排）的节目，能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深入了解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增进

亲子、祖孙之间的情谊，与宗亲、乡亲们共享欢乐时光。”两位嘉宾的发言，清晰地勾勒出嘉年华的核心价值：在欢乐聚会中传承文化，在互动体验里凝聚社群情感。

传统竞赛：趣味体验中的文化认知

本届嘉年华最令人期待的，是延续多年的传统项目“夹粽子”与全新推出的“品粽子”竞赛。两个比赛共吸引了将近50组队伍踊跃参与，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

“夹粽子”比赛采用接力制，参赛者需使用特制长夹将象征粽子的毛绒玩具、球或魔方夹起，运送至指定篮筐。积分前十的队伍可晋级决赛。每位参赛队员均小心翼翼，眼神专注，全场不时传来加油喝彩之声，孩子们更是跃跃欲试。许多家庭“全员出动”，亲子协力作战，成为文化代际传承的生动缩影。在活动现场，主宾蔡引舟议员、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等几位嘉宾也饶有兴致地拿起长夹，与民众同场竞技，亲身体验游戏的乐趣。

今年的“夹粽子”竞赛还特别融入了新加坡建国60周年及宗乡总会成立40周年的元素，参赛者不仅要用长夹夹起“粽子”，还需夹取象征本地特色的标志物，在趣味互动中加深对国家历史的认识，及对多元文化身份的认同。

首次亮相的“品粽子”竞赛则是一场味蕾与

文化知识的双重挑战，在寓教于乐之余，促进大众对端午节传统与各籍贯粽子的认识与了解。初赛阶段，参赛者需在限定时间内品尝由主办方精心准备的潮州粽、广东粽、福建粽、娘惹粽、客家粽与海南粽等不同籍贯风味的粽子，快速辨识出其所属籍贯。决赛阶段难度升级，挑战者必须准确说出自己品尝粽子中的三种主要馅料，选项包括竹笋、猪肉、香菇、板栗、鸭肉、虾米和红豆泥等。赛后，一位参赛者感慨道：“尝一口粽子，就像翻开了一本活的籍贯文化书。”通过这一活动，参赛者与观众一同领略中华饮食文化的丰富性，也加深对端午节背后多元传统的认知。不少小朋友也参与其中，在实践中亲身体会粽子文化的多样性，成为文化传承的最佳见证。

交融现场：舌尖与音符的多元交响

美食向来是节庆中不可或缺的亮点。十个由宗乡会馆及民族团体精心布置的美摊位前，人头攒动，排起了长队。刚出锅的各式风味粽子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各籍贯的传统风味和节庆小吃琳琅满目，呈现出新加坡多元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舞台区则是艺术与欢乐的海洋。来自不同族群的街头艺人，用充满感染力的歌声和乐器表演点燃了现场气氛，台下观众随之摇摆，沉浸在节庆的喜悦中。一位年仅9岁的小钢琴家献上的精彩演奏，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一刻，端午节的韵律超越了族群和年龄的界限，成为连接台上台下的共同语言，生动体现了文化的共享与交融。

润物无声：寓教于乐的文化遗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嘉年华首次与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合作，联合推出一系列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节庆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增添家庭亲子互动的乐趣，也深化了对端午节历史与习俗的认识。

《鼓声隆隆迎端午》巡回展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节日的历史演变。从屈原投江的悲壮故事，到早期南洋华侨如何在异乡坚持传统，再到当下新加坡社会中各族群共同参与的节庆图景，展览串联起历史与现实，让观众仿佛踏上了一段文化时光之旅。

亲子互动区同样精彩纷呈。“端午童话故事会”上，讲述者将神话经典《宝莲灯》演绎得生动有趣。孩子们手持彩灯沉浸其中，童声笑语与故事光影交织，勾勒出属于他们的文化初体

验。“端午习俗对对碰”小游戏，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将印有艾草、龙舟、粽子、屈原、五色绳等端午元素的图片卡，与对应的文字卡配对，在轻松互动中了解节日习俗。一旁的“端午手工艺站”，艾草养生锤DIY区域人气火爆。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动手，挑选艾草、仔细捆扎、用心装饰。这一活动不仅传递着艾草驱邪避疫的传统智慧，更将文化的认同感，如同细密的针脚，温柔而牢固地“缝”入年轻一代的心田，让抽象的文化变得可触摸、可感受。

童画寄情：画笔下的节日与家园

“儿童及青年线上绘画比赛”颁奖典礼也在嘉年华当天举行。本届比赛以“童绘狮城60载·共庆总会40年”为主题，共收到389幅参赛作品，参赛者年龄介于4至16岁。小画家们以童稚而真挚的笔触，描绘新加坡家园之美，勾勒出狮城街景中的节日风貌，表达对华族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作品内容充满童真、温度与创造力，展现出华族文化在年轻一代心中自然生长、鲜活流淌的生命力。

余韵悠长：节庆之后的文化印记

随着鼓声渐息、粽香散去，2025端午嘉年华圆满落幕。从一盏灯、一幅画、一口粽子，到一场比赛、一段故事、一份手作，这场嘉年华不仅重现了传统节日的仪式感，更让文化真正“活”在了当代人的日常里。

宗乡总会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年复一年坚持举办端午嘉年华，不只是为了纪念节日，更是为了延续一份文化的温度与社群的凝聚力。它汇聚来自不同背景的民众，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体验端午习俗、认识中华文化，并借此促进理解、交流与连结，其意义早已超越了节庆本身的热闹。它是在欢聚中守护文化根基的坚持；是通过美食、游戏、艺术和手作，让传统文化生动“活”起来的实践；更是让不同背景人群相聚、微笑与交流，为新加坡多元和谐社会注入的温暖凝聚力。

题图说明：

主宾与嘉宾们共同参与“夹粽子竞赛”，为端午嘉年华拉开序幕，左起为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国会议员蔡引舟、宗乡总会文化委员会副主任萧立娟和副秘书长潘家海

（作者为本刊兼职记者，更多活动图片见封三）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先生为小画家们颁奖



主宾蔡引舟议员与主办单位代表合影留念，左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节目处长李仪文、宗乡总会文化委员会主任杨应群、蔡引舟议员、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副会长曾建权、晚晴园一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林国耀



十余个特色美食摊位汇聚各籍贯粽子与节庆小吃，展现多元文化融合



大家认真制作艾草养生锤，在手工体验中感受传统智慧

家庭组队参与“品粽子”活动，共同感受传统饮食文化的魅力

小朋友蒙眼参加“品粽子”比赛，认真品尝粽子风味

在“夹粽子”比赛中，参赛者夹起宗乡总会40周年的标志牌



“端午嘉年华”于2025年5月25日圆满落幕

宗乡总会奖学金

SFCCA Scholarship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25 – 10.07.2025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643 6475

✉ admin@sfcca.sg

🌐 <https://www.sfcca.sg/sfccascholarship>